



引用格式:杨思基. 浅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1-1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01-10

浅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

On the questions of standpoint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Marxist

杨思基

YANG Siji

苏州大学 哲学系,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确立先进的阶级意识、历史主体意识,从而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非常重要,对于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不可少。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问题、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有立足人民群众历史实践主客对立统一的关系思维立场;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立场;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革命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指那些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完整思想体系,并且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观念和观点,如马克思主义科学革命的实践观、主客对立统一观、真理观、矛盾观、辩证的否定观、发展观、唯物史观、历史发展趋势观、社会进步观、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观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一系列哲学方法、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最为根本的实践和认识方法,是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相联系,并与其相辅相成的哲学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基本立场;
基本观点;
基本方法

收稿日期:2018-03-18

作者简介:杨思基(1958—),男,山东省临沂市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值此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我受邀参与相关纪念活动,让我讲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题目很大,要真正把它展开深入地讲,无疑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一个系统完整的梳理与介绍,而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讲清楚,这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知道,立场、观点和方法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人的立场和方法决定着人的认识和观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着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认识和实践,而且观点对人的立场和方法同样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们是做什么人,怎样做人,按照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人的根本性问题,是决定人最终达成与实现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与核心。鉴于此,我这里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一个基本的阐述。

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早在1843年10月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214}。任何人如果没有思想和灵魂,就如同动物或行尸走肉;任何实践如果没有科学理论与正确认识的思想指导,就是盲目的实践。无产阶级要从自在自发的阶级上升为自觉自为的能动的革命的阶级,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自觉的历史主体,成为埋葬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旧世界的掘墓人和解放全人类的新世界的建设者,就必须掌握先进科学的而且能为本阶级服务的思想武器,运用这个思想武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有自己阶级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清醒自

觉的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进行个人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科学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思想前提。没有这样的思想和方法前提,我们显然无法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无法实现立场、思想和方法的科学的革命的转变,无法胜任我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生命也必然是有生有灭的,但只要他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真理,他的思想就可以光照千古、世代不朽。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现实性和巨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工人运动的生动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发展规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完备、最严整的真理体系,其思想蕴含着强大的自我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在同世界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实践创造性结合的过程中,既发挥了强大的思想指导作用,又彰显了其持久的强大生命力、内生创造力和战斗力;而且伴随人类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地实现着它自身的与时俱进,不断地在突破它原来的时空界限和思想界限,业已成为我们思想革命、社会革命乃至改造整个世界的思想先导,发挥着日益凸显的越来越大的历史作用与强大影响力。我相信,虽然我们的人生有限、能力有限,但只要我们投身到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当中去,投入到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历史实践中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渺小而变得有价值、有贡献,从而进入到为亿万人民群众所尊敬的人的行列中去。

二、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真经”必须从了解马克思生平和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政

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要读马克思主义“真经”,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马克思,并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方便,我们在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马克思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市,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逝世,3月17日被葬在海格特公墓,享年65岁。从1844年10月开始,马克思即着手创建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与恩格斯合作,先后写作了《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至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创立。此后,直到1850年中期,马克思重点关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反剥削反压迫运动,系统总结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历史实际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丰富完善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革命的初步结合。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雇佣劳动与资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农民战争》。从1857年开始到马克思逝世,这段时间马克思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工作,并在1867年9月于德国汉堡出版了《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此后,他精心整理修订了《资本论》第2卷、第3卷手稿,仅1870年代马克思就先后写过7份《资本论》第2卷手稿。这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立足于从1843年底开始直到1847年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系统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由此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时

这也是马克思深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重要时期。他建立了第一国际(1864年),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与未来社会建设原则;他在成熟完善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身份科学地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在这段时间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1、2、3卷,以及《剩余价值理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在世俗人的眼中,马克思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他的祖辈、外祖母和妻子多是世代贵族,属于上流社会,宦宦书香门第。马克思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他要想一生享受荣华富贵简直是唾手可得。但马克思偏偏选择了为穷人和无产阶级服务,为人类解放奋斗终生。他用毕生精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与罪恶,探讨人类解放的道路与现实可能,给人类贡献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精神财富,提供了解开千古历史之谜、光照万古历史黑幕的思想理论,实现了自己思想的不朽,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和健康。他像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类带来光明与温暖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把自己投入地狱,他像为了使人类摆脱罪恶升到天堂的耶稣一样把自己送上了十字架,他为了让人类获得光明和解放的真理而把自己置于最下层的贫苦社会阶层。这注定了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一生贫困潦倒、贫病交加,还不时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迫害。当然,也正是如此才使他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和人民群众永远怀念和爱戴的精神导师与领袖。

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这些基本立场都有哪些?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创立马克思主

义的马克思的立场有着紧密联系,我们要从分析马克思的立场来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思想家与人类社会科学巨匠。这意味着我们要分别对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思想家理论家的马克思的立场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认识。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经历了政治立场和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后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我们还必须把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与已经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区别开来,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及其理论著述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的小学是在自己家里主要是由他的父亲教授的。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熟悉牛顿、莱布尼茨、洛克、康德、莱辛等人的著作,在思想上倾向于理性主义,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开明的自由精神和极富哲学素养的知识培育影响了幼年马克思。马克思父亲的好友和邻居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燕妮的父亲),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经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幼年马克思和燕妮传授历史和文学知识,使马克思从小就有很好的文学素养。1830—1835年,马克思在自由主义思想活跃的特里尔中学读书,从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这时所确立的立场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1835年10月—1841年4月,马克思进入大学的学习阶段,这时的马克思在政治上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则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1840—1841年,马克思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2年2月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署名莱茵省一居民,以德文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版第

一卷),1842年10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旬,写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后两篇文章均发表于《莱茵报》,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共有14篇),是他的上述立场的证明。这说明从1835年10月直到1843年春,马克思基本上是站在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来认识和看待现实世界、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思想上比较强调个人自我意识自由、理性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政治上同情支持下层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主、土地所有者和官僚统治。从1843年3月马克思辞去《莱茵报》主编回到书房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一直到1844年10月,马克思在这一段时间,政治上虽然仍然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开始向工人阶级转变。即便这时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说话,因为他这时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没有与旧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划清界限,同时也没有与思辨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划清界限,他依然是站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抽象人道主义甚至是思辨哲学的立场来为工人阶级说话。这说明当时他的工人阶级立场实际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与束缚的自在自发的工人阶级立场,而不是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立场。从政治立场上说,马克思当时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工人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而从哲学思想立场来看,马克思是采取了超越唯物唯心的费尔巴哈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哲学立场,以及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自发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立场。而只要工人阶级仍然依附于资产阶级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和束缚,也就绝不会有自觉自为的有自己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马克思这一时期写的著作有《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

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自在自发的工人阶级立场和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借助法国、英国、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魏特林、赫斯、蒲鲁东和恩格斯当时发表的著作,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从雇佣劳动和工资、资本和利润、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复归,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和宗教的积极扬弃;在最后一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逻辑学和整个哲学作了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为全面而深刻的剖析,指出黑格尔的自然、人、思维、国家和法等都是超验性的自我意识抽象思辨的结果,毫无感性的现实性与经验实证的证明。马克思认为,正是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为批判英法国民经济学“打下真正的基础”^{[1]220}。这充分表明马克思至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依然没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划清界限,同时也没有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没有真正告别一切均从人的抽象理性或抽象思维的人的“类存在”“类本质”出发,按照从人的类本质到人的异化、再到人的本质复归于人这一思辨唯心主义逻辑来认识人和人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只要还没有与思辨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就绝无可能真正站到自觉自为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到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

然而马克思的上述情况至1845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写作《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直到1847年1月才最后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经过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

立场、哲学思维方式、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理论原则和哲学理论宗旨的一系列革命与变革,马克思完成了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与思辨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从而最终确立了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是被我们今天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时马克思的立场才真正转到自觉自为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并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从自在自发的阶级转向自觉自为的阶级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

从马克思逐渐成熟发展起来的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显然应包含下述几个方面:(1)从一般的思想认识立场说,它是从抽象的超人、超历史、超自然的,感性直观的自然人立场转向现实的个人和人民群众、人类历史实践的立场,从主客二元分立的实体主义哲学思维及其立场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以实践为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思维;(2)从政治立场、阶级立场说,它是从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即仅从个人自己私利出发的个人利己主义立场转向将个人和集体、和人民群众、和整个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立场,从貌似超阶级的客观中立的立场明确转向有自己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立场;(3)从哲学派别的立场说,它是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与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向彻底的一切按事物本来关系和面目,客观如实地认识理解事物及其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这样才促使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人民群众和人类历史实践,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不断发展提高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基础上来认识和改造世界;(4)从革命

的立场说,它是从仅仅满足个人利益、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需要的“改朝换代”半截子革命、单纯政治革命的立场转向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以整个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彻底革命的立场,马克思主张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正是他这一立场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一系列科学方法、科学研究对象、科学理论观点和改造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宗旨的确立,正是马克思在实现上述立场的根本性革命转变基础上达到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思想代表人物为代表,他们对马克思思想比较感兴趣的大多是马克思1844年之前的思想,极为推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想借此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现代性批判”范畴中,想把马克思主义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科学共产主义立场拉回到马克思早年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拉回到超越唯物唯心、超越阶级、超越不同政党和派别的所谓“客观中立”立场,以此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科学革命的思想灵魂,而把彻底革命的、彻底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称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没有学术性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甚至认为,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2]。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说:“这个马克思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脱离了哲学唯心主义,但这没有使他把物质的最高现实性与虚构的思想的现实性对立起来。不如说,他使

这两个现实性服从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既积极又消极、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总体的生活现实。他既把物质原则,又把精神原则看作是统一的总体的生活过程的现象。”^[3]总之,他们是想把马克思主义拉回到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抽象人道主义思想阵营,并按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面貌来改变马克思主义,使其不再能充当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四、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些基本观点包括哪些?

马克思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历史事件,遇到了很多实践与认识问题,因而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思想语境中会有许多自己不同的看法、说法和观点,并不是他的所有观点和看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相联系而密不可分,并且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原则、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精神的观念,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构件的思想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台机器缺少了关键部件和零件,它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完全瘫痪。就如同机器那样,马克思主义缺少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它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表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作用,也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特质。譬如,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人类历史实践来认识观察世界,形成了一系列来源于人民群众实践又高于人民群众实践、能够指导实践的哲学世界观理论观点,形成了认识与反思批判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系列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思想,并由此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完整的彻底的哲学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包含

着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类历史实践的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观,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知识观、真理观,人民群众的实践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从阶级国家、政治国家再到人民国家的国家观;矛盾是一切关系的本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各种矛盾相互制约和影响,主要矛盾影响决定次要矛盾的情形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事物发展与社会发展都遵循着由量变到质变、由具有必然性合理性到逐渐失去其必然性合理性的客观规律,而且遵循着辩证地否定这一规律;在更高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生事物必然战胜逐渐失去其存在必然性合理性的旧事物;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和观念,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生产劳动观、经济观、政治观、法律观、军事和战争观、宗教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观念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而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观念反过来又通过人的实践对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具有巨大反作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推动力量,劳动者是最根本的生产力,阶级斗争和人的关系变革、观念变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基础,社会能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不仅取决于其客观历史条件的成熟,而且取决于有没有革命的阶级、革命的力量、科学革命的理论武装和革命队伍的组织程度;人要不要革命、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而且取决于他们有没有清醒的阶级意识、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不是清醒自觉的社会历史主体;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石,而构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显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

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共产党就是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先锋队组织,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人类彻底解放,这也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就要进行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4]。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与传统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种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旧的观念彻底决裂。工人阶级个人和共产党人作为有清醒阶级意识、历史使命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人,他们没有超越广大人民群众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的特殊私利,没有与共产主义远大崇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相冲突、相矛盾的个人目标和阶段目标,绝不追求凌驾于整个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之上的所谓个人独立的人格、自由人权与特殊利益,而是身体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上观点显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缺少了它们,就无法构成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结论,更不能发挥其指导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

近些年,一些人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煞费苦心,他们处心积虑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是他们否定的重点目标,而且往往打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譬如,他们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一种理

论抽象,而抽象的价值很难衡量与度量,实际上是包括“死劳动”(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各种“劳动”都参与了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而且是商品交换推动了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剩余价值或利润就是企业家投入的“死劳动”(物化劳动)和企业管理而获得的劳动收入和报酬。所以,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象就被他们完全否定了。而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则主要是以庸俗的旧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史观来诠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歪解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或单线直线历史发展观,打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号消解与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又如,他们说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而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加上“交往实践”“地理空间”“生态”等词汇,好像这样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创新!但发展创新是新加几个词或概念就能够做到的吗?加几个词就能超越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而抛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吗?什么是“交往实践历史观”,仅仅是“交往实践”而缺少了马克思唯物史观那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吗?什么叫“地理空间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理解?讲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地理的、历史的、空间的、生态的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这是不是以某特殊的形式以偏概全来庸俗化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念?假若有人非要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什么“伦理”“生态”“宗教”“有机”“人道”“价值”“过程”或其他什么东西不可,那会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怎样的变化、发生什么实质性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前乱加修饰词的人,想到如此会导致一种什么后果吗?那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

作任人理解、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然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现实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不仅揭示了社会历史中居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揭示了其他各种构成因素及各因素的交互作用,证明了具体历史过程是历史各种构成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了多重历史主客体在具体历史实践、历史事件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它们的相互交融,包括不同历史主体甚至不同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基本力量、各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以及历史本质与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客观如实地反映与揭示社会历史真实面貌的历史科学,绝不是什么简单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或几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直线发展论所能概括说明的。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实际是在不读原著的情况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简单机械的教科书式庸俗化理解,然后再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庸俗理解来攻击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任意歪解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我们认为,无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都已经包含着历史的特定实践关系、时空关系与人生产生活的各种历史环境和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加上任何界定性概念,都显得多余而且容易发生误解。有些人现在正是利用这一手法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学说,来制造理论混乱,来否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里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论。

这些年我们学界受社会大环境影响,西方搞什么,我们就跟着搞什么,他们怎么说,我们就为争取国际影响也跟着他们怎么说,各种所谓的“创新”全是在人云亦云而不是在真正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际是跳进人家布

设的理论陷阱陷入误区。譬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宗教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分析实证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绿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居然可以丢掉革命去掉红色而变成对资产阶级绿色无害的东西),真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好像无论资产阶级不管有什么哲学,它们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而且可以用来嫁接与改造马克思主义,这简直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千变万化的万花筒和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啦!

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基本方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当然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所理解的工作生活技巧类方法,而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一系列哲学方法、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最为根本的实践和认识方法。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哲学家们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性地予以理论加工使之上升到哲学理论层面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具体实践和认识的思维方式、方法显然局限于人们的具体实践层面,不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原则性和一般普遍性。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哲学,实践之所有能够成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人的实践,关键在于哲学和实践中渗透并包含着人历史地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和方法,有着属人的社会历史性质和个体主体性差别。而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与一般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工作方法、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具体思维方式和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对事物进行考察的最为根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在总结反思一系列具体的思维

方式方法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系列与哲学世界观理论建构紧密关联的、具有一定原则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以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之系统的方法论来予以表述,而后者则要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指导与规范。

人们不断以哲学的理论视野来总结反思具体实践、具体认识和具体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样就形成了不断发展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思想体系。从哲学发展史来看,作为构建不同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大体有古代逻辑综合哲学思维方式、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近代主客二元分裂对立的知性哲学思维方式,以客体为中介的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际关系思维方式,后现代非主体、非本质、非理性、非逻辑、非决定论现象学哲学思维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不是要坚持和发展旧哲学,而是要从根本上彻底告别旧哲学、超越扬弃旧哲学。只有马克思所创建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最伟大革命与变革,真正使哲学立足于人类实践对人类现实生活世界本质关系做出了科学说明,才使哲学真正具备了其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哲学对于生活实践的反思批判与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也是在总结批判人类已有思维方式和方法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经历了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系统完善的理论化思维方式、思想原则和方法论思想体系,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发展历程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

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套一成不变、尽善尽美的原理和公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本身就包含着科学的革命的思想认识方法与研究说明问题的一系列科学方法。恩格斯说: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这说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理论观点中学习掌握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最为根本的哲学方法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实践之实际关系出发,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一与结合,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中把握人类实践关系的本质和人与现实生活世界关系的本质,科学揭示其中的各种矛盾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以及历史本质规律性联系和历史发展趋势,为人类解放指明历史条件、路径、方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后者即思维和认识的辩证法)按照它们本来的关系统一起来所创造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历史辩证法理论、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理论,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覆性扬弃,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它们不仅体现着马克思根本的哲学方法要求,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特征的最为根本的方法。另外,马克思对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的发生学分析、矛盾分析、量变与质变关系分析、因果关系分析、现象与本质关系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主客体关系分析、整体与部分关系分析、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分析、可能性与现实性关系分析、理想与现实关系分析、阶级分析、差异比较和历史比较分析,也都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

其中,历史分析方法尤其重要,它包括运用以上各种关系来分析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历史路径、历史因果联系、历史的本质规律与历史发展趋势,并运用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其中历史本质的方法、历史的回溯分析方法、历史的批判性

解构和批判性建构的分析方法等系列方法,而且要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为我们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服务。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逻辑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是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的,但这种逻辑方法与马克思的理论叙述的逻辑方法是有区别的,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暂且搁置不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一系列分析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中,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分析和实践认识论的科学实证分析认识方法始终是居核心地位而贯穿始终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群众路线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应用典范。当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有时是系统地交织在一起并按照科学的组合原则综合加以运用的,有时又是根据各种方法的适用对象分门别类地形成不同的方法系列应用于他的理论研究及其理论阐发的,需要我们辨析并排除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些误解,结合马克思思想实际而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的真实思想内涵、逻辑构架和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5.
- [3]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C].北京:三联书店,1982:9.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引用格式:刘西琳.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11-22.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2-0011-12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Marx's two discover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Rereading Engels' *Speech in front of the Tomb of Marx*

刘西琳

LIU Xilin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如同达尔文发现有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达尔文基于对物种起源的研究,展示了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创世说”的理论根基;马克思基于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一条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170年来,乾坤旋转,物换星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除《共产党宣言》外,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立者之一,恩格斯在该讲话中仅仅用了一千多字,就全面、深刻、简洁、精准地概括了马克思伟大的一生,评价了马克思对国际无产阶级、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从而毋庸置疑地树立起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史上第一伟人”的崇高形象。《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理论价值更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发现唯物史观的;是基于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发现剩余价值的。基于这“两大发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欧洲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迷茫中脱颖而出,将社会主义思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在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是运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作为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等生”,中国的成功经验对于推进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不言而喻。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科学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学说

收稿日期:2018-02-24

作者简介:刘西琳(1942—),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

一、此刻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当其时

2018年5月5日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由于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因而这一天也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

伟人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马克思主义对“英雄史观”是否定的,但充分肯定英雄、伟人对于人类社会、对于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什么是伟人?回答这一问题,既与人们的认识有关,更与人们的立场有关,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国际史学界对于“伟人”还是有共识的,这种共识基于被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誉为“历史学教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及其9卷本的史学巨著《历史》。希罗多德认为,所谓伟人,就是能以其个人的发现、思想或业绩造福人类、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已被黑暗的中世纪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学教父”,其9卷本的巨著《历史》也于16世纪正式出版面世,随即便被欧洲乃至世界史学界奉为圭臬。希罗多德的《历史》对于近现代史学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尤其具有方法论价值,其“伟人观”更是如此。根据希罗多德的“伟人观”,一个人以其观察和研究而最先发现了关于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秘密,从而获得了真理并将这一真理(秘密)告知人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这个人就是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根据希罗多德的伟人标准,近代发现天体运行规律从而推翻了“地球中心论”的哥白尼、发现自然界物体运动规律从而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的牛顿、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生物

进化论”的达尔文等,就是这样的伟人。

但是,社会与自然界相比要复杂得多;而阶级社会又远比非阶级社会复杂——在阶级社会中,许多真与假、是与非、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等诸如此类的认识与判断,往往被功利尤其是被阶级利益所浸淫,因而被弄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颠倒。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关于阶级社会的矛盾及其解决、关于人世间的的不平等及其消除等攸关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世人仍然是一头雾水,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无例外地在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呻吟,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中,看不到光亮,因为不知道洞口在何处。显然,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要有人透彻地认识到并敢于冲破重重阻力说出其中的秘密。今天我们终于知道,正是在这个事关无产者和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卡尔·马克思作出了彪炳人类史册的贡献——他基于自己的“两大发现”,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无产者和全人类指出了一条永远不再受剥削和压迫、永远摆脱屈辱和贫穷、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从而人人都能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大道。为此,马克思整整奋斗了一生,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终因贫病交加,“于人生之盛年,倒在了自己事业的中途”(但丁《神曲》)。马克思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崇高伟岸的人格都将永垂不朽——世世代代地为全人类所怀念、敬仰和学习。

1848年出版《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尚不足30岁,此时的马克思已相继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65岁,此时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已成燎原之势。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与马克思或朝夕相处、或心心相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同为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者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可以说他与马克思是“两个身体,一个大脑”(见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马克思传》)。惟其如此,正如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最好的学生和继承人亚里士多德唯一有资格在追悼会上评价其恩师柏拉图,恩格斯顺理成章地也成为在马克思墓前深情追忆马克思的一生、全面评价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对马克思“盖棺论定”的唯一合适人选。值此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重读恩格斯于135年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于我们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之于人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深远意义,正当其时。

二、听恩格斯说马克思:马克思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据几年前的《参考消息》报披露,西方的出版史学者根据调查统计,说自从出版业问世以来,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且最广的书有3本,分别是《圣经》(《新旧约全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含4卷本的《选集》、2卷本的《文集》)和《毛主席语录》(含西方出版的《毛泽东语录》)。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都说不上是西方出版商的朋友,这一统计是可信的。

1999年6月6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曾在德国读书、教书10年并遍历欧洲诸国的世界比较文化大师季羨林先生曾对笔者说,人种的肤色、拼音的文字、《圣经》的宗教、文艺复兴的文化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是西方文明的5种“黏合剂”,正如5000年中华文明是被黄皮肤、方块字、四书五经特别是《论语》和《道德经》等黏合在一起是一样的。^[2]这样看来,《圣经》被列为世界已发行的出版物数量之首是不奇怪的。至于《毛主席语录》,其印数逾亿册、位列全球印数第三位也能被人理解,因为它发行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又面对彼时的10亿人口。与《圣经》和《毛主席语录》相

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累计印数和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是一个值得世人深思的问题,它至少表明:尽管这两位“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列宁语)并不讨西方资产阶级的喜欢,但他们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是举世皆认同、无人能撼动的!

作为19世纪最博学、最伟大的两位学者和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浩瀚、著作等身,其中有宏篇巨著,如《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等,也有体量虽小但容量极大的袖珍精品,其中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亦称《费尔巴哈论纲》)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苏联、中国和东西方其他国家先后编辑、出版了多种版本,有几十卷本的“全集”、4卷本的“选集”,也有10卷本的“文集”,但无论是何种版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都是“全集”“选集”“文集”中不可或缺的,由此可见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重要位置。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于3月14日逝世的马克思时,用英语即席发表的讲话,实为悼词,原无标题,目前的标题是后人加上去的。这个讲话是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面向全世界发表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讲话——对于正在沉痛哀悼的世界无产者、对于正在弹冠相庆的世界资产者,这个讲话都是一个庄严的宣示:由卡尔·马克思开创并领导的旨在解放全人类而首先是解放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因其创立者马克思的逝去而终止,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将会继承他的遗志、在他开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直到完全实现《共产党宣言》所确定的目标。

恩格斯的《讲话》虽然只是一个即席发表的悼词,全文不超过1500字,但包含了很丰富

的内容、阐述了极深刻的主题——《讲话》从多个侧面全面、深刻、简洁、精准地概括了作为理论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革命家的马克思的一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伟大贡献,从而毋庸置疑地树立起马克思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崇高形象。

《讲话》中,恩格斯首先肯定了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575}在这段话中,恩格斯高度概括地、极其精练地表达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即历史观:生产关系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作为基础的生产力拥有对生产关系的解释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作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拥有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权。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说始终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之所以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是因为“过去……做得相反”^{[1]776}。此前数千年人们的历史观尽管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其共同的特征是颠倒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贬低乃至完全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事实,因而完全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是对数千年来完全错误的唯心史观的拨乱反正。

《讲话》中,恩格斯将剩余价值规律列为马克思的第二大发现:“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

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576}在这段陈述中,恩格斯简练、精准地表述了马克思毕其一生所追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尖锐地指出资本、雇佣劳动、商品及其流通等,其最终指向和终极目的就是追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创造的,而是由资本家购买的、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但被资本家占有了、拿走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也都进行了长期研究,但是,或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或是出于认知能力的不足,他们都不能辨别雇佣劳动中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资本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即使他们中的佼佼者——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其研究成果也仅止步于“劳动价值论”,未能发现“剩余价值”。此后,正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成果,另辟蹊径,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等,层层剥去了“工资”这块蒙在“剩余价值”上面的遮羞布,露出其血淋淋的真实面目,从而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历史学教父”希罗多德认为,识破并说破世间大秘密的人都是伟人。所以,识破并说破天体运行之秘密的哥白尼、识破并说破有机界和人的秘密的达尔文、识破并说破自然界和物体运动之秘密的牛顿等,无疑都是人类中的伟人。与蒙昧时期(史前时代)、野蛮时期(原始社会)相比,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便进入了“文明时期”^{[3]17-23},从而不再“蒙昧”、不再“野蛮”了。这个“文明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后有近万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不再用“不蒙昧”“不野蛮”作为“文明”之标准,而用“自由”

“平等”作为“文明”的尺度,那么,这近万年的“文明时期”却是很不“文明”的,因为存在了5000多年的奴隶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400年左右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有剥削、有压迫、贫富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这些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阶级存在不同,但都具有私有制这一共同的基础和本质——私有制是阶级社会一切罪恶之渊藪!惟其如此,识破并说破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消灭私有制”^{[4]271}的马克思,被恩格斯称为“科学巨匠”“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乃是实至名归。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都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其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之巨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在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进行阐述和作出评价之后,恩格斯在《讲话》中接着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575}

接下来,恩格斯在《讲话》中重点论述了作为“科学巨匠”的马克思对于科学的贡献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对于“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对“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贡献。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575}的思想家。他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对作为产业革命象征和现代工业心脏的“机器”作了精辟的分析,其见解受到曾任国际工程师协会首任主席约翰·布劳恩的极高评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由于马克思的不懈努力,国际无产阶级才第一次“意

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576}。

马克思之伟大,不仅在于其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贡献,还在于其具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伟大人格。恩格斯在其《讲话》中真挚地、动情地对马克思的人格作出了崇高评价:鉴于马克思毕生从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事业,“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但是,“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1]575}。马克思是全世界资产者共同的敌人,与此同时,他也是全世界无产者共同的朋友。“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1]777-778}所谓“私敌”,顾名思义,就是基于私利或私怨而结成的敌人,因为在一个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所以,只有那些超脱了“私利”、远离了“私怨”的人,才没有“私敌”。这种人内心干净得纤尘不染,灵魂纯洁得如同水晶,在世间是少之又少的,其难寻之程度恰似寻找“凤毛”和“麟角”,故东西方均称其为“圣人”。在恩格斯和世界无产者心目中,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圣人”——“为人类而工作”的马克思“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264}。

马克思因无“私利”、无“私怨”而无“私敌”——他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伟人!

《讲话》是中外千字文经典中最伟大的作品,它仅用千余字就情文并茂地将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发现”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关系、从而将一个极其深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与关系,演绎得丝丝入扣、严谨通透,因而具有强烈

的感染力和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服力。

一字千金,成就了千古绝唱!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拜读这篇《讲话》了,只记得每当读时都情不自禁、热血沸腾:对于马克思,《讲话》是沉痛的悼词;对于资产者,《讲话》是讨伐的檄文;对于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讲话》犹如第二个《共产党宣言》。惟其如此,还记得每当面对恩格斯的这一《讲话》,总会想起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和色诺芬在其师苏格拉底墓前的誓言,想起亚里士多德在其师柏拉图灵前的悼诗,想起诸葛亮在其主刘备死后那篇声泪俱下、誓师北伐的《出师表》。历史如此这般高度的相似,无非是在昭示后人:生做人杰,死亦鬼雄;思想不灭,虽死犹生!

三、唯物史观的发现及其对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意义

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出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5]。其夫人燕妮系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千金,乃世袭贵族,是普鲁士(当时德国尚未统一)上流社会的才女;其妻兄冯·威斯特华伦是普鲁士国王御前的内务大臣。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马克思接受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普鲁士最好的教育,按照常规,他本来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上流社会,做官、从商,或从事科学、教育事业。就其本人的志趣而言,他原本是想做一名学者或大学教授的。大学毕业后,马克思之所以未落入一般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窠臼,而反其道埋头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其大学时期倾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先后服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后来根据恩格斯的提示和建议倾力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直接相关。1841年,时年23岁的马克思从柏林大学毕业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1845年,时年27

岁的马克思已经完成了被恩格斯称赞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者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革命家,一位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华丽转身,仅仅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就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成长而言,这是一个奇迹;就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言,这是一个福音。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西方的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于大哲学家康德,繁荣于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黑格尔,终结于彼时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果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分别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脱不了干系,但“本质上是革命的”,所以分别作为“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接受,而后他们对其加以改造,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世界观的根本变革。

哲学是最早形成的、人类用于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工具,它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其认识的结果就构成了人的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正确与否则决定着人们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判断和所作结论的正确与否。所以,对于同一事物或世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看到的是一个样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看到的又是一个样子。对于哲学,多数人是日用而不知,明明身在其中,却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人们思维的这种混沌状态常常导致其对事物的错误认识,其中包括对自然界的错误认识、对社会的错误认识、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认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所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首先从清理旧哲学开始,当然,重点是清理

彼时最接近真理的、含有“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的德国古典哲学。

从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政治家、思想家梭伦至近代早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界,其自然观就是其世界观,所以,哲学被认为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或知识体系。这个世界观事实上由两大部分构成,即认识论和方法论。认识论是“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是哲学的基础,即“理论”^{[6]246};由于在“物质与精神谁为第一性”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其下形成了两大派别,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6]246},它是哲学的工具,即“方法”;由于在“世界是运动、发展的还是静止、循环的”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其下形成了两大派别,即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纵观人类的认识史和思想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扭曲了的哲学,其对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认识是不科学的,因而是错误的;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一种其看法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哲学,其对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认识是科学的,因而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复杂的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作为人类认识事物的正确理论与方法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从来没有实现过统一,即使集西方哲学之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也未能实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同唯心主义“同居一室”;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住在一起”。所以,黑格尔以具有革命性的思想方法,却得出了极其保守的政治结论;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却“将小孩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他丢掉了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辩证法。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这一重大使命,历史地落在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肩上。

马克思开始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志向是做一名法学教授,而且也做好了赴任的准备。由于在大学毕业前后其思想先后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其志趣很快由法学转向哲学,先是加入“青年黑格尔左派”,一段时期后,又投入“费尔巴哈派”。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倾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摒弃其唯心主义;在理论上即思想体系上倾向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摒弃其形而上学。其在哲学思想上的矛盾显而易见。这一点,马克思自己也觉察到了,于是他决心对此进行清理,这一决心由于1844年在巴黎同恩格斯的会见而得到了加强,从而变成了两人的共同行动。当年他们合著了《神圣家族》,批判了他们自己曾经身在其中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并首次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次年,马克思因参加革命活动被逐出巴黎,迁居布鲁塞尔。在这里,他着手清理费尔巴哈哲学,打算写一本书对其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评述,批判地肯定其唯物主义,否定其形而上学,为此他首先写出了纲要,这就是被恩格斯赞颂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该提纲仅有1500字左右,列出了11个问题,有的问题短到只有1行字,却点出了费尔巴哈哲学——更不用说低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其他唯物主义——的缺陷,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出自己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区别。1845—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继续清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揭露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1847年,马克思

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1847年10月,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马克思恩格斯着手起草该同盟的纲领。该纲领最初定名为《共产主义原理》,以问答形式出现,由恩格斯执笔写出初稿。当年12月,马克思停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与恩格斯一起全力投入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工作。两人先是商定将《共产主义原理》改为《共产主义宣言》,后又决定将《共产主义宣言》改为《共产党宣言》,将其作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理论基础和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以《共产主义原理》做基础,《共产主义原理》的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宣言》是集两位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截至1848年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所有研究成果之大成。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即世界观学说的日臻成熟,其中,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最为精彩,唯物史观的三大支柱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最终推动力、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跃然纸上,为随后剩余价值的发现提供了哲学工具,为再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四、剩余价值的发现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之意义

就在马克思专注于对青年黑格尔派、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清理的同时,青年恩格斯由于职业原因来到了英国产业革命的策源地曼彻斯特市参与经营一家其父亲参股的纺织厂,并在此后由办事员一直做到股东,成为老板。在这里,恩格斯目睹了工人穷苦的生活状

况,阅读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其观察、研究、分析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世上第一部揭露工人阶级真实生活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通过该书使全世界无产者明白:除了社会主义,他们再没有其他的出路……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才会成为一种力量。^{[3]271-287}这是该书的基本思想。此前一年,184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刊物《德法年鉴》上已发表过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用社会主义观点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乱象,认为那些乱象都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后来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说道:“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拜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支点是数学,鉴于马克思精通数学且对微积分有很深入的研究,恩格斯建议马克思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彻底揭开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而自己则继续分担清理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责任。以后的情况世人都很清楚:马克思倾其半生之精力,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于1875年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等一系列将会改变无产阶级和人类命运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剩余价值规律,就是在这一时段完成的。而恩格斯则先后于1879年出版了《反杜林论》、于1880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于1883年完成了其全面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自然辩证法》、于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1886年出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著作。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将马克思

不足 1500 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面展开、充分论证,为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圆了其“亲爱的卡尔”生前未来得及实现的一个“梦”。

从进入奴隶社会起,社会便形成了阶级,富人剥削和压迫穷人已是社会常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夺和压迫,本质上没有改变,只是形式上改变了。剥削的秘密被雇佣劳动,被工人劳动与资本家付出工资“等价”交换,被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掩盖住了。显然,识破资本主义的秘密需要天才的智慧,而说破这一秘密更需要伟人的胆识。

由亚当·斯密和大卫·嘉图所创立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进步意义的结论。两位“经济学教父”对此未再深究下去,他们留下的问题是: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那么多,为什么工人只得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绝大多数都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其实,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只有几步之遥,两位大师为何就此止步?对此,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7]504}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资本主义的秘密,能看破又敢于说破的人,才是具有大智大勇的伟人。这个人,就是发现剩余价值并将剥削的秘密告诉全世界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要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雇佣劳动,这是一种与奴隶制下的奴隶劳动、封建制下的农奴劳动性质不同的劳动。与奴隶、农奴完全失去自由、半失去自由相比,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契约关系——雇主(资本家)用资本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而付出工资,劳动力就是商品,工人在表面上是“自由”的,他不是资本家的附属品,资本家只是用工资来交换工人的劳

动力。这样的经济制度似乎无可厚非。但马克思发现,劳动力并非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不仅能再生产出它本身的价值(即所谓的“工资”——资本家购买工人劳动力的价格),而且能创造出比它本身价值大得多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工人看见了,但拿不到,它被资本家占有了,这就是剩余价值。换言之,工人的劳动时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必要劳动时间;二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对于雇主的意义只有一条:创造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剥削阶级集团剥削收入的总源泉,其表现形式或为利润、或为地租、或为利息。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7]679}他告诉人们: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既然如此,资本家一定会想方设法使剩余价值最大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剩余价值又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方法)有两条:其一,延长工作日即劳动时间的长度,以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其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其中,由于工人的逐步觉醒特别是 8 小时工作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逐步法制化和普遍推行,靠延长工作日以使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绝对剩余价值的做法已行不通,于是资本家纷纷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入手,以使工人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其重点是开发新技术、发展大工业。所以,新技术的开发和投入生产,对于资本家来说,它标志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对工人来说,却意味着相对贫困程度的加重。

此外,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还澄清了关于价值创造的两种糊涂认识。一种糊涂认识是,认为价值是由资本创造的。对此,马克思批驳说,

资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体现在生产资料身上的那部分资本,它只能不变地转移到产品身上;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即购买劳动力、体现为工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其价值是可变的,其增殖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还有一种糊涂认识来自亚当·斯密,他认为,转化为资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作为可变资本了,而事实是:全部资本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生产资料占去的资本),比可变资本部分(工人工资占去的资本)增殖要快得多、高得多。

剩余价值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其看破难,说破更难。“剩余价值”作为近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耀眼的真理性范畴,最先出现于马克思1857年10月—1858年5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恩格斯评价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展开起来的。”^{[1]243}

五、“两大发现”导出“一个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应运而生

马克思青年时期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而投身学术活动和理论研究的,但他发现,即使当时处于认识最高水平的哲学和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利弊得失保持缄默,其中有利害的掣肘,也有认识工具落后的原因。于是,马克思从大学毕业后就着手清理旧哲学和旧经济学的遗产——留其精华,去其糟粕,意在彻底清理的基础上重新锻造两件新的认识工具,用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剖析,发现其问题,改变其制度。由于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特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许许多多此前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便豁然开朗了,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指向该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对于马克思这“两大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恩格斯

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1]44},列宁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7]两大“认识工具”使马克思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得出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5]559}这个结论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结论。该学说认为:劳动社会化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物质基础,完成这个转变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几乎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资本主义从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期便开始萌芽,因不满意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就从那时便开始出现了。早期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虽并未使用“社会主义”这一名称,但其内涵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同或相似。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826年在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上最早出现了“社会主义者”这个词。1832年,在法国的《地球报》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首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用以区别于其他的“主义”。183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广泛流行,其含意多有提倡社会公平正义的意思,为社会中下层人所向往,所以响应者众多。

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张扬社会主义旗帜的流派很多,根据其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即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们常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其性质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批判也比较彻底,较为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能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与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完全不同,它的如下特征其他社会主义所不

具备、唯科学社会主义所特有的:

其一,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其宗旨是解放全人类,首先是解放无产阶级自身。

其二,它有两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二是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

其三,它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死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趋势,并为加速其实现而奋斗。

其四,它是实践的社会主义,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6]}而当理论已经成熟,纲领已经明晰时,“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3]。毕竟社会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

其五,它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仅有“批判的武器”是不够的,还应当对其进行“武器的批判”,以武装夺取政权。

其六,它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其七,它认为,作为阶级社会中万恶之源的私有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生产力的发展,将被消灭;在此之后阶级将不复存在,国家也逐渐走向消亡。

以上特征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故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笔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是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5][378]},而且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并列的,互不隶属。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内容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是,并列的“三个组成部分”未能明确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主从关系、因果关系、工具与目的的关系等,这无助于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恩格斯对此是很

在意的,他的《讲话》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着力于阐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视后者为归宿。笔者认为,如果一言以蔽之地概括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或理论,其内涵与“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其外延要大于它,因为它将其包括在其中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它的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工具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它的经济学基础。总之,是马克思用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托起了科学社会主义这座大厦!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科学的哲学基础和科学的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一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

六、伟大创举、成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主义事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天下”,奉行“和合”哲学的伟大民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在中国已存在了两千年,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尚未诞生时,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后,它就不再仅仅是愿景,而是有了实现的根据。这说明,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里,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潜伏着朴素的“大公”思想和“大同”意识,中国改革开放后能以40年之努力,走完西方走了300多年的路,原因虽然很多,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尤其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无疑是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偃旗息鼓之时,美国学者福山曾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作出了“终结”的结论,时评称之为“历史终结论”。福山的话刚刚落地,2008年,一场肇始美国、席卷欧洲、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便爆发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却以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气势和速度迅速崛起,由富而强。这时的福山自知丑话说早了而且说错了,之后曾两次对其“历史终结论”进行修正、调整。看来,西方的某些学者,即使名大、位高、言重如哈佛大学教授福山者,自以为已经看清了社会主义在苏东是怎样“落幕”的,但怎么也弄不明白发生在落后的世界东方的“中国故事”。其实,“中国故事”很简单: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降龙伏虎、移山倒海、砥砺前行,终于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动人故事。“中国故事”表明:中国是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等生”。

马克思主义曾经通过十月革命传播到全世界,为什么于20世纪初在中国“落地”了而且“生根”了?其原因并不复杂,那是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理论需要的程度”^{[4]10}。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不是用资本剥削取代封建剥削实行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恰在这时,马克思主义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契合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潜意识中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追求,这种契合,在今天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民族根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预示着它有一天会在中国“开花结果”。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15}7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的闪电”射入了“没有触动过”的中华大地;又过了30年,中国人终于“解放成为人”。

时间原本是个定值,1天就是1天,1年就

是1年,但这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如果用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时间,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历史的脚步“步履蹒跚”的时候(如中世纪),“20年等于伟大历史发展中的1天”;当历史的脚步“只争朝夕”的时候(如产业革命),“会有1天等于20年的时期”^[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是用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以“1天等于20年”的速度前进的,所谓的“中国速度”,其秘密就在马克思的这段话里。正是以这样的速度,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用300年走完的路程。

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归根结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其对全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刘西琳.大音无声 大象无形——未名湖畔听季羨林先生说东西方文化[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80.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C].北京:三联书店,1958:127.



引用格式: 聂海杰. 习近平“新时代”理念内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23-31.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2-0023-09

习近平“新时代”理念内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The Marxist theory logic of XI Jinping's concept of New Era

聂海杰

NIE Haijie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理念就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一是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唯物辩证法, 既肯定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 又依据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 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研判, 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与“不变”有机统一的发展逻辑。二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 又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探索成果, 牢牢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三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为支撑, 将党对人民群众的地位、作用和情感升华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 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新时代的主体地位; 极大强化了党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 深刻凸显了新时代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逻辑的阶级立场。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理念的丰富内涵意义重大, 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 而且也能为我们“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提供重要理论武装。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辩证法;
实事求是;
人民至上

收稿日期: 2017-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KS009);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ZJH-607); 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聂海杰(1981—), 男, 河南省尉氏县人, 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这个重磅概念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以极高的频率和极大的感染力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这个贯穿全篇的理念,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彰显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一、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通篇贯穿着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种辩证智慧在“新时代”这个理念中得以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提醒我们要注意把握两个“不变”,即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提醒我们要注意把握一个新的“变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10}。这一看似对立的论断实则浸透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智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一辩证规律,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和本质逻辑。“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无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就其生命力而言,每个社会形态都会存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在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的本质和性质会相对地保持长期不变。典型的例子如西方号称“千年王国”的中世纪,以及东方有着“活的化石”^[4]之称的中国封建社会。然而与此同时,社会有机体本身并没有丧失活力,而是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在发生变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

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会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的提高而得以提升;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会因此逐渐地发生变革。贯穿社会发展这一内在本质规定的是量变和质变的有机统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在起初并不起眼,并不足以让整个社会一下子就面目一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量变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引发质变,社会有机体的本质和性质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在“旧世界”消逝的同时,“新世界”随之而诞生。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辩证法思想贯彻到了对我国社会本质和性质的考察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深刻的哲理剖析。一方面,我国社会的本质和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们现今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非高级阶段,决定着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在悄然地改变着自己的容颜。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2012—2017年,我国GDP总量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新跨越,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仅为30.1的恩格尔系数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了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加入,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受到全球注目,被写进2017年联合国的

主要文件中,中国不断给世界发展注入活力,引领世界发展新潮流的能力增强。这些历史性变革赋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崭新的面貌,表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前者唯物主义地肯定了我国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6]16};后者则辩证地揭示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演进过程中将出现阶段性质变和渐进性飞跃的客观发展逻辑,即必然在保持自身的本质和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而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即新的发展形态。

因此,“新时代”这一理念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邃智慧。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的高度,透过现象深入到我国社会的本质,揭示了其“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对其发展阶段作出了极为精确的科学把握。

二、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

“新时代”这一理念还蕴含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何会发生转变?这一变化为何就必然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牢牢将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贯彻到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中。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对此作出了科学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的根本要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对此有过经典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7]801}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要深入

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8]。因此,所谓“实际”就是客观世界,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目的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就是要去研究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依照唯物史观,它是由该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共同决定的。各个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够区别开来,就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各不相同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它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各不相同。唯物史观明确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界定为社会的基本矛盾,认为这一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并决定着它的性质。社会基本矛盾的这一作用又是如何发挥出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必然会在经济生活领域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多个矛盾)反映出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9]322}因此,社会基本矛盾必然在经济生活和上层建筑领域以某种形式突出地呈现出来,而这个在矛盾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因此,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对二者作出科学的区分,才能认清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与社会形态发展的本质联系的原理,为人们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中国共产党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成为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科学依据。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此,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认

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两条道路”和“两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0]。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同时也对这一主要矛盾的本质作了界定,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1]。接着,1959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214}。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认为这一矛盾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12]215}的新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相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同一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斗争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予以解决。基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对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发展程度和所处阶段作了初步分析。他先是认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他又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13]。这些认识不仅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

展,而且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进一步的探索。邓小平既肯定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也实际上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14]181-182}。他立足于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客观实际,作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14]252},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这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5]79}。这一思想得到了其后历届党中央的认同。例如,中共十五大报告就重述了邓小平的这一看法:“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6]4}我们处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其特殊,它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经的特定阶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这个阶段的基本矛盾是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非对抗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之相对应,邓小平对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

* 邓小平同志对此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

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4]181}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作了规范性表述:“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5]345}基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界定及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认识,党领导人民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从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中共十九大报告的内容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问题承接了过来,其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10}这一论断,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认同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非对抗的矛盾这一结论;也继承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同其关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自觉以这些实践经验和思想为理论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地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展开了新的探索。

这一新的探索有着深厚的实践根基,牢牢奠基于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二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我国总体上实现了小康,“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8}。“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全方位的、

开创性的。”^[16]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意味着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落后的生产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然而,在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遭遇了一系列新的结构性难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1]9}。这些突出的问题事实上正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转化的突出特征。“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9]322}因此,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变化了的实际,根据其所呈现出的新的矛盾特质,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的科学结论,由此得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10}这一科学论断。由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由于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不相适应,并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或不均衡,因此,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旧的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是新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那么,“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从五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内涵。其一,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征程。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

制度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社会形态却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和渐进性的飞跃。其三,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而且极大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其四,实践证明,我们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之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实现本国和本民族的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五,中国刷新了人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制度不但不输于资本主义,而且有所不及的理论优势和制度优势。

因此,“新时代”这一科学理念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论断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之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三、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立场

“新时代”理念还蕴含着鲜明的价值观立场。中共十九大报告为何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当下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这有两个依据:一是客观的现实依据,即我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二是重要的价值观依据,即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人民至上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追求。

人民利益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103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以往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根本对立,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将历史的发展与前进归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参与并积极推动的结果,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是不断朝着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

利益的方向前进。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始终秉持的根本理念。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宗旨极其彻底地贯彻到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她把解放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奋勇拼搏,一往无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7]276},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把进一步提升人民主体地位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17]239},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她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党对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早在2012年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18]4}。这一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坚决捍卫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理念,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旨归,并在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进程中得以升华,将之提升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19}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科学界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蕴含着丰富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

其一,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新时代的
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
力量的源泉。”^{[18]5}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亿
万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自觉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个人梦有
机统一,奋力拼搏、辛勤劳动,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和新时代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和智慧,
他们是新时代当之无愧的“最可爱的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新
时代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离不
开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党中央对此高度肯
定。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累计
203次提及“人民”二字,并明确指出:“五年
来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19]一个
“更”字深刻展现了党对人民创造新时代的
伟大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

其二,极大强化了党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
感。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18]409};“诚心诚意做人民
的小学生”^{[19]318};“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
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
向智者问策”^{[18]27}。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情
感。这种情感延续了以往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践过程中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的优良
传统,又基于新时代的新实践把对人民群
众的尊重和爱戴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实质
上是把“尊重人民”升华为“敬仰人民”。
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这种“敬仰”绝
非抽象的政治辞令,更非西方资产阶级政
党的意识形态谎言,究其实质,这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重要
作用的情感共鸣,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思想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地位的理
性认同。

其三,深刻凸显了新时代党执政理念和
治国理政逻辑的阶级立场。在习近平总书
记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是推动时代发展的
主体,更是决定时代发展道路和方向的主
人。在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
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20]问题从何而来?“问题
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
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1]时代所提出的一
切问题,本质上都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
生活实践及其利益诉求的深刻反映,因而
一切时代问题都是人民群众的呼声,都是
其作为时代主人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深
切愿望和利益要求。因此,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天职就是“答卷”,
即“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
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
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
和人民满意的答卷”^{[19]410}。中国共产党
不但要认真“答卷”、积极解决关涉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且要“答好
卷”、力争取得优异的成绩,要以赢得
“阅卷人”即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其执
政的最高价值追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
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
泉。”^{[19]40}“时代出卷—党来答卷—
人民阅卷”的崭新执政理念和治国理
政逻辑,不仅极大彰显了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一贯宗旨,而且也突出
展现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
阶级立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
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而且创造
性地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赋予其别具中国特色的丰富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9]²¹⁴ 中国共产党明确将这一崭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确立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观,将“以人民为中心”牢牢贯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价值观立场。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目标,其直接目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产能过剩等突出问题,根本上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政治领域的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其直接目的是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制度支撑,根本上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文化领域的文化强国目标,其直接目的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根本上则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素养;社会建设领域的和谐社会目标,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根本上则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美丽中国目标,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根本上则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即为了在当代中国逐步实现其全面自由发展。人民至上的理念也牢牢贯彻到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的侧重点则是要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也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

报告中再次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1] 这个“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服务的真心,就是时刻都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宗旨的恒心。可以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开展的一切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为了人民;亿万人民的支持和信赖鼓舞着党竭尽全力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谱写壮丽诗篇,铸就伟大事业,因而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道靓丽风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必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理念,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这一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成果,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变革和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基于新时代的新实践对之作出了丰富和发展。“新时代”这一理念的提出,深刻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厚度和科学维度。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理念的丰富内涵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而且也能为我们“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提供重要理论武装。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

- 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45.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413.
- [6]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24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8.
-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 [1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72.
-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6] 韩庆祥,黄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理解[J].哲学研究,2017(12):3.
- [17] 吴正裕,李婕,陈晋.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C].外文出版社,2017.
- [20]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EB/OL].(2018-01-05)[2018-03-2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1/05/c_1122217981.html.
-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



引用格式:马寒.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机遇[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2):32-4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32-10

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机遇

On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hina

马寒

MA Han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一方面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网络社会和国内各种思潮的严峻挑战,必须进行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伟大斗争;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理论、经济、文化和外部环境四个方面,其发展和壮大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现实基础,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竞争优势,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需要我们抓住并主动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

关键词:

主流意识形态;

历史机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收稿日期:2017-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D002)

作者简介:马寒(1978—),男,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深刻阐明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历史机遇,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进而丰富和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课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改革发展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这不仅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交往规则朝着开放包容、互惠共赢方向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引领作用。中共十九大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28}。从整体上看,虽然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竞争“西强东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平崛起的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现实上看,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积极防范和抵御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效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平稳、趋势向好。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牢牢把握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本文拟从理论创新、经济增长、文化繁荣、外部向好四个维度阐述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重要历史机遇。

一、理论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8}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前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思想从理论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从实践上深刻指明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路径,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历史表明,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里,主流意识形态都深刻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居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位置。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我国也正在经历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各种理论学说和社会思潮都力图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找到自我展示的舞台和实施影响的空间。面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交错并存的新形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效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实践证明,任何一种止步不前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不能长久引领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样如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人民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

的历史高度,深刻阐述了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不渝的根本使命,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历史跨度,将社会主义划分为六个基本阶段,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往哪去”的重大问题,而且有力证明了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它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的发展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有力批判了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论”,指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而为人类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内涵。其二,有力反击了各种错误理论的诘难,维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3]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外各种错误理论和社会思潮蜂拥而起,它们用“威权政党”“弹性政府”等论调曲解我们党的领导、质疑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合法性,用“国家资本主义”“新型社会民主主义”等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

断。”^{[2]1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向世界鲜明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评判标准及其对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威权有力回击了各种错误理论和社会思潮的诘难。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过程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不仅确立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指明了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28}其一,它指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对新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2]19},应以宽广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大力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根基所在。其二,它指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中心工作。“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153}这个重要论断是从两个层次上来讲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讲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层面,而“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讲的是上层建筑层面。意识形态工作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并反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发展要着眼于两个问题:从经济基础角度讲,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上层建筑角度讲,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升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权和话语权。其三,它指明了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必须注重增强其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使主流意识形态为治党治国治军、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发展稳定等工作明确指导思想、汇聚强大力量、凝聚广泛共识。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 马克思这段论述明确表达了三层逻辑关系:一是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作用;二是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为群众所掌握;三是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有力地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能够并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了全党的战斗力和号召力。当前,我们党是领导具有8900万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凝聚起全党的力量,集中精力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解决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使长期存在的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扭转,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权威。我们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扎实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教育党员、武装干部,有力推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好转,使全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其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了全

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共十九大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29} 这三者具有层递的逻辑关系,而基础在于人民要有信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4},并用涉及人民生活实际的“十个更”描述了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工作导向。5年来,我们党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教育优先发展、创新创业、全覆盖式社会保障体系等一大批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在使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的同时,更增加了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理论信服和执政信心。中共十九大更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强调“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保证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1]16}。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把远大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统一起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合法性,而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经济机遇: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质量逐步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40年来经济发展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5]247}。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不仅有力证明了道路、制度选择的正确性,而且也为发展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持续发酵等国内外情势的消长变化,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步入了空前的战略机遇期^[6]。

1. 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从正反两方面比较中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7]这说明,任何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有力的辩护力和说服力最终都要归结到经济实力的强弱上来。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说服力,是在综合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其一,“西降东升”的现实比较。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意识形态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西方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债务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普遍质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危机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弱点,并让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招致新兴世界齐声谴责”^{[8]255}。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的强势崛起,打破了西方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话语垄断,不少西方国家纷纷向中国寻求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智慧和方案。连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贡献”^[9]。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

施奈德更是对中国推崇有加,认为“山的一面是稳定,一面是危机,迄今中国在山脊走得很好”^{[8]240}。其二,责任担当的道义比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损失惨重,持续多年的经济复苏乏力,拖累了全球经济的有效增长。为了复苏经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策略,收缩经济开放限额;另一方面大打贸易战、破坏贸易规则,企图扰乱国际经济秩序并转嫁其危机。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壁垒,以平等协商代替规则霸权,积极适应并引导全球化,承担国际义务、展示大国担当,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推进全球化向“开放、包容、互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三,发展模式的制度比较。中国话语权之所以不断提升,归根结蒂在于我国经济制度的固有优势。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市场主导与政府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管理模式,将长远规划与年度规划结合起来的运行机制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中共十九大又在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提下,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举措,注重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相协调、优质供给与社会需求转换相协调、城市繁荣发展与乡村振兴相协调、全面对外开放与内部创新驱动相协调等,在国际范围内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强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2. 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解决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这在教育、社会科学和文化三个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教育领域,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2016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突破 3 万亿,连续 5 年保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以上,在总量上比 2010 年增长了 2.1 倍;构建国家院团、地方院团、高校社团、社会资源、艺术专家等多方参与的高雅艺术、民间艺术、道德模范、理论宣讲进校园、进乡村活动模式,近 10 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 6 亿多元,活动范围和场次逐年扩大,有效保障了教育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主阵地的建设与发展。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智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各类专门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资金投入。2017 年,中央安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 18.7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10%;安排国家高端智库经费 2.8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12%。^[10]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也逐年加大。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投入的不断增长,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理论创新,进而为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在文化领域,2016 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达到 1.23 万个,共演出 230.6 万场次,其中赴农村演出 151.6 万场次,占比超过了 65%;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着力解决公共文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央财政全年共落实补助地方专项资金 61.03 亿元,用于支持“三馆一站”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等文化项目。文化建设经费总额达到 770.69 亿元,是 10 年前的 6.26 倍;全国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逐年增长,并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截至 2016 年底,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达到 3.4 万个,受众人数超过 5 亿人;中西部地区文化事业经费

达到 400 亿元,占比 52.3%,超过东部地区,其中县级以下占比 51.9%。^[11]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文化建设投入的整体增长,以及文化供给向基层下沉,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有力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城乡基层群众的凝聚力和统合力。

三、文化机遇:文化强国战略的實施和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竞争优势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2]²⁸这就科学地界定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文化发展又为发展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内在支撑。历史地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注重发挥文化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共识、发挥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将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上升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优秀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根和魂的高度来把握,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从而为更好地发挥文化在发展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竞争优势。

1. 文化内涵的拓展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新阐述,拓展和深化了文化的内涵。他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与这三个方面不可分割,并纠正了一度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排斥在社会主义文化之外的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3]163}这就深刻阐明了文化、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表现)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

2. 文化体制改革优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政治法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2]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注重文化建设顶层设计,出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制订实施新老媒体融合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文化企业效益评估体系、文化管理股权试点、文化产业制度改革、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40多个改革文件。据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确定的104项文化改革任务已经完成97项。^[13]2018年,中共中央又出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及具体改革方案,着力推进包括文化管理体制在内的重大改革,对文化管理机构及其职能行使进行了科学布局,将涉及“文化一意识形态”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内容全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统筹范围之内,大大优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环境。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国家大力加强文化立法尤其是互联网立法工作,颁布实施了《网络安全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涉及网络文化领域的法律从原来的4部增加到7部。这些法律的出台大大缩减

了网络不良文化的传播空间、寻租空间,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中占主导地位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3. 优质文化供给的增长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当前,在文化和社会思想领域,主流价值引导与多元价值诉求同在、主流思想观念和非主流思想观念并存、先进文化与各种文化交织。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在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14],这表明存在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渗透具有隐蔽性。近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致力于提高优质文化供给,消除不良文化侵蚀,文化产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产业投融资活跃,文化市场活力不断释放,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文化艺术服务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产值均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对内不断增强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大力实施“文化金融扶持计划”“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计划”“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计划”,出版传媒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演艺产业、教育培训产业、新媒体产业迅猛发展,每年均有大批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优质文化艺术产品出现。对外坚持文化“走出去”战略,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文化供给,2018年,仅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项目就高达40项之多。海外文化阵地和品牌建设不断增强,2016年全年对外文化交流项目2672项,2017年更是超过3000项。在俄罗斯、瑞典、希腊等国家建立中国文化中心30多个。“中国年”“中国节”活动走进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座城市,以

上千场文化活动,精彩地演绎了新时代中国故事。^[15]这些举措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保障。

4. 文化传播阵地建设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

近年来,随着文化传播技术的发展,我国文化传播手段多种多样、传播能力大幅度提升。从国内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披露,全国共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1900多家,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93%以上;电视节目2058套,卫星广播接收站约18.9万座,有线电视用户高达1亿;全国共出版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550.6亿册(份、盒、张)。^[16]此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互联网注册域名总数达2061万,居全球国家域名首位。^[17]与西方国家文化传播平台的私有化相比,我国以国家为主导的文化传播平台有充足的能力保障文化内容的主流化导向。从国际来看,一方面,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等国家主流媒体与多个国家的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中国电视台、中国广播电台落地数量逐年增加,使国外受众有更多机会听到中国声音;另一方面,通过与多个国家共办文化交流年活动、建立孔子学院和开设孔子课堂、青少年夏(冬)令营文化交流活动等,大力推进文化融通。在今天国际多元文化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这些举措有力地拓宽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从而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将话语权和主导权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四、外部机遇: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共十九大对我国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进

行了准确的研判,不仅从宏观上作出了“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而且对世界发展正向趋势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1]39-40}。国际环境尤其是国际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夺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 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回顾历史,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而言,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发生过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自二战结束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两极争锋的舆论格局;第二次是冷战结束以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社会主义运动尚未复兴,西方舆论格局整体上占居有利位置;第三次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同时,也推进了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了更多的发声机会。在第三次形成的国际舆论格局中,虽然总体上我们还未从根本上摆脱被攻击的局面,但国际舆论对我国总体向好、国际话语权也正在调整过程中,有利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和壮大的外部条件正在形成。当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竞相发声,国际舆论格局呈分化趋势,正在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上“一言堂”的局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日臻成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为动力不

足的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声音的传播越来越广,赞成并运用中国方案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使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攻击不攻自破,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偏见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2. 牢牢占领道义制高点有利于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做到发声有力,在于它们善于利用各种处理国际事务的机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抢占道义制高点,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2]12}。对内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障人权;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惠及13亿多人口,大大提高了劳动人口素质;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扶贫,从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间,中国贫困人口明显减少,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实施“双创”计划和政府扶持计划,提高劳动人口就业创业质量。对外而言,中国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积极参与打击“三股势力”,切实履行《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义务。这些举措不仅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极大提升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认同度。

3. 中国国际话语权与世界感召力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国际话语权虽由多个方面构成,但最为重要的是制度性话语权,即参与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制订,维护国际秩序的权力与权重。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相关国际法的争执实质上就是制度性话语权的争

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18]。这是党中央放眼世界、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发挥上合组织会议、中国—东盟等区域组织的作用;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条件;发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用,推动改善国际社会磋商协调机制;致力于改善大国关系,阐释中国实践、展现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构建,等等。这一切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中国的倡议和方案已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领域得到认可和实施。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多项决议,为解决全球和地区性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以及做出的突出贡献,一方面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机制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迁的塑造者、建设者和书写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

五、结语

中共十九大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放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重大战略部署的首位,充分表明了我们对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历史自觉和实践自信。当前,要顺利完成中共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就要牢牢把握并主动用好多层面展现出来的难得历史机遇,立足实际、突出重点地破解主

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例如,在理论方面,如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教育,并以之为指导,推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在政治安全方面,如何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实践创新方面,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技术方法方面,如何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和传播技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效能,等等。发展和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需要我们抓住新机遇、研判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 党的十九大文件汇编[C].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47.
- [6] 张志丹. 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9.
- [7]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要两手抓[N]. 人民日报,2013-08-23(01).
- [8] 本书编写组. 西式民主怎么了[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 [9] 布热津斯基.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贡献[EB/OL]. (2013-06-28)[2018-03-20]. theory.people.com.cn/n/2013/0628/c184980-22013201.html.
- [10] 今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经费 18.7 亿元[EB/OL]. (2017-06-06)[2018-03-20]. www.xinhuaet.com/politics/2017-06/06/c-129625693.htm.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2016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7-05-15)[2018-03-20]. www.ce.cn/culture/gd/201705/15/t20170515_22803759.shtml.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C].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92.
- [13] 刘阳,郑海鸥. 坚定文化自信 开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新景象[N]. 人民日报,2017-07-24(01).
- [14]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 [15] 子夜. 让世界看见中国的文化自信[N]. 中国文化报,2018-02-28(02).
- [16] 2015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EB/OL]. (2016-09-01)[2018-03-20]. www.ce.cn/culture/gd/201609/01/t20160901_15472221.shtml.
- [1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7-01-22)[2018-03-20]. www.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201701/t20170-122_66448.htm.
- [18]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 人民日报,2015-10-14(01).



引用格式:谢浩.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战略选择[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2):42-4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42-08

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战略选择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e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谢浩

XIE Hao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南京教学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当今世界对中国经济全球化饱含期待,而中国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全球化显然有着本质区别。其中国特色在于,它带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基因,是走出西方霸权迭代循环的新模式,始终倡导构建开放性的全球合作结构。晚近以来中国独特的全球化实践和体验,以及中国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持,决定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中国领导经济全球化”,而是中国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式改变,为世界提供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模式。这样的全球化实现方式决定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内蕴国内、国际两个维度。而就新时代中国“变”与“不变”的发展现状来说,中国经济全球化正处于从致力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平衡充分的国内发展,向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世界共同发展逐步演进的、由内而外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

中国经济全球化;
中国特色;
参与式改变

收稿日期:2017-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ZZ029)

作者简介:谢浩(1990—),男,安徽省合肥市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南京教学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1 世纪的世界在经历两轮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全球化主张显然与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长期的全球化努力与逆全球化形势下积极的全球化态度,使得世界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充满期待。国际舆论中关于“中式全球化”“中国引领”“中国时代”等话语不绝于耳,但是考虑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环境,以及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全球化应是一个由内而外、更加注重参与式改变的过程。关于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呈现显然更具中国特色,也更符合世界期待。

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期待

在经历了 21 世纪的两轮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虽受牵连但在总体上保持了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转向有限国际主义时,中国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承诺向世界表明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态度。鉴于中国正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和世界都期待中国能在全球化逆势中有所作为。但是这种作为并非扛起全球化的大旗或领导世界经济,而是能力与理想相匹配的大国担当。

1. 走向中心:中国的积极态度与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 40 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世界经历两次经济危机之后,在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这边风景独好”的发展态势让世界为之瞩目。近年来,中国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增长速度普遍快于其他世界大国,与美国的绝对差距不断缩小。由于深受世界经济

危机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由重速度向重质量的发展方式转型,中国经济增幅在 2011 年之后有所回落,平均增速降至 7% 左右(同期全球的经济增速在 3% 上下)。即使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仍显示,过去 5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 35%,并将在 2020 年底前继续保持 30% 的贡献率。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和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进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将会与日俱增,中国走进世界中心是 21 世纪的必然趋势。

中国走向世界中心不仅表现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还着重体现于近年来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繁荣和提升世界善治等方面的积极态度与具体行动。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中国倡议在国际社会的曝光率、关注度都有了极大提高。2013 年,中国相继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经济占比超世界四成的沿线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之后,中国又相继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区域性合作项目。除此之外,中国还利用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2017 年博鳌亚洲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G60 汉堡峰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世界性平台,不断重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向世界发出全球化邀请,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见表 1)。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性的大国,其经济实力虽离主导全球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特别是作为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将自身的长

远发展与全球化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内,中国通过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进一步贡献全球;对外,中国立足自身实际逐步承担起大国责任,与各国一起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大国责任: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和平发展引领特征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应全球化发展之运而生。经济全球化出现逆势的实质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以资本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发展困境。对此,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1]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一言以蔽之:“难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其实现方式。”^[2]正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化才导致了全球化发展的逆势。

21 世纪的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全球化风向开始右转。经济大国纷纷回归保守主义、拥抱民粹主义,试图在全球经济萎靡期寻求独善其身的良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中国立足自身实际、顺应世界历史大势所做的全球化努力和承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世界担当,其鲜明的全球化态度和积极的全球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强国在全球化行动中的缺位,很好地弥合了 21 世纪的全全球化裂痕,使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多数国家服了一颗定心丸。

中国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改变全球化进程并提供可供世界参考的全全球化模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的发展;中国的机会就是世界的机会,中国的方案就是世界的方案。”^[3]中国经济全球化与学界普遍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等概念在内涵上有较多的重合,比较注重全球化方案中的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与中国主张等,如贾文山所说的“中式全球化”^[4],马丁·沃尔夫关于“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5]的判断等。这些提法与“东方全球化”“美国全球化”“西方全球化”同属一种论述方式,均强调某一主体对全球化进程的引领或主导,是一种国家权力和实力相结合,进而将某一主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推至全球的过程。传统“某国全球化”的概念必然通过资本导向性的

表 1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球化努力与承诺

时间	主题	场合
2015年3月28日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开幕辞
2015年9月26日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
2015年9月28日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2016年9月4日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
2016年11月22日	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2017年1月17日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7年1月18日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
2017年5月14日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开幕词
2017年7月7日	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上的讲话
2017年9月3日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7年11月10日	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 谋求亚太更大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权力获取方式,强制主导和引领全球化。而中国经济全球化则强调以自身的发展为基础不断将中国的影响推至全球,强调通过自身的发展不断扩大中国方案的接受范围,更注重利用价值引导和行为示范的方式获得全球认同。

中国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包含中国发展、中国影响、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等元素。其一,中国发展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的困境说到底发展的困境。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前提是中国持续健康的发展。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的发展。另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稳定、发展、开放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其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增进全球认同、凝聚全球共识的软实力。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并非是通过西方传统的强制手段获取的。中国经济全球化不仅在于其实力是否雄踞世界,更在于其观念能否赢得人心。^[6]中国影响达及全球是中国方案成为全球选项的重要前提。其三,中国主张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总结和提炼的发展理念、观点和看法,如当下中国结合全球化发展实际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等国际关系理念^[7],以及中国在多个场合强调的“包容式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等。这些全球化主张都是中国全球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表达了中国引导全球化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转变的意愿。其四,中国方案是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所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和行动,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实时态度^[8]。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中国在不同时期给世界提供的智慧和方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正为全球所认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方案不断被更多国家和地区所熟知、接受。其五,中国道路是决定中国经济全球化方向的根本。中国的全球化模式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全球化道路,涵盖了中国自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来所有的全球化选择、方案与构想。中国的全球化道路根源于高度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近代以来世界的全球化实践。中国道路不同于强制性的西方模式。相反,中国深知国情、世情对各国选择全球化模式的重要性,始终强调对他国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对于一个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再以自身发展贡献全球这一课题,中国经济全球化比西方模式更具普遍性意义和世界性参考价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9]不仅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追求,更是其在未来永葆发展活力的重要保证,这正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深受世界期待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经济全球化所体现的中国特色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参与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会有不同的体现。中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属性和要求。人类历史发展始终向前的规律决定中国经济全球化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通过参与式改变,中国一方面不断以自身发展维护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不断通过中国方案促进经济全球化更加公正合理;二是面向未来,在“新世界”的胚胎成熟之前,中国将以全球合作为基础,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资本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变,为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形态”的到来而努力。中国经济全球化所体现的中国

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带有社会主义基因的先进的全球化理念^[10]

全球化理念是全球化实践的灵魂,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发展前景。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离不开先进的全球化理念的引领。^[11]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源于中国对一种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更符合人类自我解放和自我发展要求的新世界的追求。社会主义因素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所在。^[12]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三是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四是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13]本质而言,这四个方面都是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展开的。说到底,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的全球化环境^[14],提供更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引导,助力全球化既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世界人民,最终迎来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时代。这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社会主义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精神引领。

2.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走出西方霸权迭代循环的新模式

从权力转移的角度看,已有的全球化历史是一个霸权迭代的循环,近代以来,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相继走上全球霸主的位置。但是,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世界中心论”“西方文明一元论”的论调已不吃香且终会过时,多元化、多极化必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全球化将日益强调包容、和平的发展,以往列强争夺领土和霸权、统治全球的历史已不可能重现。

中国以其被动全球化受害者和积极全球化受益者的双重体验,对经济全球化有着更直接的感受和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长期以来坚持将“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作为自己身份的追求^{[9]25},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从不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9]59}。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大变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全球化并不谋求取代美国而攫取全球权力。中国的承诺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其发展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威胁。中国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要摆脱西方逻辑,跳出西方霸权更迭的循环。这种全球化定位与当今中国极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积极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中国经济全球化也不主张颠覆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作为现有全球秩序的受益者,中国不会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全球秩序的颠覆者角色,而是作为“保守性变革者”,一方面在既有框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以自己渐进的实力和话语权推动全球秩序的渐进性变革。一言以蔽之,中国力图通过参与式改变抑或融入式变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既不充当保守者,也不成为颠覆者。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将始终作为一支包容性、开放性、发展性的力量,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到推进共享共治全球化的建设中去。兼顾中国利益和世界利益,中国经济全球化将始终致力于实现友好的、包容的和共赢的发展。

3. 中国经济全球化倡导构建开放性的全球合作结构

随着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G7)已经不再是世界经济的绝对中心,部分“边缘”国家(如金砖

五国)正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格局开始从单极走向多极,全球力量也从西方一元走向全球多元。权力分散、结构重塑的世界现实和大趋势,意味着以往靠单一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不再符合全球经济的整体性、多元化要求。面对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全球化将始终将自身的发展利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整体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倡导各国携手共建开放、包容、共赢的世界经济政治新格局。

(1)丰富全球化参与主体。未来,全球政策的制定与推出不会再局限于一两个大国,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也不再是一国特权,全球发展和全球挑战均需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在全球经济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应该更具包容性,反映发展中国家发展实际、发展利益的声音,应该在新的全球化中得到合理体现和公正对待。中国经济全球化在尊重既有全球治理结构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始终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丰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

(2)倡导无差别的国际合作。中国经济全球化不是组建大国俱乐部,也不想形成意识形态集团,而是强调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无差别合作。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中,中国没有对于种族信仰、国家规模、发展先后的分界线,始终强调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全球经济,平等共享全球发展。这样的体系不仅充分反映了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期待^[15],也是全球经济均衡、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3)构建开放的经济合作结构。开放、包容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区别于西方全球化特别是美式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历史上的诸多全球化困境几乎都源于主导国对新兴国的发展缺少包

容。全球化的开放程度很容易受到零和博弈心态的影响而走向保守和消极。欧盟对成员国的甄选注重地缘政治的相近性,美国对贸易伙伴的选择注重国家的亲美程度。相反,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和政策孤立化,特别强调合作结构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这在中国对“一带一路”、亚太经合组织等开放平台的准入设计中可见一斑。中国的发展源于开放,世界的发展在于包容。不同于传统大国全球化的态度,中国对于开放发展、包容发展一直持支持态度。

三、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重心选择

中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就其所处的大环境而言,中国经济全球化需从国内、国际两个实际出发,其在发展过程中又会反过来对国内、国际环境产生双重影响。从中国最终要走向世界中心的趋势和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来看,中国经济全球化也需要在发展目标上对国内、国际两个维度进行实时权衡。而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重心选择需根据中国发展实际和世界发展环境而定。

中国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国际两个维度上的目标是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国内维度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其主要内容;国际维度注重以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使命的世界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更加注重中国发展、中国方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以中国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的公正化、合理化发展为其主要内容。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向维度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外向维度转变的过程。鉴于国际环境的不可控性

和极端复杂性,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维度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其国际目标的逐步实现应以中国经济被世界需要的程度和中国改变世界经济的能力之增加为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全球化实践,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已经进入了必须把自身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来把握的新时代。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外部化倾向。中国经济全球化正在伴随着中国影响、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而走向国门,继而影响世界,从而逐渐成为现实。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处于由内而外的过渡阶段,我们需注重内外环境的互动性以确定对国内、国际这两个维度的侧重。当下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重心的选择必须考虑以下两个因素。其一,中国发展的现实。中国目前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依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并且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去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二,中国发展的世界环境。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仍然是全球化运行的大背景,我国将长期面对不公平但又强势的资本主义规则和正在衰落但目前仍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经济。鉴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全球化处在一个内外兼顾但更加注重内部发展的阶段,中国应以参与者的身份去积极推动全球化。在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绝对性优势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之前,在中国的国际权力与国家实力还没有实现对等、相称之时,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维度就难以成为战略重心。如勉力为之,操之过急,

前车之鉴不胜枚举。前有目标超过实力从而导致国家行动溃败的“威廉二世陷阱”,后有理念超越实际而遭遇失败的“威尔逊陷阱”。

就目前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而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重心应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创造出一系列有利条件促进中国的发展。当下,中国经济已整体进入从中国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过渡阶段,处于由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持续扩大,国内的产能和资本也伴随中共十八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战略快步走向国门而融入全球,中国经济的海外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由内向外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应再局限于国内环境,而应以全球性的视野把握中国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应一以贯之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优化国内环境,坚持以中国方案改善国际环境,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以期用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应以持续、稳定、健康和多样的、中国化的国际产品贡献世界经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助力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目标或最终目标如同建设社会主义一样不会一蹴而就,要求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从现在走向未来。由后发中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必定是一个由内到外逐步推进的漫长过程。只要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建设符合历史发展大势、实践模式符合国内国际实际,中国经济全球化就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其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的贡献,从而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全球化这一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

- 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N]. 人民日报, 2017-01-18(03).
- [2]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让全球化造福全球 [M]. 雷达, 朱丹, 李有根,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0.
- [3] 胡鞍钢, 王蔚. 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 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J]. 学术界, 2017(3): 16.
- [4] 贾文山. “中式全球化”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EB/OL]. (2016-12-12) [2017-10-20]. 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12/9797245.html.
- [5] 马丁·沃尔夫. 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J]. 中国经济报告, 2017(4): 30.
- [6] 金培. 不完美但不可抗的经济全球化[J]. 中国经济学人, 2016(1): 19.
- [7] 杨洁勉. 全球治理困境和中国方案思考[J]. 探索与争鸣, 2017(3): 55.
- [8] 亚·弗·罗曼诺夫. 中国方案: 对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新态度[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6(2): 33.
- [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人民出版社, 2017: 59.
- [10] 刘建飞. 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J]. 红旗文稿, 2017(13): 17.
- [11] 习近平.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 人民日报, 2015-10-14(01).
- [12] 鄢一龙, 白钢, 章永乐. 大道之行: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90.
- [13]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N]. 人民日报, 2016-09-4(03).
- [14]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7-01-18(02).
- [15] 何亚非. 从全球治理改革到重塑国际秩序 [DB/OL]. (2017-03-20) [2017-10-20]. 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3-20/doc-ifcypit2364440.shtml.



引用格式:杨晓.以赛亚·伯林历史观的双重维度[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9(2):50-58,71.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50-09

以赛亚·伯林历史观的双重维度

The two dimensions of Isaiah Berlin's historical view

杨晓

YANG Xiao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以赛亚·伯林基于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关于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究,构建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面对个人主义在20世纪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予以强调和提倡,从而彰显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与卡尔·巴特菲尔德争辩道德判断的走向和基点,伯林强调历史解释不能漠视和压制作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而仅仅把重心放在对外在力量发生作用的探寻之上,以此重构其历史观中的道德判断的原则。伯林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的强调,作为主线贯穿其整个历史观,构成了其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

以赛亚·伯林;
自由;
责任;
道德判断;
历史观

收稿日期:2017-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ZX060);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2013BSJJ060)

作者简介:杨晓(1981—),男,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伯林的历史哲学和人性论建基于一种历史观,侧重于人类历史、文化和有着自身特征的现代人性论与个体的选择自由。其温和的历史主义立场的核心是对作为整体的且具有独特表现力的、基本的生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历史性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充满温和色彩,即通过移情的想象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洞察力,达到对不同的人类文化的理解。换言之,伯林的这种温和的历史观根植于对生活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个人所必然拥有的、程度大小不同的自由,同时又与其多元论思想相契合。

一、伯林温和的历史观

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之一,伯林以其自由主义思想和对西方观念史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其对自由概念的两种区分仍然在影响着大量的自由主义的研究者;同时,其对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的探究及其观点也仍然是理解此类范畴的重要参照。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伯林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事实上,从伯林弃哲学而投入观念史的研究开始,他相继发表了《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刺猬与狐狸》《现实感》《历史与理论:科学的历史的概念》等文章,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责任、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散论看似凌乱,但实则有相关主题贯穿其中。同时,伯林所推崇的个体自由更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间,并以此为基点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

伯林的历史观构建首先是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究。伯林认为,对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而言,人们会不可避免地做出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种种自由的选择。与这种选择自由相呼应的是责任。伯林反对那种认为鉴于人们所生存的处境中存在着许多个体无法决定和影响的因素,个

体的选择不能成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的观点。伯林认为:“……历史学家(与侦探、法官和陪审团)试图确定也能够确定的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些可能性;这些界线的划分方式标志着可信的历史与不可信的历史的界限。”^{[1]134}但是,在历史学家叙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偏差。由于视角上的差异,一个历史学家与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甚至会做出大相径庭的叙述。针对于此,伯林认为必定存在着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所无法抹除的人们共享的某种基本的假定。“这种共同的基础正是被正确地称作客观性的东西。它能使我们认同别人与别人的文明,将他们视为本质上是人道与文明的。”同时,伯林也明确指出,主观与客观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这条界线又毫无疑问地存在。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主客之分的根源正是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对伯林而言,把历史等同于科学,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为历史学构建一组特殊的概念和范畴是荒谬的。他认为,“历史作品虽然不像想象性的文学作品,但是它肯定无法逃脱在自然科学中被恰当地斥为无理由的主观性的东西,甚至无法逃脱直觉(就这个词的经验意义而言)”^{[1]157}。与深信存在某种可以破解事物奥秘的次序或关键要素的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却指出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太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因此是一种异于自然科学的“不精确”的学科,其所依赖的是某种程度的具体性、暧昧性、含糊性、暗示性、生动性等。囿于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历史学家并不能通过把握全局而对过去进行重构。伯林指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告诉我们世界上真的发生过什么……他们所揭示的是具体性格、具体的系列事件或历史形势中详细而精确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作一幅传达某种独特经验的肖像,

而不是一张能够作为一类相似结构的概括性符号的X光照片”^{[2]23-24}。但令伯林感到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并没有注意到或者故意忽视自然科学与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并不遗余力地试图把应用于科学范畴之上的方法和模式扩展到历史学之中,希望在其中找到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问题的模式或定律。

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三个问题体现在他对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差异性的描绘,以及对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富有想象的洞察力的研究。对伯林而言,对历史事实客观的记叙与对它们的阐释之间虽然并不能极端地划出界线,但其间最基本的区别还是存在的。正如我说“张三在吃饭,而李四在玩游戏”,这是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而非一种理论或一种解释。毫无疑问,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界限通常是宽泛和模糊的,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与阐释、理论、假说、视角相对的,由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必须在变化着的观点看来是不变的,否则毫无历史真相可言。因此伯林重申:一边是事实,另一边是看法和阐释,中间的界限可能模糊,但界限确实存在。^{[2]28}然而,单纯事实的简单叙述并不能形塑历史,即便赋予它们可以通过科学加以检验的假说,它们仍然构不成鲜活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机械的方程式或一堆松散的历史材料。“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2]29}伯林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恰恰在于其对于事实和现象的叙述,即对历史中所曾经发生的具体系列事件或历史形势中独特的东西的描绘,目的是使读者能在所谓的“具体性”中把握当时的环境。这种对事实的描述和叙述的能力除需要谨慎的观察、具备正确的知识外,还需要历史学家具有

力和生活的经验所构成。通过使用这种富有想象的洞察力,历史学家可以进入其他的异己的文化内部,从而更好地理解 and 叙述这种文化。

如果我们把对伯林的历史观的解释限定在历史主义的一般意义上,那么人类的知识将会被我们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所迷惑。此外,如果在一般人类价值或目的上去理解个体,那么我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因,我们不但要面对历史上所存在着的令人目眩的多元样态的生活形式,而且也必须按照这些多元样态的生活方式来对其进行理解。同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自身所遵循的生活形式也面临着无数难以理解的困境。而这些经常使我们面临困境的风俗习惯,恰恰是塑造我们自己的历史、道德判断和自我理解的源头所在。为了更为恰当地理解伯林的历史观,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其对历史观所阐释的内容和特征上。伯林描述他的历史思想之时正值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目睹了当时文化中个人意志和个体自由逐渐被剥夺,由此滋生了某种恐慌和危机意识,有鉴于个人主义在20世纪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伯林在当时无可厚非地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旗手和代言人。随之伯林又陆续完成了《刺猬与狐狸》《现实感》等一系列阐述其历史观的文章,其在对形而上的决定论的批判之余,亦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加以强调并提倡,从而彰显出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柏林历史观中个体自由意志的彰显

伯林在探讨历史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或演讲稿中经常会提及他所关注的自由意志和责任的

问题,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类在不同的时代所一再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伯林认为,自由和责任的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的、永恒的、没有确定性答案但不可避免要对之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人性的巨大可能性,也代表了历史与经验的巨大可能性。个体自由和个体选择是人的内在需求。虽然我们可能处于令自身和他人满意的状态,但内心依然希望可以做出与此时状态迥异的选择。这正是伯林拒斥决定论的理由。他与决定论的争论,表现在关于历史、自由、个人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解方式上的分歧。伯林认为,一切形式的决定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终极而言,个人的选择自由是一种幻想;人类能够作出不同选择,这种观念史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知之上的。”^{[1]122}因为这些决定论的目的是对个人责任观念的消解,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历史起因于可以识别的力量的作用,而不是起因于自由的人类意志与自由选择或很少受其影响,那么就必须根据这些力量的演化,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合适的解释。显然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变化完全归因于不受个体影响和控制的实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比个体更大的实体之上而全然隐没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正如柏林所说的:“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抛入一个特殊的精神、社会、经济环境中,我怎么可能不选择现在的所作所为呢?”^{[1]128}他认为,那种把个体行为和个体影响与责任完全抛掉的观点,削弱了个体自由选择的余地和意义。

个体选择自由毫无疑问在伯林的历史观中占据核心地位。伯林认为,自由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人类有时候做出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所能接受的那类因果解释所完全能说明的。^{[1]137}同时伯林也意识到,如果这个信念是一种必要的幻觉的话,那么因其太深刻与太普遍,以至于人们已经

感觉不到它是幻觉了。伯林认为,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道德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存在着无数可供人们选择的选项,人们在面对这些互不相容甚至相互冲突的选项时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直接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的确,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中,人们才给予自由选择以那么大的重要性。”^{[1]241}

伯林曾感叹:“想过上平静生活的人,在20世纪真是生不逢时。”^{[1]62}伯林在其生活的时代,历经了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1940年代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从而意识到善与善之间并不是相互兼容的,因此他认为最能符合现实和人性的唯有价值多元主义。伯林深谙人类生活中多元道德和价值并存的事实,因此对于决定论者所渴求的完美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所有的矛盾都将会被解决,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和谐一致的——伯林是坚决拒斥的。这种完美社会理念是自柏拉图以降直至黑格尔为止,哲学家们不断强调和宣称的。伯林认为,这些决定论者所谓的“完美世界”“不仅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它在概念上也不够圆融”^[3]。历史学家的任务仅仅是告知我们世界上曾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并不能发现普遍适用的历史模式,并不能推测过去和预知未来。但是决定论者为了建构或构造出他们所谓的“完美社会”或“完美世界”,就不得不对事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加工,这种行为必将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伯林也不完全认同同时代的另外一位自由主义捍卫者卡尔·波普的观点。波普认为,决定论者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既脆弱又难以成立,其对历史的预知是有限的。针对这种“对历史的有限的预知”,伯林补充道:“人类

历史不断变革的原因在于明确地实现人们自身不断变化的欲望、新的需求、新的目标、新的观点,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前景;这也是反对声称可能发现社会变革的严格的规律的观点的主要意见之一,它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决定论。”^[4]伯林进而从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指出:(1)历史决定论是同我们大部分基本的道德和政治的概念和价值不相容的;(2)存在着对艺术的和特定的、包含人类行为和思想不利影响的历史性理解的不可复归性^[5]; (3)决定论仅仅是限于自身主张不能从我们所处的立场中得到论证。伯林与波普之间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波普坚决主张他所批评的对象是一般的历史主义,而伯林宁愿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变种——历史决定论。其次,波普意欲把历史主义刻画为“开放社会”的永久的“敌人”,伯林则警告人们这些“形而上学”立场的弱点和危险。事实上,伯林的一生都在与这些思想家们作斗争,尽管他有所保留,却提出了大量新颖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伯林在强调个体选择自由和与之相关的责任时,对于决定论者像描述日出、大海等自然现象那样描述凯撒、克伦威尔、希特勒的行为抨击最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刻画消除了历史人物所应担负的责任,从而使个体从责任的重负下逃脱出来。“一旦我们将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从个体的肩膀上转移到制度、文化、心理或生理因素的因果性或目的性的作用上,那么诉诸我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期望那种完全不偏不倚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许的确不是完全能实现的,但对这种理想,有些人是不是比别人更接近一些呢——还有什么意义呢?”^{[1]131}这也是为何伯林三番五次地对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中“非个人解释”日益高涨的原因。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一书中,伯林提及19世纪以来历史解释的重心逐渐地从对个体的重视转移到对

制度力量影响的偏重。此后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书中,伯林又再次归纳了当今流行的历史理论,认为可区分为人格的与非人格的两种:前者着重于探讨特殊个体的决定性影响,后者则认为根据人的意图而进行的解释完全是起源于自负与愚蠢的盲目混合。伯林早先曾以浪漫史学与理性史学之别说明历史的演变,后来则以更加鲜明的人格的解释与非人格的解释加以区分。由此可见,伯林意欲彰显的是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不可或缺性,而与个体选择的自由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个体对历史所负责任的不可推脱性。

三、柏林历史观中道德判断的重构

卡尔和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在记叙和传达历史事件时不应掺杂道德判断。对此,伯林并不认同。他指出,个人的动机对历史事件的发展影响甚大,“任何人只要谈论的是人,就注定要考虑其动机、目的、选择以及专属人类的特殊人类经验”^{[1]29},个人的选择与个人的自由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并不能被简单地忽略。此外,伯林认为,虽然个体并非全知全能,但不能以此为由消解个体因自由的选择而应该担负的责任。因此,对于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对有资格言说的东西还要谨慎言说;因为证据总是不足的,我们能够作的至少是不做判断,既不称赞也不谴责;所谓罪犯不过是被卷进逆流的泳客,漩涡是他们控制不了的”^{[1]149}这种悲观论点,伯林不以为然。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说明。

首先是柏林对“人类的困境”的疑虑和驳斥。由于巴特菲尔德把人视为脆弱的生物,所以他认为把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灾难的责任施加于人类的肩膀之上是荒谬可笑的。伯林认为,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是众多

纷杂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因素是导致人类“知识的有限性”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伯林认为“僵死的现实主义者、基督教悲观主义者是正确的”。诚然,在历史演进中,充斥着吹毛求疵、相互揭露,在道德上或情绪上对异己的生活方式的排斥等邪恶的场景。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对教条式的褊狭进行纠正的观点可能会把“人类的困境”作为人类历史的终极核心因素,导致把责任转嫁到个体的脆弱与无知之上,从而消解个体的责任。这种对个体责任的消解将会导向“认识一切即是宽容一切”的立场:认识越少,我们便越没有理由进行公正的谴责。^{[1]150}伯林认为这种观点推至极致便会导向对历史客观性的完全拒斥,“历史客观性……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用于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准,根据其定义本身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所衡量”^{[1]153}。与之相反,虽然我们的某些判断是相对的和主观的,但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判断,如果客观性从原则上而言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和认知的,那么“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个词汇将不会形成对比,同样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伯林认为,萨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倾向于消解个体的责任,而且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会造成重大的困扰,甚至于对历史主义的偏见和道德主义的辩护和谴责都无法成立,并因此使道德中立的观点归于虚无。

其次,伯林从个人的选择自由的角度分析了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伯林之所以支持历史学家不应回避道德判断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个人自由选择的信念的重要性的判断。伯林相信个体在历史演进中有其作用,选择、责任、自由等观念都根植于我们的人性之中,并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对历史进行解释就有必要对个人行为作出交代和评述。例如,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在描述重要的革

命时,应当追究某些人物对革命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如此才可能正视人类的责任及其在有限范围内拥有的真正的自由。

但对于波舒哀、谢林、黑格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思想家而言,个体仅是构成民族、文化或文明的抽象的因素,仅是为着特定的目的而人为地抽象出来的“元素”“方面”“环节”;个体脱离他们所组成的集体便失去了实在性,正如事物的颜色、形状和价值一样,只有具体事物的“元素”“属性”“样态”或“方面”。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人的行为的真实的原因并不在于个体生活的特殊环境,而在于这种极其多样的生活与其自然及人造环境间的无所不在的交互关系。人做他们所做、想他们所想,主要是作为‘阶级’整体的不可避免的演进的一种‘功能’。从这种观点出发可得出如下结论:对历史与阶级发展的研究,可以独立于组成它们的个体的传记而进行”^{[1]110}。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探究个体选择与个体自由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思想家愿意诉诸种族、民族或文明而非个体,他们认为“由生者和死者、我们的祖先和我们尚未出生的后代组成的大的社会,比任何单一的造物都更有目的性,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大目的的小碎片”^{[1]111};他们渴求被胁裹进比个体更大、更具体的实体之中,这种实体负载了个体的价值并成为个体目的的工具,而个体肩上所担负的责任将被其所隶属的实体所统摄。因此,对他们而言,个体因其自由的选择而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是无稽之谈,是被“理性所拒斥的”;同时也是混乱的、肤浅的乃至幼稚的妄自尊大。所以,承认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无疑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个体选择的自由更是一种幻想;人们对事实的无知与愚蠢的自大,导致他们相信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那些以万能者自居的,指导人们应该这样或那样去行动、应受称赞或贬低、值得人们赞同或谴责的

主张,都是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之上:“他们生活的领域并非是完全受规律决定的,不管这些规律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抑或表明了科学所揭示的概率。”^{[1]111}这种预设被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类的思想家所拒斥。他们认为,只有人们在对事物本质极端无知的境况下才会做出称赞与谴责、提醒与鼓励、谅解与宽容等道德判断。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愈深刻,人类的自由和责任的领域就愈狭窄。同样,当我们理解物的本性就是知道你的真实要求是什么和如何实现它之后,责任或内疚、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将会成为空洞的记叙词汇。因此,“称赞和谴责是无知的产物”^{[1]124}。

与此同时,这些诉诸卡尔所指称的大写的抽象的“人”的思想家认为,如果世界历史并不受自由的人类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影响或很少受其影响,而是起因于可以识别的力量作用,那么,对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合适的解释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力量的演化。因此,实体而非个体要承担责任的倾向就逐渐加大。但是在伯林看来,一旦我们将自由选择及其应该担负的责任从个体转移到制度或文化等实体之上,那么诉诸我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对完全不偏不倚的理想期望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并非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是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的。而个体在历史中有其作用,他也必然要为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因此我们并不能像描述洪水、地震、日出等自然存在物那样去描述希特勒或斯大林。我们可以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褒贬,但是必须基于中立的立场并有事实根据。由此可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个体自由和责任,而且这些自由和责任也是历史解释中不可或缺的。

最后,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读者进行道德说教。伯林认为,历史学家所使用

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带有评价性力量的言辞,把这种言辞从他们的语言中剔除出去是异常困难的。虽然客观、不带偏见、不动情等品质是我们对历史学家应具有的美德之要求,但是在伯林看来,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人相差无几,因此若要求历史学家比普通人更具有非人性化的特质就极不合理;同时,历史学家也无需公开表明他们的道德判断,他们并没有义务告诉读者什么对其有益、何者对其有害。而他们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它们全都携带着道德含义”^{[1]126},因为“任何微小的事情都能传达价值判断,即传达我们正常的、很少被注意到的道德与心理状态”^{[1]156}。所以,不论历史学家使用何种语言即便是使用中性语言传达历史事实,也是在传达着自己的伦理观念。因此伯林断定:“避免道德说教的方式只能是采取另外的道德观点,而非是完全抛弃道德观点。”^{[1]162}

伯林通过对巴特菲尔德所秉持的道德判断的悲观态度进行辨析式的批判,在强调个体选择自由的立场上重新构建了历史学家道德判断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语言分析彰显历史学家在记叙史实的过程中难以把道德意蕴剔除出去。通过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历史解释中个体的力量和历史语言中所内蕴的道德含义的分析,伯林构建起独特的彰显个体自由的历史观。

四、柏林历史观中的个体自由与社会因素

伯林的批判在为20世纪自由主义给出石破天惊的一击的同时也招来了相当程度的批评。在众多反对声浪中,尤以左派历史学家卡尔的回应最为有力。卡尔和伯林都是英国当代著名的俄国专家,且两人对马克思都有独到的研究。二者对立的焦点是历史解释的立足点究

竟是建立在个体自由之上,抑或是建立在社会因素之上。伯林认为,卡尔无疑是一个决定论者,走的是孔德主义路线。而卡尔认为,伯林通过批判决定论所建构起来的历史观,不折不扣是非科学的、充满原始时代色彩的。卡尔对伯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卡尔批评伯林所主张的历史学家应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进行道德批评(关于这一点,因为和本文主题关联较小,在此不多论述)。伯林对此则以其一贯不愠不火的态度回应,他表示自己从未主张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做道德批判,而只是强调“历史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都在使用一些带有评价色彩的语言;若要他们在他们的语言中将这一类的语言全部排除,不啻于要他们去做一件极端困难而自我愚弄的事情”^{[1]53}。伯林常常以这样略带狡猾的中立方式回应他的对手,总是尽力强调自己的不偏不倚的治学立场:既不赞成什么,也不特别反对什么,而只是中肯地提出些什么。

其次,卡尔批评伯林直言决定论是个错误,认为这只是伯林排斥历史学家使用因果关系的规律来研究历史:“以赛亚·伯林反对解释人们行为的原因,其所持的理由是这些行为乃出于人的自由意志。”^{[6]123} 卡尔认为,所谓决定论是相信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并且事情不能不如此发生。“因为我们对人格的了解原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一切事物都有其原由,其中大部分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人心里能够建立一个古今前后连贯的图案、足以供人动作的向导。除非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受制于一些大致可以确定的原因,我们简直没有生活的可能。”^{[6]122-123} 卡尔极力主张历史的任务就是依照因果关系来排列过去事物的顺序。卡尔指出,原因和随自由意志而来的道德责任事实上根本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你认为他没有责任,这并不是说你认为他的行为没有

原因。”^{[6]138} 卡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是被决定的。卡尔认为这样就解决了伯林所谓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逻辑关系难题,但在笔者看来,真实的问题其实并未解决。因为诚如卡尔所言,它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立场。当伯林从人本主义或人性论的立场出发强调个体自由立场时,他就放弃了决定论的观点,因为决定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赋予历史意义的人的存在价值。

对于卡尔的批评,伯林首先表明他从未说过决定论是错误的,也从未否定使用因果关系来研究历史。他强调尽管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在关键时刻出于个体自由意志下的行动往往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伯林重申历史必须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决定论的问题在于它超越了因果关系的使用范畴,奢望找到世界上所有事情包括未发生之事的因果关系,其以伪科学的方法延伸历史,实属荒谬可笑至极。伯林认为,决定论视域下的历史不过是某种既定的悲喜剧,剧中每一角色都不是在自己构想出来的剧本里,念着属于自己的台词,根据已经写好的剧本行动,如此,所有历史上的人类在决定论视域下不过是某种巨大力量下的玩物,丝毫不异于受操控的牵线木偶。这自然是伯林所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场结局注定的计划,而是如赫尔德岑所言:“历史全是即兴创作,全是意志、全由临场发挥,既无界限、亦无既定路线。”^[7] 伯林相信人类行为和精神世界虽可能由他们的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和传统文化所塑造,然而作为一个个人,人们仍然保持着道德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人类免受某些决定论因素的影响。

最后,卡尔将伯林主张以“人类的意向”来解释历史的观点称为“恶王约翰式的历史观”^{[6]54-55}。伯林认为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人的素质和行为,卡尔则反对伯林如此治

史,将其嗤为传记性的偏见与幼稚的想法。诚然,卡尔并不反对历史事实中有关于个人的事实,但他强调历史所关心的对象不应是个人单独的行为和动机:“历史事实所注意的是一个社会中个人彼此间相互的关系和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从个人的行为而来,但往往产生和行动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6]64} 卡尔相信人不只是纯生物而是社会形塑之产物,因此,历史的价值取决于整体社会力量。卡尔的这种贬斥并不合理,因为在个体与社会因素之间,伯林毫无疑问会选择前者,但他并非主张“个体生来就具备不受束缚的自由意志”,同时也不是绝对的个人意志论者。伯林在倡导个体自由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个体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社会或群体的影响:“这样的看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个人责任的信念。责任的程度有多大,亦即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备选方案的可能性的领域有多大,将取决于一个人对自然与历史的解释,但绝不会一点没有。但是这种观点却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否决,他们沉浸在形而上学或科学的决定论中,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终究而言,所有事情或至少是大多数的事情,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种族、文明或社会结构的作用。”^{[1]110} 由此可见,伯林认为个体自由的空间依赖于对“自然”和“历史”范围的划定。同时,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也指出,面对诸多的终极价值,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因为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最终是依赖于基本的道德范畴与概念,无论如何,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的存在和认同感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因素。因此伯林所秉持的并非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而是历史主义的个体自由,他虽从未否认社会和共同体对个体所造成的影响,但其目的仅在于尽力彰显个体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已。

此外,伯林还通过对卡尔历史观的回驳,将历史解释的重心重新又拉回到人的身上:“要描述人类行为,却对于人的性格、目的、动机略而不谈,永远只是矫饰失真且过于严苛的做法。”^{[1]89} 伯林重申,如果历史学家忽略了个体动机和动机形成的背景,忽略了人类思想和想象的错综复杂,忽略了人类世界乃至对人类本身的看法,便无法把握历史的本真。伯林认为,卡尔的历史观等于是主张一件事越是非个人化,个人癖好在历史中的角色就越是幻妄,越远离客观的真理与事实^{[1]51}。伯林认为这种历史观可能无中生有地引出一些问题,也等于宣布了对“不可变易的事件模式”的信仰,使人卸除个人责任的负担、放弃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滋生出非理性的激情、产生非理性的狂热活动。

五、结语

伯林认为,与人类的语言一样,人类的历史也是多方面的和多样的,所以,总存在着许多人类历史而不存在着单一的历史。因此,对于形而上学历史观所主张的观点——历史只有一种价值,因为它有一种本身便具有价值的目的;这种目的构成了其存在的依据,并因此为每一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每一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先定的,由此整个历史过程也是必要的;这一过程具有明确的模式,即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历史现象都需看作向着历史目的的实现而迈出的一步——伯林持拒斥的态度。因为在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模式之下,人们选择的自由将最终成为一种幻想。伯林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即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并实行自由制度的社会,其能否存在取决于个人承担责任与进行自由抉择

(下转第71页)



引用格式:黄晶. 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吗? ——基于马克斯·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59-64.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2-0059-06

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吗?

——基于马克斯·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

Is an action caused by feeling a moral action?

—Based on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feelings of Max Scheler

黄晶

HUANG Jing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00025

摘要:关于行动促发的动机,人们往往会有两种解释路向:机械因果论和动机促发论。在马克斯·舍勒看来,人的情感领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感受状态和感受。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而后者属于接受它们的功能与机制:作为意向对象的感受与促发实际行动的意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感受能够促发意志而引发实际行动。不同于康德,舍勒认为,只有基于价值感受的实际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这一界定实则是将价值感受作为伦理的基础,从而将情感与道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基于这一理由,舍勒认为由具有现象学特征的意向性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

关键词:

马克斯·舍勒;

感受;

感受状态;

价值;

道德行动

收稿日期: 2018-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ZX042)

作者简介: 黄晶(1985—),男,湖南省慈利县人,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与宋明儒学。

康德在其道德学说中坚决拒绝把感受促发的行动当作道德行动,从此,“道德不能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这一原则几乎成了支配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情感的本质缺乏了解,不加区分地把情感领域的所有现象都视作一种混乱的感性状态。假如救将入井之孺子的不忍感受本质上与促使人进食的饥饿感受是一样的,谁又会把由不忍这种感受促发的救人行动视作道德行动呢?但是,由不忍促发的救人行动与由饥饿促发的进食行动显然有着本质区别,因而,不忍的感受与饥饿的感受也相应地具有本质的差别。这个案例引发了一个普遍的问题:由某种特殊感受促发的行动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道德行动呢?本文拟借助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对行动促发动机的不同解释路向

一个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往往会有两种解释路向:机械因果论和动机促发论。机械因果论是把人们的行动界定为心理—生理意义上的行为。比如,某人挥拳打人,机械因果论会认为这是此人的愤怒作为一种力量作用于神经、带动肌肉然后做出了挥拳这一动作。这种解释路向只触及人之作为心理—生理的存在,而没触及其作为道德的存在,因而根本不能区分道德行动和非道德行动。人可能是为了获取利益也可能是出于同情而做出了救人的行动,如果这两种行动表现相同,照机械因果论的解释,它们就是性质完全一样的行动。而动机促发论的解释模式则是另外的路向,它根本不关心行动发生的心理—生理过程,而只关注促发这个行动的动机,即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动机促发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这种解释路向,能够使我们在具有相同外表的行动之间做出区分。按照这种解释,出于履行职责的动机而救

人和出于获利的动机而救人,即使这两种行动表现得一模一样,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两种不同的行动。动机是不是道德的,决定了由动机促发的行动是不是道德的。因而,考察一个行动的道德本质实际上就是考察促发行动之动机的道德本质。照此而论,不是机械因果论而是动机促发论才能通达行动的本质。

问题在于,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毫无疑问,感受的确能够促发行动。因不忍这种感受而救将入井之孺子,这当然是由感受促发的行动。但是在这里,动机促发论的解释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救孺子之人既不是出于“纳交孺子父母”的动机而救了孺子,也不是出于“邀誉于邻里乡党”的动机而救了孺子,他只是因为不忍。乍一看,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动机不动机的问题。但是进一步考量会发现,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照旧可以纳入动机论的解释范围。人们因饥寒感而进食加衣,在这里,人们做出进食加衣的行动是出于追求不饥不寒的动机。同样,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案例中,救人者虽然没有其他外在的动机,但也是出于“消除不忍”这一难受感受的动机而做出救人行为。这种解释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出于不忍而救人的行动与因饥寒感而进食穿衣的行动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因饥寒而进食穿衣的行动不是道德行动,因不忍而救孺子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是道德行动了。这种解释也恰恰是康德拒绝把任何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当成道德行动的原因。而且,基于这一看法,康德走得更远。在他看来,消除饥寒的动机、消除不忍的动机与主动追求快感的动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他把任何由感受(对道德律令的敬重感除外)促发的行动都归结为出于追求快乐这一动机而做出的行动。康德的这一论断预设着两个前提:一是除敬重感之外,所有情感现象共享同一个本质,即所有的情感都是一种感官状态;二是所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以追求快乐

为动机的行动,即不是感受本身促发了行动,而是追求消除某种不爽感受或获取某种爽快感受而带来的快乐促发了行动。因此,对于康德来说,救孺子的不忍感受与欲进食的饥饿感受没有本质差异,因为前者只是出于消除不忍感的动机,而后者也只是出于消除饥饿感的动机。

二、舍勒基于感受与感受状态区分的行动价值分析

我们可以将舍勒对感受所做的现象学分析之结论,概括为以下四点:其一,并非情感领域的所有现象都是感官状态,而是可以区分为具有不同性质的感受状态和感受;其二,感受状态是纯粹的感官状态,而感受则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特征;其三,具有意向性特征的感受,其意向对象是价值;其四,感受具有实践的特性,它可以促发意志并带出实际的行动。

舍勒认为,“我们首先将意向的对某事物的感受区别于所有单纯的感受状态”^{[1]379},在情感领域内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东西:感受和感受状态。英国经验论者和康德所说的那种纯粹感官意义上的情感是身体的纯粹感觉,即不带有意向性的感官状态。但感官状态不能囊括情感的全部,在情感领域内部还存在着一类与感受状态迥异的东西,即感受。对于这一区分,舍勒列举了下面这个关键性的例子^[2]:

当我“痛于那种疼痛”“忍受它”“挺受它”、甚至可能“喜悦它”时,这里所涉及的更多的是一些变换不定的事实组成。在这里,在感受功能知性中发生变更的东西,肯定不是这个疼痛状态。

这个例子表明,感受和感受状态是不同的东西,非常直观。对于疼痛,我们可以有4种不同的感受,即我们可以痛,可以忍受,可以挺着,甚至有人因为某种原因还可以喜悦。疼痛是我

们身体的某种感受状态,对身体疼痛的痛苦或者对身体疼痛的享受是我们的感受。但是能否将疼痛和对疼痛的痛苦或喜悦都归结为身体的某种状态呢?疼痛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官状态,但享受疼痛的喜悦绝不是,它是心灵或者情感能力对疼痛的一种态度。基于此,舍勒将疼痛这类感官状态称为感受状态,将心灵这种反应称为感受,并认为“感受状态与感受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而后者属于接受它们的功能”^{[1]380}。

对待同一种疼痛竟然可以有4种感受或者说有4种接受态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4种感受所意指的对象都是疼痛呢?人们痛于疼痛、喜悦于疼痛,但痛和喜悦的意向对象并非疼痛,而是疼痛所承载的东西。因疼痛而痛苦的人会把疼痛视为糟糕的、坏的东西;因疼痛而喜悦的人会把疼痛视为好的、有利的东西,如医生告诉疼痛的人,疼痛是大病将愈的征兆。在这里,疼痛仅是好或坏的载体;在这里,与痛和喜悦这两种感受对应的不是疼痛,而是疼痛所承载的好或坏的价值意蕴。可见,感受并非没有任何指向的身体状态,它们总是意向着某些东西,在这里痛苦所意向的是坏,而喜悦所意向的是好。但是感受状态是无客体的,就算它与客体有所关联,也不是一种原初的意向关联,而是通过联想后补地与对象建立联系。比如,一位工人在施工过程中突然出现疼痛,这种疼痛只能通过工人的观察才能将它与某种导致疼痛的东西联系起来,而不是疼痛本来就有一个原初的客体,因为疼痛不具有意向性特征。所以舍勒这样描述感受的意向本质:“感受并不是要么直接和一个对象外在地被放置在一起,要么通过表象(它机械偶然地或通过单纯反思关联而与感受内容结合在一起)而和一个对象被外在地放置在一起,相反,感受活动原初地指向一个特有的对象,这便是价值。”^{[1]382}

因此在舍勒看来,同一个载体可以承载不

同的价值,同一个东西对于不同的人显示的价值亦不一样,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态度。但是,感受和感受对象的这种意向性关系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你在把握到事物的“坏”时,不可能有“喜悦”的感受;当你“喜悦”某事物时,它对于你来说不可能是“坏”的。你也不可能“恨”你的朋友,当你“恨”他时,他绝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展现给你的;你也不可能“爱”你的敌人,当你“爱”他时,他肯定不是以“敌人”的身份展示给你的。当我们听到有人说他恨友爱敌时,我们显然知道,至少在这一刻对于他来说友已变敌、敌已成友了。在这个例子中,这个人只是“朋友”和“敌人”的载体,他的“爱”和“恨”这两种感受指向的不是这个人,而是指向在他身上承载着的“朋友”和“敌人”的价值属性。而感受所意向的对象,比如好、坏、敌、友,就是舍勒所说的价值。

舍勒明确指出,“所有对某物的意欲都已经预设了对这个某物的价值的感受”^{[1]110}，“感受性的察识直接规定着我的意欲”^{[1]314}。这表明在以价值作为意向对象的感受与促发实际行动的意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这意味着感受具有实践特性。从日常经验来看,感受的这一实践特性很容易被察觉到。比如,对“有人掉落河中”这个事态之负面价值的感受,直接地激发“救人”的意欲;在救人意欲兴起的情况下,救人的行动也就被带出来了。因此,具有意向性特征的感受通过意欲这一中介而与实际行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通过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并非混乱的感受状态,而是一种感受性的认识,并且任何感受都蕴含着价值指向性;同时,感受也并非纯粹的认知,它是一种能够促发行动的认知。基于对感受的这一现象学的洞见,我们可以说,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绝非一种盲目的行动,而是基于对价值的明察基础之上的合乎情理的行动。这一点将在下面的这个例

子^[3]中得到印证。

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深夜去到阿喀琉斯的营帐中,想要回自己儿子赫克托耳的尸体。作为与特洛伊敌对的希腊联盟中最勇敢将领的阿喀琉斯,对于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杀死自己亲人之凶手的父亲、敌对国的国王,他是非常憎恨的;但普里阿摩斯说,他不过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为战死的儿子收尸的,于是阿喀琉斯对他产生了深深敬意,并且把赫克托耳的尸体还给了他。

在这里,阿喀琉斯对普里阿摩斯产生了恨和敬两种感受,但这两种感受并非无缘无故的。这里的恨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且也是一种认识,因为在恨的同时,普里阿摩斯必定是被阿喀琉斯视作“凶手的父亲和敌对国的国王”,因为在此情境中,恨这种意向的对象必定是敌。假如阿喀琉斯对待普里阿摩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恨转变成敬重,那么,普里阿摩斯已经不再是敌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爱敌人而恨朋友。倘若这时阿喀琉斯杀掉普里阿摩斯,那么这一由恨促发的行动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敌人这一价值明察之上的行动。同样,阿喀琉斯因为敬重普里阿莫斯而放了他,这一由敬重促发的行动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感这一价值的明察之上的行动。

基于此,我们认为,康德将所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全都无差别地视作以追求快乐为动机的行动的观点无法成立。因为基于价值明察的感受及其行动,并无动机因素参与其中,在这里体现的是感受与行动的直接的本质关联性。比如,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情境中,救孺子之人的行动哪里还用得着由“消除不忍这种难受状态”作动机来促发呢?此时应是这种情形:

对“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所承载的负价值之明察,必然伴随不忍之感受,并直接地促发救人的意欲,而后就产生了救人的实际行动。

通过对从价值感受到实际行动的实施这个完整序列及其逻辑的揭示,我们就慢慢地了解了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行动”这一概念。在舍勒看来,只有基于价值感受之上的实际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这一界定实则是将价值感受作为伦理的基础,从而将情感与道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感受与伦理的结合,对于感受理论和伦理学来说都是一种突破。它破除了以往伦理学不能建立在感情之上的教条。这一教条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所有的情感都是某种杂乱无章的感官状态。出于这一偏见,人们将所有的情感现象都视为均质的、平面的某种肌体上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某种崇高的和神圣的感受与冰水浇在身上带来的冷的感官状态处在同一平面而没有高低之分;这也意味着,审美的愉悦与肚子饥饿这种感官状态是同类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照此而论,道德的或者伦理的行动就当然不能建立在感受之上。比如,人们总不能说由饥渴等一些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是道德行动吧,并且,由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很可能还是罪恶的,如一个人因饥饿而偷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见,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感受的本质,是将感受与感受状态混淆了。殊不知,感受是人的情性能力,而感受状态则是肌体对外界刺激的纯粹接受,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官能力。同时,人们也误解了感受与行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以为是感受状态而不是感受引发意欲进而促发行动的。比如,饥饿是肌体受刺激的结果,对于这种感受状态,人们可以有多种感受,人们可以难受于饥饿,也可以享受于饥饿,只有当他对饥饿感到难受时,才会做出吃东西的行动。因而,不是饥饿本身而是对饥饿这一事态的价值感受促发了意欲从而引发

了行动。感受必定有其意向价值,而价值自身则有着严格的秩序和高低等级。由于价值有着性质上的差异和高低等级,所以与价值相对应的感受也有差异和等级。

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道德的意蕴?

通过对感受这一特殊意向行为的分析,舍勒指出,由感受促发的行动与价值有着本质关联,由此这种行动就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情理,而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的刺激—反应的行动模式。舍勒把这种基于价值感受(明察)之上的行动称为道德行动。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基于现象学式的伦理学对道德性这一重要概念的重新界定。将这一界定与康德对道德性的界定进行对照,我们就更能看清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性的内涵及其在伦理学上的意义,由此我们也更能辨析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道德性。

康德认为,“道德性的唯一的原理存在于对法则的一切质料(亦即一个被欲求的客体)的独立性之中,同时也存在于通过一个准则必须能够有的纯然普遍立法形式而对任意的规定中”^[4]。这段话集中地展现了康德对于道德性的界定。他认为,道德性包含了两个条件:其一,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独立于被欲求的客体(质料),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都不能直接由欲求对象来激发,如努力工作的意志不能由安度晚年这一目的来促发,否则努力工作这一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其二,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由“纯然普遍立法形式”来进行规定,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由形式性的普遍道德法则来促发,如努力工作的意志必须要由道德法则来促发,否则努力工作这一实际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由此可见,只有由道德法则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才是道德行动——道德行动与道德法则的这种

本质关联构成了康德道德性概念的核心内涵。

基于康德对道德性的这一界定,情感自然就被排除在了道德之外。因为,任何情感促发意志的行动都不可能符合道德性的规定,不管这种情感是感官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在道德性面前,所有的情感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由感受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既不可能是道德行动,也不可能具有道德含义。

然而现象学视域中的道德性概念与康德对它的界定完全不同,舍勒截然相反地把情感作为道德性的本质属性。在舍勒看来,道德行动就是基于对价值的感受促发意欲而引发的行动。感受并非一种杂乱无章的感官状态,比如身体的疼痛之类,而是具有意向性特征并且以价值作为对象的意向行动。这样的意向行动因其能够促发行动而具有实践意义,因此它不同于纯粹的认知意向行动,而是具有道德含义的伦理意向行动。这也意味着,在舍勒眼中,一些公认的道德行动若不是由出于价值明察而来的感受引发出来,它们就没有道德涵义。以此而论,康德意义上的由道德法则促发的行动根本不能算作道德行动,因为这类行动不是由具有伦理意向特征的感受所引发的。

下面我们仍以孟子“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来说明康德式的道德性与舍勒式的道德性之间的差别。在“孺子将入于井”的场景中,对于舍勒来说,一个人救了将要落井的孺子,他若是试图交好孺子父母或者邀誉于乡里,则此救人行动绝非道德行动。因为他不是感受并明察到“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价值而采取的救人行动,而是通过对一个目标的设定(获取名誉或者取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引发的行动。另外,假如他在看见这一场景之时虽没有一种“怵惕恻隐”的不忍之情,但尚有一种应当救人性命的意识,即出于“应当”这一强制意识而救了孺子,这一行动照样不是道德行动。因为他没有感受并明察到这一事态的价值,同时也没

有关于“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急迫感受,他实则处在一种价值盲目状态。看到“孺子将入于井”,他不假思索,恻隐不忍之情油然而生,立马促发他救人的意欲,然后飞快地跑过去救孺子脱离危险之境。他这么做既不是为了要交好于小孩的父母,又不是要在邻里获得好名声,也不是由于某种应当意识的强制,而纯粹就是出于不忍,出于看到“孺子将入于井”之时油然而生的某种价值感受。在舍勒看来,这样的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而对于康德来说,只有出于“我应当救人”的纯然的“应当”,才是道德行动;而且这一行动越是纯粹即越不夹杂情感因素,它就越具有道德意蕴。该如何把握康德的“道德性”概念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场景中,假设某人与孺子的父亲有仇,见“孺子将入于井”,他不但没有不忍之心,而且还有些幸灾乐祸,此时出于应当救人的道德法则意识,在这一法则的强制之下,他仍旧做出了救孺子的行动。对于康德来说,这一行动就是比较纯粹的道德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依照康德对于道德性的规定,感受促发的行动不具有道德的意蕴;但是,依照舍勒对于道德性的界定,感受促发的行动具有道德的意蕴。

参考文献:

- [1] 马克斯·舍勒.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 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 SCHELER Max. 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M]. Franke Verlag Bern Und München,1980:261.
- [3] 荷马. 伊利亚特[M]. 罗念生,王焕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570.
- [4]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C].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7.



引用格式:詹秀娟. 论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价值原则[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65-71.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2-0065-07

论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价值原则

On the value principles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thics

詹秀娟

ZHAN Xiujian

安徽大学 哲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关键词:

科技;
伦理;
公益性;
幸福生活;
价值理想

摘要:现代科技与伦理紧密关联、相互契合,其价值原则主要表现为公益性与功利性的统一、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公益性是科研活动的魅力与方向,幸福生活是科研活动的准绳,价值理想是科研活动的空间。面对多元化的价值,现代科研工作者应使其相互兼顾,在相互统一和相互权衡中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坚守自己的学术灵魂,坚持公众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人类社会创造幸福,以体现自身的根本价值。

收稿日期: 2017-11-26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Y05021029);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16D123)

作者简介: 詹秀娟(1983—),女,江西省九江市人,安徽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

价值活动是人们在接受价值的过程中做出的具体选择,这类活动包含有多个要素,不仅有价值选择的主体和客体,还有价值选择的方式和背景,这些要素都会影响到价值的选择与展现,这就是价值多元化的原因。价值从不同角度区分,有经济价值,还有人文价值;有理论价值,还有实践价值;有当下价值,还有未来价值。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这些价值进行不同选择,与我们怎样回答“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做的是什”,以及“什么是善的和幸福的生活”^[1]这一系列问题紧密相关。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者之间的契合关系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也面临着质疑。这种质疑源于这样一个重要难题:如何界定“应当”与“善”。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由多元化的价值而建构起来的选择机制来回应这种质疑,并论证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价值原则。

一、公益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 R. K. 默顿认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作为惯例的规则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2]。科学的宗旨是认识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就是认识的成果(结论),科学活动不带功利性,其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的这一本质属性表明,公有性和无私性的精神气质奠定了科学的公益性。科学的目的在于谋取自身的利益,而在于通过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来为人类谋幸福;科学家和科研团体在无私利的前提下进行科研活动,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公布于众,与人类共享,以期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幸福。因此,公益性不仅是科学的品性和根本,也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进行科研活动的前提和主旨,是科研活动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现代科学的公益性不同于古希腊科学的理论品性。古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纯理论活动,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所以其目的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认识世界。而现代科学的公益性直接体现为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这是其与古希腊科学的最大区别。小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也不同于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小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基本上是科学家个人的活动,其与技术、生产、应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速度远不及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小科学时代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其改变世界和人们生活的速度缓慢,有的甚至会经过几千年才能对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而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非常明显,世界和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受到科学的影响。这不仅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的组织性即政府性有关,而且还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与技术、生产、应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速度既快又频繁有关。科学的公益性主要是针对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而言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不仅有益于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而且还能较为迅速地改变世界,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

技术不同于科学,其品性在于它的功利性。在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技术显然远远不单纯是思想的具体化。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3]。通过发明和使用技术,人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爱好、欲望,也体现出了对价值的追求,这两点决定了技术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表达着一种建立在人们的需要和欲望的基础之上的价值诉求。人们不可能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和欲望,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去制造器具、发明和使用技术,因而当他人用技术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时,我们只有提供相应的服务、进行等价交换,才能享用这种

技术。这是技术功利性的最根本的表现方式。无论是古代的技艺(经验的技术)、近代的技术(设备的技术),还是现代的技术(科学的技术),技术的功利性都没有发生改变。技术的功利性虽然也表现在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为人们的生活创造幸福,但它不同于科学的公益性。因而技术不是完全基于大众的幸福来使用,甚或会因一己之私利而对他人造成伤害。

不过,科学的公益性和技术的功利性的区分在现代渐渐模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趋势导致科学和技术的性质难以明确区分,公益性和功利性也很难截然分开。当科学为实现自己的理论目的开始向技术订购工具时,科学的公益性已经与技术的功利性联系在一起;当科学的理论研究离不开既精巧又具有强大功能的技术时,科学的公益性日渐为技术的功利性所影响;当技术的“座架”之本质完全支配着我们改造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方式时,向技术订购工具的科学亦将落入此渊藪。在这种境况下,科学的公益性会向技术的功利性发生偏移。在此过程中,科学的公益性不会遭到完全的抛弃,但在技术功利性的熏陶之下,“‘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和超脱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4],科学的无条件的公益性的精神气质将会发生某种变化,成为有条件的公益性,从而与技术的功利性融合在一起。在大科学时代,个人需要若想得到满足,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以共同完成某项研究,其中必然会涉及多方的利益,并且由于研究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巨额的资金,投资者可能是个人、企业和组织,也可能是政府。这样,科研必然会受到投资者的制约,科研的功利性就会因此变得更为明显,科学的公益性会向技术的功利性发生偏移,使得科学无条件的公益性成为有条件的公益性,从而与技术的功利性逐渐融合在一起。

从当下来看,科学的公益性向技术的功利性的偏移,有益于促进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的应用研究水平的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则不利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当科学的纯粹理论研究受到技术功利性的巨大影响时,科学研究将会夹杂着更多的私利,有悖于科学的公有性和无私利的精神气质,从而从源头上玷污科学的理论研究;一旦这种科学研究成果投入到技术、生产之中,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将直接危害人们的安全和幸福,使科学和技术的本性发生扭曲。这一点正是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根本上乃是“源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竞争中科学技术的盲目利用”^[5]。惟有改变这种境况,才能提升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水平。公益性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但对公益性的追求也不能脱离科研活动的现实境况。现代科研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力量即技术手段的支撑,因而其势必会受到功利性的影响。在现代科研活动中,我们既不能仅坚持科学的公益性原则,也不能忽视在科研活动中科学对功利性的追求,只是对功利性的追求要以公益性原则为前提和基础。唯其如此,才能坚守科学的学术灵魂,体现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

公益性的价值原则体现了整体性的文化特征,功利性的价值原则体现了个体性的文化特征。科研在现代的双重特征,要求我们在进行科研活动时,必须体现并且贯彻公益性与功利性相统一的原则,不仅要坚持公益性的价值原则,还要坚持功利性的价值原则。公益性是科学家价值选择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他们价值选择的归宿,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为人们的幸福谋福利,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功利性是在公益性的基础上根据科研的现代特性而提出来的,科学研究应立足于公益性原则去谋取个体的利益和幸福。在对某一领域进行

研究和开发的时候,其科研方向应符合公众和整个人类利益,当自身的研究或者投资者的利益与公众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的时候,科研工作者应顶住外部投资者的压力,坚守自己的学术灵魂,坚持公众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人类社会创造幸福,以体现自身的根本价值。

二、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

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第二个价值原则是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关系是在公益性与功利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公益性与功利性统一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幸福生活是公益性的具体展现,也是公益性的根本目的,坚持公益性的目的在于创造幸福生活;科研价值是功利性的具体展现,功利性通过科研价值的体现而得以通达和贯彻。公益性和功利性的这种关系,决定了科研价值要以幸福生活的实现为评价标准,一旦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惟有放弃科研的功利价值,选择幸福生活。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其一,混沌的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与科学的内在性质及其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古希腊的科学作为一种理论,与当时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直接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认为,幸福生活不在于用行动来改变周围的世界,而在于通过对事物自然本性进行理解和观察,由沉思抵达幸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沉思是唯一因自身之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6],沉思作为合乎自身的活动,它必定是完善的幸福,这种幸福通过神思即对事物本质的沉思而体现出来。虽然沉思式的幸福生活超乎世俗生活,却为凡人所向往,故而也奠定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理解的基调。以这种基调为根本的早期科学,服膺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其科研价值

在于通过沉思来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服务。所以,在古希腊重视沉思的精神气氛中,科研价值和幸福生活混沌地统一在一起,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明确区分。

其二,又统一又分离的复杂状态。这与科学在近现代内在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近代社会的变革与科学密不可分。科学不仅加快了近代社会的变革速度,而且提高了近代社会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创造幸福生活提供了动力和活力,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性得以极大提高。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态发生了变革,以研究型的方式呈现出来,“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策划为根据”^[7],作为研究型的科学在对对象区域的筹划之际,首先设定的是对存在者的筹划,其通过专门化的方法来操纵存在者、预测存在者的状况,从而支配着存在者。通过这种筹划,作为研究型的科学摆置着存在者,在此摆置中,人将自己摆置成存在者关系的中心。这样,人在不断地摆置中,最后也把自己作为对象进行摆置;存在者整体只有被人摆置,它才是存在着的。换句话说,作为研究型的科学支配着对人类和世界的摆置。于是,人和存在者整体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改变着人们对现实的幸福生活的理解。从这个层面来看,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开始处于分离的状态。

其三,有机的内在统一关系。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之间的分离并非一直持续下去。科学之所以有时与幸福生活相悖,其原因就在于作为研究型的科学在对对象的支配中把对象视为可摆置的对象和手段,但生活并非手段而是目标,而且此目标并非中期目标,而是一个终极目标、一种自我目的^[8]。在当代,科学被嵌入在生活本身之中,现实生活是科学的出发点与归宿。幸福生活不在于对作为手段的对象的控制和实现,而在于把对象作为一个终极目标去认识和

理解,进而借此实现一种自我目的。科学活动不是通过计算、计划和研究对生活施行暴力,而是在对生活本身进行解蔽的过程中,完成生活的托付,实现生活的目的。于是,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又实现了有机统一。

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在历史中呈现出来的三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科研价值的不同维度。古希腊科学的价值与希腊人对幸福的理解内在统一,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而近现代的科研开始偏离幸福生活这一目标,其科研价值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本;当代科技发展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渗透,从某种程度而言支配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目的的理解,但科研工作者固守初心,坚持科学的原初价值追求,即以幸福生活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标准。“科学研究是运思无禁区、验证有禁区”^[9],在理论上,科研工作者可以随意进行理论设想,但在现实行动和对象性活动中,则要受到相应的伦理规则的限制,以使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保持和谐的状态,从而使科研在促进幸福生活的维度上实现自身的价值。

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精深的科学理论和精巧的技术手段,可以无止境地去探索研究,科研的能力与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科研活动的开展不仅与对享乐欲望的合理认知有关,还与对能力、完成的冲动的正确态度有关。“当我们从抑制享乐欲望过渡到抑制能力与实施,过渡到抑制完成的冲动时,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10] 科研工作者不能任由研究能力和完成的冲动泛滥,在科研中应该基于对幸福生活的沉思,对能力、冲动进行规约,促成能力的实施、完成的冲动与生活目的的和谐统一。在幸福生活的价值维度内,当代的科技发展在研究能力与完成的冲动方面,应该设置相应的界线,坚持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的内在统一。

三、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

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是对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内在统一关系的进一步延伸,是基于当代与未来对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之关系的阐释。生活是一个统一整体,我们无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完全割裂开来,否则,生活将是破碎不堪的。价值的意义与作用不仅影响着当下,还影响着未来。因而从生活和价值的本性来看,我们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即关注生活和价值的持续性影响,关注未来,而不能仅仅专注于当下。可持续发展应以公平为前提,这种公平,“既指代内公平,又指代际公平”^[11],价值理想着眼代际公平,从未来的视角进行审慎的选择,理想的价值形态不仅包含当下的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和谐,而且还包含未来的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和谐。因而价值理想的现实必然要求当下的行为者在双重的和谐状态下审慎地行动,做出选择;价值现实须从未来的视角去进行度量、采取行动。因此,价值理想和现实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进行选择,但两者在现实选择过程中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关系样态,以致无法在两者之间作出简单的割裂处理。

从生活和价值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待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科学理论都面临着处理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但由于科学理论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样态,因而在不同时期,科学理论对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关系的处理也不一样。古希腊科学的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内在地融为一体,其价值理想高于价值现实。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慢慢改变了古希腊科学的这种理念,这种改变在当代科学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当然这种改变并非完全抛弃了价值理想,而只是意味着观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转移。近现代科学和

当代科学虽同样面临着从理想层面出发来提升现实高度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不仅仅是纯粹地表现为理论,而且还在于它们是在对理论进行超越和创新的基础上去改变世界。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知识的增加使我们能够准确地预见我们自身的行为对后代生存的影响”^[12]。由此可见,与古希腊科学相比,近现代科学、当代科学在理解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关系的维度上发生了偏移,即它们开始从当下与未来的关系视角去看待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

从当代科技发展走偏方向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来看,“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就是在技术文明时代下对全人类行为的否决性任务。人类行为已经变得无所不能,即使不在其创造性的潜在方面,至少在其破坏性的潜在方面是这样的。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必备条件之一,这种关注显而易见包括对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物质的未来的关注”^{[6]136}。当代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在资源利用方面,还是在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方面,都对未来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削弱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生活的整体性要求当代科研活动在对价值的追求中也要考虑到其自身价值的整体性。科研活动在与当代人的幸福生活保持和谐的同时,也要顾及到未来人们的幸福生活。科研工作者在做出价值选择时,必须把对未来的关注作为自身生存的必备条件,以维护未来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能力。

对未来的关注不仅是由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对下一代的责任,而且还关系到我们自身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既是我们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力量支撑、我们的生存力量的展现,也是我们的生活得以延续的动力。生活的意义之内涵极其丰富,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中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生产

日益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在赋予生活意义的同时,不能在相对狭隘的层面对待赋予意义的能力,不能在相对自我封闭的空间中进行发掘和培养,否则它最终会损害人们对意义的追求和获取。在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获取意义的能力也必须保持开放,这种开放不仅包括在空间上对全球保持开放,而且包括在时间上对未来保持开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开放和坦诚的环境中,不仅关照当下生活的意义,而且关照未来生活的意义,从而使我们在整体的意义上维护生活的和谐。

当代科技发展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我们生活的意义与未来生活意义的开放关联,要求当代科技在规划和发展中一定要引入未来的维度。这就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在科研活动中一定要把未来人类的幸福纳入自己的所思和所行中。在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间,人们不能为了科研的现实价值而损害未来人类的权利和幸福,而应在对未来的关照中,在价值现实不损害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创造自身的现实价值;在对科技的研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中,应该在价值现实的面前捍卫价值理想,不削弱和侵犯后代子孙的利益和幸福。科研工作者既不能无止境地摄取资源,抢夺未来人们的生存资源;也不能一味地开发,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给后代的生存留下后患无穷的烂摊子;更不能随意应用科学理论更改对生命本身和生活意义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张华夏. 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 2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
- [2] MERTON R K.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69 - 270.
- [3] 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

-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0.
- [4] 曹南燕.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J]. 哲学研究,2000(1):48.
- [5] 程现昆. 科技伦理研究论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3.
- [6]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65.
- [7]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M]. 孙周兴,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893.
- [8] 奥特弗利德·赫费. 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
德[M]. 邓安庆,朱更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0.
- [9] 韩东屏,欧阳康. 疑难与前言:科技伦理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0.
- [10] 汉斯·约纳斯. 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M]. 张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7.
- [11] 陈昌曙. 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4.
- [12] 廖小平. 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

(上接第58页)

的可能性。如果人们对自己道德力量的作用持悲观甚至怀疑态度,或是把自己看作是可以被不告知的模式或政治操控者的傀儡玩物,那么人们便不可能去捍卫自由,而必将成为决定论主宰下的牺牲品,失去自己作为人所拥有的珍贵美好的自由意志。伯林对决定论进行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认清楚决定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信唯有个人勇敢地承担责任以及因抉择所可能引起的焦虑不安,人们才能享有自由,才能去维持、建立、捍卫难能可贵的自由社会。

参考文献:

- [1] 以塞亚·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2] 以赛亚·伯林. 现实感[M]. 潘荣荣,林茂,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3] 以塞亚·伯林. 扭曲的人性之材[M]. 岳秀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7.
- [4] BERLIN Isaiah. Reply to Robert Kocis[J]. Political Studies,1983:392.
- [5] BERLIN Isaiah.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M]. London:Pimlico,1998:129.
- [6] CARR E H. What history[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
- [7] 以塞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M]. 彭淮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2.



引用格式:张省,常江波. 共享经济研究述评与展望[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2):72-80.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72-09

共享经济研究述评与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haring economy research

张省, 常江波

ZHANG Xing, CHANG Jiangbo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对创新创业、经济增长、社会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极大推动作用。梳理有关共享经济模式的研究发现:已有研究中对共享经济模式划分,较为典型的是按照消费观念、共享行为与共享方式来划分。在技术、观念、政策、资本等的推动下,共享经济逐渐形成,其主要通过主易提成、滞留资金、广告收益、订制服务来实现盈利。从共享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可以推测:传统行业在未来将会向共享经济模式靠拢;共享企业将会朝着全球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共享经济治理将会更加民主化、多元化。展望共享经济研究,盈利模式、传统行业融合共享思维、共享平台治理模式等将成为研究重点。

关键词:
共享经济;
互联网技术;
使用所有权;
交易平台

收稿日期:2016-1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D03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JJ07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018-ZDJH-367)

作者简介:张省(1981—),男,河南省桐柏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特聘教授,管理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管理。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应在共享经济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2011年,“协同消费”就被《时代》周刊列为改变世界的十大理念之一。共享经济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新动力,为社会资源可持续发展带来新思路。面对共享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英国、韩国、加拿大、德国等都相继制定了相应的共享经济政策,希望能够借共享经济的东风,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最早对共享经济作出阐述的是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他们提出的“协同消费”思想为共享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1]随后,国内学者李炳炎和国外学者马丁·威茨曼相继正式提出“共享经济”概念,他们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合作共享的消费模式,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2-3]但是受到技术水平和消费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共享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缓慢。2014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变,共享企业数量剧增。据中国知网(含期刊,硕士、博士论文等26个子库)和Elsevier SDOL电子期刊数据(含24个子库),有关共享经济的中、外文文献总量分别为29339和224836。从2009—2017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见图1)可知,共享经济正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鉴于此,本文拟对共享经济的内涵、模式、机制等的研究进展进行回顾,以期对其未来研究提供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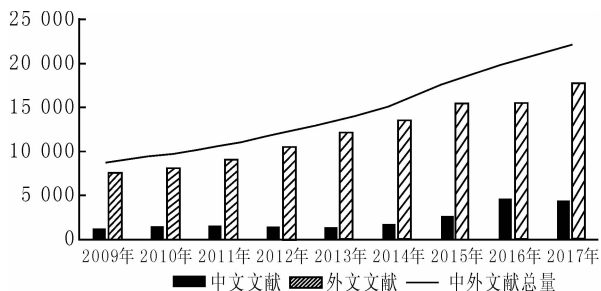


图1 2009—2017年共享经济中外文献走势图

一、关于共享经济之内涵的研究

虽然共享是一种古老的社会实践,但它目前正在通过利用Web 2.0技术的力量扩展并重新定义为爆炸式的共享经济^[4]。共享经济这一概念涉及多样化的共享形式,包含多领域的实践活动,涵盖盈利性和非盈利性项目^[5-7],有着特别的要素、构成与特征。

1. 共享经济的定义

“共享经济”自提出以来,就与“使用权经济”^[8]“协同消费”“点对点经济”^[9]“零工经济”^[10]等概念交替使用。尽管共享经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但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其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共享经济从初生、形成到进一步发展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见表1。

目前,学术界对于共享经济的定义尚存争议,但学者们在有些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其一,共享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长久难以解决,主要是受到逐利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共享经济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不对称这一现实,是经济领域的创新成果。其二,共享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方式。在互联网交易平台的驱动下,海量、分散、多样化的资源和需求信息得到整合,使供需双方能够快速匹配。其三,共享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与发展观。共享经济模式提倡人们对于物品的重复利用,倡导“重使用、轻拥有”的新观念。

2. 共享经济的要素

共享经济在个体、资源、技术和环境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作用下(见图2),借助互联网交易平台,交易主体以去中心化的身份参与共享,在高效便捷的共享环境中实现价值创造。

(1) 个体要素

在共享经济中,个体要素主要包括卖方和买方,即供给侧和需求侧。供给侧希望能够处

表1 共享经济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发展阶段	代表人物	主要贡献或观点
理论渊源	V. Thunen ^[11]	认为解决资本主义劳资矛盾的方法不是废除私有制,而是通过分享制使每个人都成为资本的所有者
	T. Carver ^[12]	认为通过分散产权可使收入合理化,改善劳资关系,激励劳动者并提高生产力
	Johnstone ^[13]	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
	L. O. Kelso ^[14] 和 M. J. Adeler ^[15]	提出“新资本家”概念,认为“员工持股计划”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
	T. W. Schultz ^[16] 和 G. S. Becker ^[17]	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在经济增长中前者的作用甚至高于后者
理论形成	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	提出“协作消费”,即几个或者更多个体在共同行动中一起消费经济物品或服务
	李炳炎	社会主义共享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中国势必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
	马丁·威茨曼	将工人的工资与企业的收益联系起来,促使劳资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新发展	詹姆斯·米德 ^[18]	将经济共享划分为纯利润共享和纯收入共享两种形式
	R. Belk ^[19]	回顾和对比了两种类型的分享:传统的分享和基于互联网的分享
	R. Botsman 和 Rogers ^[20]	将分享经济定义为“为了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收益,分享空间、技能、物品等闲置资源的经济模式”
	M. Bauwens	将共享经济称为点对点经济(即 P2P 模式),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共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L. Gansky ^[21]	认为“使用而非拥有”和“不使用即浪费”是共享经济的两个核心理念
	P. Laura, T. Cooper, T. Fisher ^[22]	认为共享经济追求的是社会文化价值,根本上是价值观的变化;共享经济能真正实施,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
	罗宾·蔡斯 ^[23]	认为共享经济的本质是:我们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能让这个市场更有效率
	谢志刚 ^[24]	提出共享经济是知识经济发展新阶段和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具体表现,即个人为了达到均衡状态对不同知识的一种主动协调的现象
	马化腾,张笑荣,孙怡,等 ^[25]	认为共享经济是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共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
	张新红,于风霞,高太山,等 ^[26]	认为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共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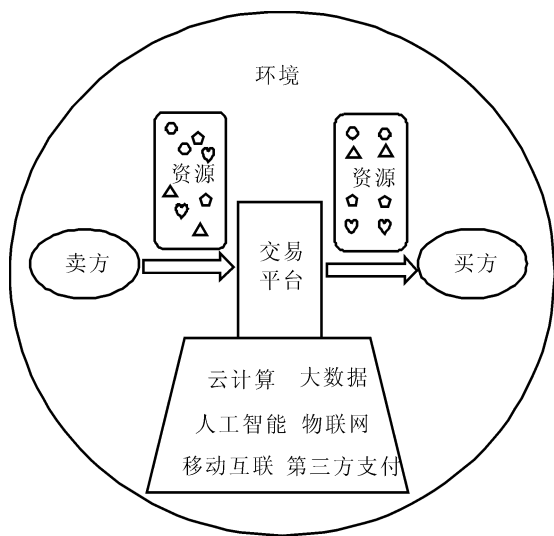


图2 共享经济中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色消费,并希望能够获取某些经验。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供给侧和需求侧在信息的不断流动中实现共享。同时,当共享内容发生变化时,卖方与买方的角色也会动态地改变。因而可以说,在一个共享过程中,个体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2) 资源要素

共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资源是富足的,现代科技和生产能力高度发达,产生了大量富足的资源,从而拥有了共享对象。另一方面,相较于欲望无限的人们来说,资源又是有限的(如资金、土地、时间等的有限性),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人们只能选择对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产品或

理闲置品,或以物易物,或出租盈利,或免费共享等。需求侧希望能够实现低成本、个性化、绿

服务,共享经济的出现则创新性地化解了经济剩余问题,借助相关技术,最大化地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3) 技术要素

现代共享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依赖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在地理位置、信息交流不便的情况下,相互共享很难。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打破了时间、空间等的限制,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体连接起来,使资源的重新分配有了可能。可以说,互联网技术是共享经济得以发展的支撑力量。

(4) 环境要素

共享经济的环境要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政治环境主要指政府对共享经济的态度和相应的法律规定等。经济环境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口、土地等资源的拥有状况和经济增长速度等。社会文化环境是指在不同地域中人们经长久积累演变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如消费观,价值观等。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要想使企业获得长久发展,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要素的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3. 共享经济的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共享经济具有以下两个典型特征。

其一,互联网技术是共享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各种新型的共享模式不断出现。目前的共享经济,主要是依靠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交易产品也由单一、标准化转向个性化、私人订制。

其二,使用所有权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随着法治社会的逐步建立,人们对于产权的观念日益清晰。目前,“共享经济”这个词已成为非所有权形式消费活动的统称,如交易、

出租、分享和交换。在共享经济中,人们主要强调物品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用权是指不改变财产的本质而依法加以利用的权利。共享经济主体通过共享某些资产(知识、资金、技能和固定设备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共享经济的许多定义都建立在优化未充分利用的资产,以促进获取而非所有权的理念上^[27]。

二、关于共享经济之模式的研究

依据消费观念、共享行为和共享方式的不同标准和分析角度,学者们对共享经济的模式进行了划分,具体见表2。

表2 共享经济模式划分

代表人物	划分依据	划分类别	主要案例
Botsman 和 Rogers	消费观念	产品服务系统	共享单车
		再分配市场	eBay
		共享生活方式	知乎,分答
张孝德 ^[28]	共享行为	有偿共享	滴滴出行
		对等共享	城乡体验
		劳务共享	Instacart
		众筹共享	陆金所
马化腾	共享方式	使用权共享	空中食宿
		时间共享	春雨医生
		所有权共享	途家

1. 根据消费观念划分

(1) 产品服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之间交换产品和服务,但是所有权不会发生变化,仅会出现产品使用权的转移。人们只需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付费,而不必考虑其他,其主要形式有租赁和共享等。例如,在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中,人们可以实时地寻找距离自己最近的车辆,使用完后仅需支付相应的租赁费,而车辆的保养维修等费用则与消费者无关。

(2) 再分配市场。这种模式与传统的二手商品市场相似,但其发展更多地依赖于互联网,其拥有的资源和需求信息都是海量的、大规模的。在这种模式中,随着交易的发生,所有权和使用权都会发生转移。在再分配市场中,商品可

能是免费的,也可能是互换的,但更多的是用来盈利的,如 eBay、Swap.com、闲鱼等商业模式。不管交易的形式如何,再分配市场更多强调的是对物品的循环利用,希望人们将旧的、不用的资源再投入市场,经过流通到达需要者的手中。

(3) 共享生活方式。这种模式中交易的内容大多是无形的。根据不同的诉求,互联网将其分类聚集成为一个个专业化的团体或组织,从而方便人们实现时间、技能、知识等无形资产的交换。在这种模式中,人们通过系列衡量标准将无形资产量化处理,进而使消费变得更加多样化。例如,知乎,分答和平安好医生等,就是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将时间、知识等进行量化定价,从而使无形资产也能够投入到市场运作中。

2. 根据共享行为划分

(1) 有偿共享模式。有偿共享的关键是共享的盈利属性,只要能够实现盈利的目的,物品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皆可共享。这种模式也是目前覆盖面最广的一种模式,如滴滴出行、空中食宿等模式。对于共享经济中的大多数企业而言,其发展目的多是为了盈利;即使有些企业目前仍处于无偿共享状态,但随着使用群体的增多和企业的发展,其最终都会走向有偿共享模式。

(2) 对等共享模式。对等共享的特征主要是无报酬共享。在这种模式中,双方将各自的物品、空间、知识、技能等进行交换。这种模式强调的并不是收益本身,而是希望借助一个平台,使双方无需投入更多资源就能够实现“1 + 1 > 2”的效果。这种模式下并没有明确的买方与卖方,参与者既是供给方又是需求方。例如,目前国内所推动的城乡儿童手拉手体验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等共享模式。

(3) 劳务共享模式。目前,对于物品、时间、技能、资金等的共享实践已有很多,但是,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劳务也是一种可以共享的资源,现实中还有大量分散的劳务资源尚未充分利

用。例如,Instacart 公司凭借其 1 小时送货上门服务实现了劳务共享。

(4) 众筹共享模式。众筹就是指利用大众的力量实现资本集聚。众筹共享模式就是在平台的作用下,将零碎的资源进行汇聚,并按照不同规模、不同类别进行利用。众筹有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之分。例如,陆金所、京东众筹等的主要目的就是盈利,而像水滴筹、松松筹这样的项目则属于非盈利性众筹,旨在通过社会的共同帮助来实现某些公益性目的。

3. 根据共享方式划分

(1) 使用权共享。使用权共享的产品主要是那些短期不需使用、长期所有权不希望改变的资源。在这种模式中,共享的资源主要是闲置的物品或资金。例如,借助于空中食宿的平台,人们实现对闲置房屋使用权的转移。而对于闲置的资金,人们可以在 P2P 借贷平台上,将资金的定期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从中收取一定利息作为报酬。

(2) 时间共享。当代共享经济活动的发生,大多依赖于网络平台,这就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例如,在春雨医生的平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为病人提供咨询建议服务,进而可以为自己带来额外收益。这种模式打破了时间、空间和管理等方面的壁垒,为社会增加了大规模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压力。

(3) 所有权共享。以往,当人们不再使用某些物品时,就会将他们闲置,甚至丢弃。虽然闲置的资源对于所有者而言已经失去了价值,但资源本身还拥有未发掘的潜在价值。这时候,只需对资源进行重新匹配,就可以为供给方、需求方和社会带来多重效益。例如,途家公司推出一项共享度假新模式,用户需在指定的时段内将房屋的所有权让渡,平台根据一定的

算法将共享的房屋进行匹配,从而实现了所有权的共享。

通过对上述共享经济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一些明显特征:其一,现有模式概括尚不能将所有的共享实践涵盖在内,尽管划分方式与角度不同,但最终划分类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其二,由于多数共享经济研究和实践都集中在消费领域,这就使得研究分类受限,不能更全面具体地考虑问题本质;其三,对于共享经济中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如盈利与非盈利、所有权与使用权等,相关学者在划分时并未重点涉及。

三、关于共享经济之机制的研究

尽管最近人们对共享经济的关注度激增,但对参与共享经济的动机知之甚少。本文拟从共享经济的形成机制、盈利机制和演进机制三个方面来探讨共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

1. 共享经济的形成机制

(1)共享经济是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的最新成果。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终端的使用范围由中青年扩大至少年和老年,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内容变得多样,消费地点也变得灵活自由。同时,通过与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相融合,消费成本变得更低,覆盖范围变得更广。

(2)共享经济是新生代群体消费观念的集中体现。消费观念的转变是共享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R. Godelnik^[29]通过体验的方式让新生代与共享经济接触,结果发现,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此前的过度消费会给社会带来风险,而注重获取而非拥有则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社会。共享经济追求的是一种低碳节能、循环利用的新型生活方式,其对于促进生态文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共享经济是政策引导的典型示范。随着共享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由于其涉及到大规模的人群,也因为其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各国政府对其态度已由模糊变为明确支持。美国通过立法使得专车、股权众筹等商业行为合法化。2014年,英国政府就制定了打造共享经济中心的相关计划。在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人们对相关企业给予更多的信任,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快速成长。

(4)共享经济是金融资本市场运作的产物。目前,各国都在极力提倡创新创业,新颖的想法不断提出。对于这些创新项目,只要其未来预期效果好,就会有大量资本投入,而大量金融资本的投入,使新兴的共享经济企业能够迅速占领市场,进而形成规模化效应。

2. 共享经济的盈利机制

(1)交易提成。交易抽成是多数企业考虑的盈利方式。平台作为主要的交易场所,在交易完成后会向双方收取提成以获得盈利,目前大多平台的收费对象多为供给方。例如,“滴滴打车”就是通过向司机收取佣金来实现盈利的;一些二手物品交换平台,也大多是向卖方收取交易提成的。

(2)滞留资金。共享经济的许多企业都会构建自己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收取押金等一系列吸取资金的方式,获得大量资金的使用权。对于滞留资金,企业可能会进行投资获益、资金周转或规模化发展。目前,较为典型的就是共享单车的押金模式,受其模式启发,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施行这种策略。

(3)广告收益。拓展经营成本趋于零的广告业务,对于共享企业来说又是一大盈利点。对于那些拥有大规模用户的企业而言,用户就是其最大优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就能够形成可观的广告推广。同时,通过发掘自身的经营特点,前期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并制定独特

的广告投放方式,既能吸引大量企业进行广告合作,又能够对自身品牌进行宣传,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4) 订制服务。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不断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人们的需求不再单一化、大众化,个性化订制服务应运而生。例如,对于那些鞋码较大的人,过去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鞋子,但是现在通过相应平台就可以订制最适合自己的鞋子;过去人们在跟团出游时都会受到行程规划限制,现在多样化的出游方式和路线正不断增多。

3. 共享经济的演进机制

共享经济是技术进步、观念转变、政府引导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未来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从共享经济的兴起原因和发展趋势可以推测,传统行业在未来将会向共享经济模式靠拢,随着企业的全球化、生态化发展,企业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升(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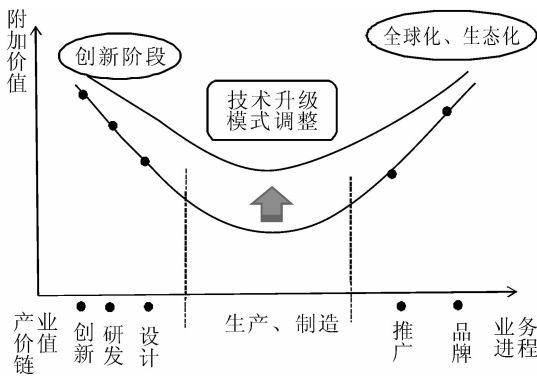


图3 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

(1) 传统行业将与共享模式不断融合。2015年我国开始了调整产业结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传统行业中低效、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新兴的共享经济模式为其提供了改造思路,可以帮助其淘汰落后产能,引入新的运营模式,对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进行重构,从而使传统企业紧跟时代发展,焕发新的活力。

(2) 共享企业将朝着全球化、生态化方向

发展。在市场、资本、政策与企业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中小企业平台将会逐渐消亡,整个行业会出现一超多强局面,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会发生较大改变。为进一步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企业会加速全球化、生态化建设。一方面,共享经济类企业的发展目标将会转向全球,在以往发展基础上开拓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会对其所掌握的数据、技术等加以整合,发掘创新,进而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共享生态系统。

(3) 共享经济治理将会更加民主化、多元化。共享经济的治理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三方来协调合作。企业是共享经济的直接参与方,其首先要保持自身操作的合理和规范,其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来制定相应的信用评价体系,进而确保共享经济市场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政府不应直接参与经营活动,而是要发挥维护和服务作用。此外,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能够使得共享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关于共享经济研究的展望

共享经济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众多因素的集合体,其组织与运行正逐渐升级到区域和国家战略层面。基于共享经济现有文献,本文初步形成以下结论。

其一,共享经济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虽对共享经济的概念、特征、模式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在学术研究中,专业名词微小的差别都将导致研究对象、方向、结果大相径庭,未来的研究应对共享经济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区分,为深入研究提供清晰的目标。在共享经济模式划分上,现有成果仍有一些值得继续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未来在进行模式划分时,应具有前瞻性,尽可能地适应共享经济模式的动态性变化。

其二,共享经济的实证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虽对共享经济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能够从实证角度去揭示其本质,但是到目前为止,实证研究并未明确指出共享经济的动态^[30]。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共享经济的出现和变化形式,对于理解共享经济的动态至关重要。

其三,共享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方式不断丰富。在英国政府2015年出台的共享经济政策中,强调要对共享经济的规模 and 影响进行统计和评估。国内学者吕本富等^[31]提出测量共享经济规模的四层模型,构建了测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方式的局限性。解决共享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问题,将极大地推动共享经济的计量研究,减缓目前共享经济研究过度依赖于个案分析的状况。目前的一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共享经济统计的片面性,考虑了网络基础产业和外部经济,但仍然存在细分指标难以量化、数据收集和调研过程复杂等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共享经济的研究逐渐丰富、不断深入,但当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共享经济的概念、特征、模式等理论层面。通过对共享经济众多文献的梳理,发现以下三个方面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其一,对盈利模式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盈利既是其发展的目的,又是其长久发展的保障。我国共享经济起步晚,大多数企业在创业伊始就将国外的企业作为模仿对象,很多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都是从国外企业移植过来的,创新意识不够强,缺乏个性和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并且盈利模式大多为收取交易佣金,收入来源单一。因此,未来对共享经济盈利模式的研究应当加强。

其二,对传统行业融合共享思维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新结构、新理念、新技术等不断冲击着传统行业的经营

理念、管理模式与企业结构。这是一场经营管理革命,面对共享经济类企业的兴起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传统行业应挖掘自身特点,利用共享经济的思维方式,将企业放在一个新视野中制定发展战略,使企业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优势,进而在全球化竞争中占据优势。

其三,对共享平台治理模式的研究。在共享过程中,过于依赖交易平台导致过多的权力交给了企业,而企业主要关注经济效益,很少关注社会和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民主化共享经济治理平台的研究就更为迫切。为探索这一研究主题,可以把平台治理的理论、民主的组织治理和社会技术系统的价值的制定结合起来,为分析新兴的平台治理民主模式提供概念框架,并将理论运用到实证案例研究中,从而不断探索最适宜的平台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 [1] FELSON M, SPAETH J 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8(4):614.
- [2] 马丁·威茨曼. 分享经济[M]. 林青松,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 [3] 李炳炎. 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 1981(4):69.
- [4] ACQUIER A, DAUDIGEOS T, PINKSE J. Promises and paradoxe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125):1.
- [5] SCHOR J. 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R]. A 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 2014.
- [6] SUNDARARAJAN A.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 [R].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016.
- [7] ACQUIER A, CARBONE V, MASSE D. Creating value in the sharing economy: business models,

- scal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mpacts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GOS Conference, Sub-theme Organizing in the Shadow of Sharing, 2016.
- [8] BARDHI F, ECKHARDT G M. Access-based consumption: the case of car sharing [J]. *Consum. Res.*, 2012(4): 881.
- [9] BAUWENS 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er production [J]. *Ctheory*, 2005(12): 33.
- [10] FRIEDMAN G. 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 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 [J].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014(2): 171.
- [11] THUNEN V. *The isolated state* [M]. London: Pergamon Press, 1966.
- [12] CARVER T. *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Little Brown Press, 1925.
- [13] JOHNSTON. *America unlimited* [M]. New York: Doran Doubleday Press.
- [14] KELSO L O, ADLER M J. *The capitalist manifestatio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1958.
- [15] KELSO L O, ADLER M J. *The new capitalists: a proposal to free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slavery of saving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1961.
- [16]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beings*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17]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 [18] 詹姆斯·米德. 分享经济的不同形式 [J]. 冯举, 译. *经济体制改革*, 1989(2): 114.
- [19] BELK R. You are what you can access: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8): 1595.
- [20] BOTOSMAN R, ROGERS.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0.
- [21] GANSKY L. *The mesh: 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haring* [M]. Penguin, 2010.
- [22] LAURA P, COOPER T, FISHER T. The role of values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insights from a product-service system for lending and borrowing in the UK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5(97): 21.
- [23] 罗宾·蔡斯. 共享经济: 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 [M]. 王芮,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9.
- [24] 谢志刚. “共享经济”的知识经济学分析——基于哈耶克知识与秩序理论的一个创新合作框架 [J]. *经济学动态*, 2015(12): 78.
- [25] 马化腾, 张笑荣, 孙怡, 等. 分享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新经济方案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 [26] 张新红, 于凤霞, 高太山, 等.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 [J]. *电子政务*, 2017(3): 2.
- [27] RANCHORDAS S. Does sharing mean caring: regulating innov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1): 413.
- [28] 张孝德, 牟维勇. 共享经济: 一场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5(12): 6.
- [29] GODELNIK R. Millennials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lessons from a buy nothing new, share everything month project [J].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2017(23): 40.
- [30] JOJANNA M, REISCHAUER G. Capturing the dynamic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n the plural forms and practices of sharing economy organizations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125): 11.
- [31] 吕本富, 李家琳, 曾鹏志. 分享经济规模的测度指标研究 [J]. *管理现代化*, 2017(5): 92.



引用格式:梁文化.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
响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2):81-87.

中图分类号:F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81-07

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enterprise technology-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innovation ability

梁文化

LIANG Wenhua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的高低已经成为一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借鉴 Lichtenberg 和 Pottelsberghe 国际研发溢出测算模型,对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国内创新能力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以发明和实用新型为表征的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弱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而对以外观设计为表征的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则显著强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内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三种路径。我国企业应通过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研发和创新网络,在提升自身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提升我国创新能力。

关键词: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逆向技术溢出;
创新能力

收稿日期:2018-0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CJL046);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9172005);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13501050031)

作者简介:梁文化(1986—),男,河南省新蔡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步入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依靠传统的引进国外成熟和标准化的技术已经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并且随着发达国家对其先进技术的国内锁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模式困难重重,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发展实践也表明,只有在学习和模仿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才能最终形成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最新发布的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中,我国仅仅位列第 22 位,另外,我国的研发(R&D)投入强度、每万人拥有的 R&D 人员数量、每百万人拥有的 PCT(专利合作协定)专利数量和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等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使得我国企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过程中步履维艰。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国家“走出去”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OFDI)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向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 OFDI 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2016 年,我国 OFDI 流量蝉联世界第二位并连续两年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为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从国际市场获取资金、技术和战略资源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作为与引进外资同等重要的国际技术外溢渠道之一,技术寻求型 OFDI 能否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OFDI 的发展现状,在将衡量国内创新能力的指标详细分解为发明、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的基础上,构建省际面板模型,探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OFDI 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推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OFDI 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

一、研究综述

关于 OFDI 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较早就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A. Fosfuri 等^[1]通过构建双寡头古诺模型,利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了无技术优势企业的 OFDI 行为,认为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不仅存在于母国向东道国的 OFDI 行为中,后发国家企业通过接近发达国家研发和技术密集地也可以获得技术的逆向溢出,从而提升母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T. Iwasa 等^[2]分析了日本跨国公司的 OFDI 行为,发现其在美国的研发支出与其海外专利数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证实了通过 OFDI 渠道获取的研发溢出可以促进自身的技术创新。P. J. Buckley^[3]选取中国制作的 1984—2001 年 49 个国家的 OFDI 面板之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 OFDI 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效应,结果显示其对国内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A. Gazaniol 等^[4]以法国企业的 OFDI 活动为研究对象,用 PSM 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其 OFDI 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OFDI 行为对法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J. Masso 等^[5]选取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了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其对公司层面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但是其在提升母国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整体的技术和创新水平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没有显示出来。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确立,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如何实现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关于 OFDI 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机理与实证两个方面。

(1)关于 OFDI 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机理研究。赵伟等^[6]是国内较早对该问题进行探究的学者,他们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 OFDI 影响母国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的机理,从 R&D 费用分摊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体系,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 OFDI 与 TFP 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OFDI 对 TFP 的影响程度虽然较为微弱,但结果显著为正。陈菲琼等^[7]强调了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实现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的重要意义;总结出 OFDI 影响自主创新的四种反馈机制,分别是海外研发、收益反馈、子公司本土化和对外投资的公共效应,并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法对四种反馈机制进行了验证。汪斌等^[8]在区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二次创新的基础上同样从四个方面总结了 OFDI 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海外研发技术反馈、并购适用技术、利润反馈、OFDI 的外部效应。胡宗彪等^[9]则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不同层面分析了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研究了影响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王恕立等^[10]从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 OFDI 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协整理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关于 OFDI 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沙文兵^[11]运用 2004—2008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 OFDI 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结果显示:OFDI 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吴建军等^[12]从 R&D 投入与产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 OFDI 的技术创新效应,由 O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 R&D 资本

对自主创新的效应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大于通过引进外资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陈菲琼等^[13]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 2003—2010 年我国 OFDI 的省际面板数据,以拓展的 L-P 模型为分析框架,构建吸收能力与 OFDI 的交叉项,实证检验了 OFDI 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存在地区差异。毛其淋等^[14]利用 2004—2009 年的数据,采用 PSM 方法,实证检验了 OFDI 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 OFDI 同样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且不同类型的 OFDI 对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汪洋等^[15]选取 1998—2013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 OFDI 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结果表明 OFDI 额、R&D 人员、R&D 投入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但同样存在区域差异。付永萍等^[16]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2010—2014 年 450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了 OFDI、R&D 投入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结果显示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在对公司性质按产权归属分组后,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纵观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认同技术寻求型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且通过 O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显著地促进了母国企业乃至母国整体的创新能力,但是笔者也发现,在该领域中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技术寻求型 OFDI 对不同层次创新能力的影响如何?国内企业是否通过技术寻求型 OFDI 提升了自身的创新能力?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对于当前阶段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并进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处理

为了探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and 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不同层次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本文将代表创新能力的专利授权量,划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个层次,并构建实证模型,对我国技术寻求型 OFDI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

1. 模型设定与构建

在借鉴 C-H 和 L-P 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OFDI、IFDI 对内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由衡量创新能力的专利授权量进一步划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形式,分别用 IP 、 UP 和 AP 表示,代表国内创新能力的高、中、低三个层次。通过选取 2003—2015 年中国内地 30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西藏的数据缺失过于严重,因此予以剔除)构建省际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深入探究 OFDI 逆向技术溢出对不同层次创新能力的影响。由于变量取对数并不改变模型的基本性质,并可有效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给模型估计带来的偏误,因此可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ln IP_{it} = \alpha_0 + \mu_1 \ln S_{it}^{RD} + \mu_2 \ln S_{it}^{OFDI} + \mu_3 \ln S_{it}^{IFDI} + \mu_4 \ln S_{it}^{IM}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UP_{it} = \alpha_0 + \mu_1 \ln S_{it}^{RD} + \mu_2 \ln S_{it}^{OFDI} + \mu_3 \ln S_{it}^{IFDI} + \mu_4 \ln S_{it}^{IM}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ln AP_{it} = \alpha_0 + \mu_1 \ln S_{it}^{RD} + \mu_2 \ln S_{it}^{OFDI} + \mu_3 \ln S_{it}^{IFDI} + \mu_4 \ln S_{it}^{IM}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IP_{it} 、 UP_{it} 和 AP_{it} 分别表示 i 省 t 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 S_{it}^{RD} 为 i 省 t 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S_{it}^{OFDI} 、 S_{it}^{IFDI} 和 S_{it}^{IM} 分别表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引进外资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 α_0 为常数项, u_i 为个体效应, ε_{it} 为随机

干扰项, μ_1 、 μ_2 、 μ_3 和 μ_4 为待估参数,分别表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OFDI、IFDI 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对不同层次自主创新影响的弹性系数。

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由①②③式构建的基本模型可以看出,实证分析中涉及到的变量主要包括我国内地 30 个省份历年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权量、各省份历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以及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下文分别予以介绍。

本节选取各省 2003—2015 年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代表自主创新能力高、中、低三个层次,相关数据均取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借鉴 Goldsmith 于 1951 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并运用④式进行估算。

$$S_{it}^{RD} = RD_{it}/I_{it} + (1 - \delta)S_{i(t-1)}^{RD} \quad (4)$$

其中, S_{it}^{RD} 和 $S_{i(t-1)}^{RD}$ 分别表示 i 省 t 年和 $t-1$ 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RD_{it} 表示 i 省 t 年的研发支出, δ 表示折旧率,参照国内外学者 Coe 和 Helpman、李梅、李平等人的做法,取 δ 为 5%。考虑到价格波动因素带来的影响,本文以 2003 年为基期对各省研发支出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I_{it} 表示 i 省 t 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各省历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在测算各省历年获取的国外研发溢出时分两步进行,首先计算出我国整体上从选取的样本国家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其次根据各省历年 OFDI 占我国全部 OFDI 的比重计算出本文实证分析所需数据。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全球研发水平较为先进且与我国经济往来较为密切的 15 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获取国际研发溢出的来源国,这 15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

国、瑞典、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芬兰。具体测算公式如⑤⑥⑦式所示。

$$S_t^{OFDI} = \sum_j \frac{OFDI_{jt}}{Y_{jt}} S_{jt}^{IFDI} \quad (5)$$

$$S_t^{IFDI} = \sum_j \frac{IFDI_{jt}}{Y_{jt}} S_{jt}^{RD} \quad (6)$$

$$S_t^{IM} = \sum_j \frac{IMPORT_{jt}}{Y_{jt}} S_{jt}^{RD} \quad (7)$$

其中, S_t^{OFDI} 、 S_t^{IFDI} 和 S_t^{IM} 分别表示第 t 年我国从东道国或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引进外资以及进口贸易所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 $OFDI_{jt}$ 、 $IFDI_{jt}$ 和 $IMPORT_{jt}$ 分别表示第 t 年我国对 j 国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从 j 国或地区的引进外资和进口贸易额, Y_{jt} 和 S_{jt}^{RD} 分别表示 t 年 j 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中国对各经济体的 OFDI 数据取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其余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不同经济体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取自 UNCTAD 数据库, 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数据由于无法直接获取, 本文首先根据世界银行和 OECD 数据库各国 R&D 支出占 GDP 的比重数据和各经济体的 GDP 数据, 测算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年研发支出, 然后根据上文介绍的 Goldsmith 和 Griliches 的方法求出各经济体历年的研发资本存量。

三、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OFDI 提升创新能力的实证检验

1. 模型设定检验

对面板模型的估计一般可以采取混合 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方法。根据相关检验原理, 可以采取 F 检验判断混合 OLS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劣, 采取 LM 检验判断混合 OLS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 采取 Hausman 检验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1。我们

以发明专利授权量为被解释变量的 F 检验结果显示其统计量值为 10.99, 相伴概率 p 值为 0.0000, 可以强烈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 LM 检验结果显示其统计量值为 372.38, 相伴概率 p 值为 0.0000, 可以强烈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最后可根据 Hausman 检验来判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Hausman 检验统计量值为 27.33, 相伴概率为 0.0001, 我们可以强烈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根据相同的检验原理, 对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设定检验, 结果(见表 1)显示, 同样应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表 1 面板模型设定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检验类型	统计量值	相伴概率
lnIP	F 检验	10.99	0.0000
	LM 检验	372.38	0.0000
	Hausman 检验	27.33	0.0001
lnUP	F 检验	24.94	0.0000
	LM 检验	862.67	0.0000
	Hausman 检验	37.71	0.0000
lnAP	F 检验	31.06	0.0000
	LM 检验	946.50	0.0000
	Hausman 检验	17.23	0.0017

2.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模型设定检验结果, 运用 Stata 13.0 软件对模型①②③进行固定效应(FE)回归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 对以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表征的不同层次创新能力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 0.9306、0.9078 和 0.6982, 另外 F 值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模型整体设定是较为合理的。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首先, 对以发明专利衡量的第一层次的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OFDI 和 I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

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OFDI 和 IFDI 获取的国际 R&D 资本存量每增加 1%,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增加 0.618%、0.292% 和 0.140%,并且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通过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影响的弹性系数仅为 0.019,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2 OFDI 逆向技术溢出对不同层次创新能力回归结果

变量	发明(FE)	实用新型(FE)	外观设计(FE)
$\ln S^{\text{RD}}$	0.618*** (8.82)	0.534*** (8.29)	0.017 (0.17)
$\ln S^{\text{OFDI}}$	0.292*** (3.66)	0.127*** (5.50)	0.322*** (4.20)
$\ln S^{\text{IFDI}}$	0.140*** (4.20)	0.241*** (4.58)	0.156*** (3.82)
$\ln S^{\text{IM}}$	0.019 (0.38)	-0.059 (-1.28)	0.133* (1.80)
常数项	-5.002*** (-7.88)	-2.162*** (-3.70)	2.236** (2.38)
F 值	876.83	935.21	201.68
R^2	0.9445	0.9189	0.7368
Adjusted R^2	0.9306	0.9087	0.6982
样本容量	390	390	390

注:系数下方括号内数值为 t 统计值,*、**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其次,对以实用新型专利衡量的第二层次的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OFDI 和 I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OFDI 和 IFDI 获取的国际 R&D 资本存量每增加 1%,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分别增加 0.534%、0.127% 和 0.241%,并且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通过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的影响则为负,其弹性系数为 -0.059,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最后,对以外观设计专利衡量的第三层次的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通过 OFDI、IFDI 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均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作用。具体来说,通过这三种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每增加 1%,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分别增加 0.322%、0.156% 和 0.133%,其中,通过 OFDI 和 I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了 10%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的影响为正,其弹性系数为 0.01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之,OFDI 逆向技术溢出对不同层次创新水平的影响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从总体情况来看,当前阶段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影响最大的仍是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通过 O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对发明专利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越了通过 IFDI 渠道得到的结果。但是对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程度则与之相反。而对创新能力第三层次的外观设计专利影响程度最大的则是通过 O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 R&D 资本存量,其影响效应远远超过通过 IFDI 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 R&D 资本存量,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实证检验视角分析了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OFDI 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OFDI 对不同层次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当前阶段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影响最大的仍是国内研发资本存量,而对创新能力第三层次的外观设

计专利影响程度最大的则是通过 OFDI 渠道获取的国际 R&D 资本存量,其影响效应远远超过通过 IFDI 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 R&D 资本存量。

根据本文实证检验所得结论并结合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OFDI 的发展现状,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经济格局逐渐形成的当今时代,我国应由原来的以“引进来”为主的发展模式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模式转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研发和创新网络,充分获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红利,近距离地接触高新技术的发源地,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发达国家的研发资本所带来的好处,在经过技术传导、吸收和扩散创新后,实现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为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 [1] FOSFURI A, MOTTA M. Multinationals without advantage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4):617.
- [2] IWASA T, ODAGIRI H. Overseas R&D, knowledge sourcing, and patent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R&D investment in the US[J]. *Research Policy*, 2004(5):807.
- [3] BUCKLEY P J, ZHENG P.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4):499.
- [4] GAZANIOL A, PELTRAULT F. Outward FDI, performance and group affili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matched firms [J]. *Economics Bulletin*, 2013(2):891.
- [5] MASSO J, ROOLAHT T, VARBLANE U.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in Estonia [J]. *Balt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2):231.
- [6] 赵伟,古广东,何元庆. 外向 FDI 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 *管理世界*, 2006(7):53.
- [7] 陈菲琼,虞旭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的反馈机制研究:以万向集团 OFDI 为例[J]. *财贸经济*, 2009(3):101.
- [8] 汪斌,李伟庆,周明海. OFDI 与中国自主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0(6):926.
- [9] 胡宗彪,王剑伟,刘军. 外向 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J]. *企业经济*, 2011(11):128.
- [10] 王恕立,李龙. 外向 FDI 影响中国自主创新的机制及实证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7):67.
- [11] 沙文兵.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3):69.
- [12] 吴建军,仇怡.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分析视角[J]. *当代经济科学*, 2013(1):75.
- [13] 陈菲琼,钟芳芳,陈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4):170.
- [14] 毛其淋,许家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J]. *世界经济*, 2014(8):98.
- [15] 汪洋,严军,马春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10):122.
- [16] 付永萍,芮明杰,马永. 研发投入、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6):28.



引用格式:廖显浪. 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分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88-93.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1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2-0088-06

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廖显浪

LIAO Xianlang

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党校, 广东 深圳 518172

摘要:产业结构是工业革命有形的外在结构,技术结构是工业革命无形的内在结构。通过对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分析,发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包含了以生物技术、纳米材料、新能源和3D打印等新材料产业与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电子商务组成的外围结构,以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现代物流等新的通信、能源、交通产业组成的基础结构,以及以智能制造、添加制造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为技术特质的加工制造业组成的核心结构。从经济系统的角度来看,可以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解为:以新材料、数字制造、智能制造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创新与融合为技术特征,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产业特征的智能、绿色、可持续的新工业革命。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系统运行所需的各个产业子结构已初具雏形,各项技术创新也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成熟的产业体系尚未形成。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方面,我们既要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又要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新工业革命重大关键领域技术创新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引领,加强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等技术设施建设,以形成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关键词:

第三次工业革命;
产业结构;
技术结构

收稿日期:2018-04-08

作者简介:廖显浪(1983—),男,湖北省孝感市人,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近年来,互联网、新能源、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以及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实践和新闻媒体的积极传播,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影响与应对策略等。从学理上来看,对于工业革命的界定标准本身应具有自洽性,方能将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近代史划分出若干个相互联系又彼此互有区别的发展阶段,即若干次工业革命^[1]。当前学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界定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新能源版本”的划分,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结合^[2];二是麦基里“制造业版本”的划分,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制造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3];三是认为由以上两方面或多个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中以基于演化经济学和长波理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那么,该如何认识以上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理解呢?该从怎样的视角来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呢?笔者认为,以上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均有较大的合理性,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存在认识偏差,容易引起认识上的混淆。杰里米·里夫金注重从产业经济系统的视角展开研究,充分论证了通讯技术和能源在产业经济系统中的作用,进而提出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麦基里则从技术经济的视角展开研究,强调制造业技术革新或技术经济范式转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演化经济学则从工业革命历史和现实演进的视角,强调多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演进共同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对于前面两类研究,第三种研究视角更具全面性,强调工业革命是由不同部门多种技术革命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结果。但其对工业革命本质的认识还

是建立在技术革新视角基础之上的。

从目前已完成的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一系列重大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基础上形成新的工业化经济系统的过程,工业革命是工业化经济系统形成的动态过程,工业化经济系统是工业革命发展的静态结果,对动态过程的研究可以观察工业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对静态结果的研究则有利于观察工业革命的构成和内涵。M. Paul^[3]、贾根良^[4]、杨虎涛^[5]等从技术革新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可以看作对工业革命动态过程的分析,里夫金^[2]从产业系统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可以看作对工业革命动态过程的分析。从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历次工业革命都包含着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重大变革。在一个工业化经济大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新的技术结构会催生新的产业结构,新产业结构的发展也会促进新的技术变革。对工业革命仅从技术的角度分析,无法看清其整体和现实形态;仅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无法看清其内容和本质形态。区分工业化经济大系统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有利于我们理清工业革命所包含的全部图景。而要完全理清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图景,既要关注其技术革新的重大突破,也要关注其产业系统运行的经济现实性;既要考虑其产业经济系统内各部门产业结构关系,也要分析其各部门技术经济范式变化。鉴于此,本文拟从产业经济系统的视角出发,将工业革命看作产业系统的革命^[6],从工业化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系统视角揭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

一、工业化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

历次工业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创造了巨

大的生产力,更在于其改变了人类生产的组织形式,形成了高度系统化的分工、协作的工业化经济大系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化生产技术的出现,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分工协作、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大生产经济运行体系。同样,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的大规模生产技术进一步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全球化工业大生产系统。从产业经济系统的视角出发,分析历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有利于我们观察工业革命的全景,也更有利于我们洞察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 工业化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就是产业系统的组织方式。工业化经济系统可以看作一个“自然资源→开采→加工→流通→消费”^[7]的循环运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系统运行的角度来看,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加工环节,它能够达成系统运行的核心目标——生产最终消费品。而为了保证该核心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资源开采、商业流通等环节发挥外围性的功能,为加工环节提供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并将最终消费品流转至消费环节。另外,为保证整个工业化经济系统的运行,还需要为系统提供服务性活动的其他产业,如交通、能源、通讯等。这些部门既不输入产品也不输出产品,只提供服务性活动。至此,根据不同部门在运行中的功能,可以将工业化经济系统划分为“核心结构、外围结构和基础结构”^[7]三个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互为条件,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核心结构是达成系统运行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核心目标,同时也是构成基础结构和外围结构运行的条件。外围结构的原材料工业、商业等决定了核心结构的劳动对象,并保证核心结构产品最终经济价值的实现。基础结构则从属于工业化经济系统,其结构和功能明显有别于其他部门,只提供某种服务。但决不能

因此忽视其作用,它是整个系统运转的重要保证,其作用就在于它构成了核心环节和外围环节运转的基础环境,决定了生产、流通经济的活动范围和发展潜力。例如,直到石油动力、公路运输、电信通讯等基础结构体系逐渐完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将全球化工业大规模生产体系推向顶峰。

总之,工业化经济系统产业结构中的三个部分的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一个相互协调、连续运转的经济大系统:核心结构和外围结构是共同完成取得最终成果而进行的基本生产过程,而基础结构则为这一基本生产过程提供辅助性服务,三者共同形成动态的功能耦合,推动工业化大生产系统的不断发展壮大。

2. 工业化系统中的技术结构

把工业化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划分为核心结构、外围结构和基础结构,是从产业运行功能的角度进行划分的。这种抽象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把握一个工业化经济系统的全部产业构成及其之间的关系,但也抽象掉了不同工业化经济系统间产业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有学者认为在工业发展史上,工业革命只有1760年从英国发端的那一次^[8-9]。那么,该如何区分历次工业革命呢?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工业革命的技术结构。从经济系统运行功能角度划分的产业结构,只是经济系统的现实形态和外在此结构。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系统,就会发现不同经济系统中同一子系统的形态差异,而这种差异取决于经济系统所使用的一系列技术体系,即技术结构。技术结构是一个经济系统内不同门类或不同先进程度的技术的一种结合。相对于产业结构是经济系统的有形的外在此结构,技术结构是经济系统的无形的内在结构,它反映的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一种具有转换关系和平衡关系的中介系统。具体到每一次工业革

命的经济大系统,技术结构体现的是其本质属性,是区分一种经济系统与另一种经济系统的重要标识,决定了该系统产业结构的现实形态。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例,按照惯用的称呼,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被分别叫做“蒸汽机革命”和“电气革命”,就是一种基于技术结构的区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各种工作机等造就了不同于之前社会的机械化、工厂制的产业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生产、内燃机、电气化等技术则进一步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石化、电气等重工业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形成了技术结构更加丰富的产业,造就了全球化大规模生产的产业体系。正是两次工业革命中不断出现的新技术造就了与其之前完全不同的经济大系统,体现了新旧经济系统和产业结构的本质差异。

二、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每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次工业化经济大系统技术结构的重大变革与产业结构的重新整合。同样,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说,从经济系统运行的角度划分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并厘清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逻辑

联系,有助于澄清当前人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解上的混乱。下面我们就通过对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分析(见表1),来考察第三次工业革命包含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形成了以不同技术结构为特质,由核心结构、外围结构、基础结构所组成的经济大系统。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以半机械化、机械化加工制造业为核心的结构,以煤炭开采、钢铁材料、全球化贸易为主的外围结构和以邮电纸质传媒通信、煤炭蒸汽动力、铁路运输为主的基础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了包括以自动化加工制造、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为代表的大规模制造加工技术,以电气、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动力技术,以化工、钢铁、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多元材料技术,以内燃机为基础的交通运输技术的技术结构体系,并形成了以自动化加工制造、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为特质的核心结构,以石油矿产开采、更加先进的钢铁化工合成材料生产、更加紧密的全球化生产贸易为辅助的外围结构,以及以电信技术通信、电气石油能源、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等为支撑的基础结构。

参照对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的划分,结合当前新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

表1 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

名称	核心结构 (生产、制造加工业)	外围结构 (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商业)	基础结构 (交通、能源动力、邮电通信)
第一次工业革命	半机械化、机械化加工制造 工厂制社会化大生产	煤炭开采 钢铁材料 全球化贸易	邮电纸质传媒通信 煤炭蒸汽动力 铁路运输
第二次工业革命	自动化加工制造 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	石油矿产开采 钢铁、化工、合成材料 全球化生产贸易	电信技术通信 电气石油能源 海陆空立体化交通
第三次工业革命	智能制造 添加制造技术(3D打印)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生物技术材料 纳米材料 新能源、3D打印等新材料 电子商务	互联网 可再生能源 现代物流

革,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包含里夫金所说的“通信与新能源革命”和 M. Paul 所说的“制造业数字化革命”,还应该包括杨虎涛所强调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3D 打印等新材料产业,以及电子商务新商业模式等。从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来看,以上学者的研究都只讨论了其中的一个方面。里夫金的“通信与新能源革命”讨论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结构的内容,他将通讯技术比作中枢神经系统,将能源比作血液,实质上讨论的就是通讯、能源等对经济系统的基础作用。M. Paul 的“制造业数字化革命”讨论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结构的内容,其对工业革命的划分实际上关注的是工业化经济系统中核心产业的技术结构变革。杨虎涛的研究强调新材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投入和动力部门,关注的是外围结构的部分内容。显然,从系统运行的角度来看,核心结构、外围结构、基础结构缺一不可,从其中任何一个部门出发的研究都能找出该部门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或核心的依据,但从其中任何一个部门出发的单独研究又都是不完全的。如表 1 所示,以生物技术、纳米材料、新能源和 3D 打印等新材料产业与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电子商务组成新的外围结构,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现代物流等新的通信、能源、交通产业组成了新的基础结构,而以智能制造、添加制造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为技术特质的加工制造业组成了新的核心结构。以上各方面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构成了新一次工业化经济系统变革所需的全部要素,即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部特征。而通过大量科技信息和研究论文可知,第三次工业革命新产业系统所需的技术变革正逐渐取得突破,新的产业结构体系也初具雏形,处于萌芽状态,随着新技术的成熟和新产业的发展,最终将形成区别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新的工业化经济系统。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基于经济系统视角的理解

上文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从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划分上讲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看作一种局部分析或结构分析。但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还应该上升到系统的视角,结合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现实形态和技术结构的内在属性,分析其发展的动力和内涵。也就是说,只有从经济系统整体的视角上去分析,才能完整把握工业革命的内涵。从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一次工业革命是新的经济系统对前一次经济系统的替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并最终会形成替代的新经济系统。

首先,消费升级奠定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经济动力,推动了其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标准化、自动化、规模化工业生产模式,以及全球化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而人们的消费需求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提升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方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是推动新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经济动力。

其次,发展理念的转变决定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变革的方向,推动了其技术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给人类的持续生存带来了危机。“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人类自觉改造自然的又一重大共识,决定了其技术变革的方向。智能制造、3D 打印等制造加工技术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则为彻底解决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可能。

最后,技术创新的突破奠定了第三次工业

革命变革的基础,推动了其产业变革。技术创新永远是工业革命发展的动力。目前,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成熟,正为新的生产模式和新兴产业提供基础服务。快速成型、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一批重大技术突破正推动着原材料、加工制造等产业的深刻变革。太阳能、风能等技术的应用已在全球展开,虽然目前新能源在最终成本上并不优于石油化工能源,但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新能源替代石油化工能源指日可待。

总之,第二次工业革命面临的问题和新的技术进步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动力,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替代和新的补充。结合前文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分析,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理解为:以新材料、数字制造、智能制造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创新与融合为技术特征,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产业特征的智能、绿色、可持续的新工业革命。这一过程将推动一系列新兴产业的产生,还将导致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制造模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形成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

四、结语

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包含了以生物技术、纳米材料、新能源和3D打印等新材料产业与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电子商务组成的新外围结构,以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现代物流等新的通信、能源、交通产业组成的新基础结构,以及以智能制造、添加制造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为技术特质的加工制造业组成的新核心结构。从系统替代的视角来看,个性化消费需求升级、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技术创新的突破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动力,最终会形成替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以新材

料、互联网技术、数字制造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重大创新与融合为技术突破,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其产业发展方向的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系统运行所需的各个产业子系统已初具雏形,各项技术创新也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成熟的产业体系尚未形成。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方面,我们既要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又要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新工业革命重大关键领域技术创新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引领,加强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等技术设施建设,以形成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吕铁,邓洲.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10):7.
- [2]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中信出版社,2012:15.
- [3] PAUL M.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J]. The Economist,2012(4):3.
- [4] 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自世界经济史的长期透视[J].学习与探索,2014(9):97.
- [5] 李雪.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有何不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杨虎涛教授访谈录[J].经济师,2014(3):6.
- [6] 田露露,韩超.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演进、趋势研判与中国应对[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7):89.
- [7] 米加宁.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关系——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9):58.
- [8] 许永璋.关于工业革命起止时间之我见[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22.
- [9] 周友光.“第二次工业革命”浅论[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5):103.



引用格式:马晓燕.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2):94-99.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94-06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探析

Analysis on old-age soldiers' policy of sympathy in the Song Dynasty

马晓燕

MA Xiaoyan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宋代兵农分离,老年军人往往承受着严峻的生存压力,为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宋政府尤为重视优恤老年军人。退居剩员、降充小分、补授添差不厘务官、归农、放停是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常用方式。退居剩员、降充小分、补授添差不厘务官的老年军人可继续享受一定的俸禄。归农可使征召而来的老年军人摆脱兵役的束缚,放停则可免除老年配军的劳役和老年逃军的刑事处罚,这对老年军人的生活均具有积极影响。不过,上述优恤政策在普及范围、年龄划分、实施效果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能够享受俸禄的老年军人的人数非常有限,多数人仍需要自谋生路。事实上,无论实行何种军事制度,都无法回避军人的养老问题。宋代重视老弱军人安置问题的意识与观念,对于当下军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仍有启示价值。宋代老年军人优恤政策的弊病、不足,对完善当下军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有镜鉴作用。在构建军人养老保障制度时,既要着眼于军人的特殊性,又要高瞻远瞩,建立有效的防弊机制,防止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惠而不实。此外,还应建立合理、畅通的财政体制,保障财政收支平衡,这是军人养老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宋代;
老年军人优恤;
养老保障制度

收稿日期:2018-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044)

作者简介:马晓燕(1978—),女,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两宋时期,不论是禁兵、厢兵还是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招募而来的士兵,在年轻力壮之时为国效力,但在年老体衰之时承受着严峻的生存压力。因此,老年军人与伤残军人一样,也是宋政府优恤的重要对象。目前,学者多在论述军队拣选制度的过程中论及剩员制度^[1],未从老年军人的角度探讨政府的优恤措施。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到宋代军人的保障制度,但其考察的重点在伤残军人、裁汰军人与出征军人家属方面^[2],较少专题论述宋政府对老年军人的优恤政策。鉴于此,本文拟重点论述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原因与优恤的主要方式,并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分析与评价,以供学界参考。

一、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原因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是募兵制的产物。唐中叶之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是基本的军事制度。唐中叶之后,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府兵制也逐步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随着募兵制的确立,兵农合一的局面被打破,“兵与民始为二”^{[3]4620}。在兵民合一的情况下,战则为兵,不战则为民。若老弱无力征战,可退居为民。但在兵民分离的情况下,招募而来的军人加入军籍后,“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衰老而无归”^{[3]4563},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需要政府救助。因此,募兵制的全面推行与实施,是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

稳定社会秩序,实现有序的政治统治,是宋代推行优恤老年军人政策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土地兼并现象的盛行,失地农民愈来愈多。丧失土地的百姓,“小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大则聚为盗贼”^{[4]5447},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为稳固统治根基,维护社会秩序,宋代

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流民、饥民为军人。宋朝募民为兵的次数之多、人数之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5],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流民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即老年军人的安置问题。老年军人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不仅不利于老年军人的晚年生活,而且也容易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宋政府在推行养兵政策的同时,也积极探索优恤老年军人的措施,以避免军人在年老之时流离失所。

二、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主要方式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的措施与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 退居剩员

退居剩员,即将不宜出征作战的军人另行安置,让其从事杂役工作。两宋时期,无论是禁军、厢军还是土军,凡年老体弱者均可退居剩员。剩员无需承担征戍的任务,但依然可保留军籍,享受一定的俸禄。退居剩员是政府优恤老年军人较为常用的措施。早在宋太祖时期,政府就创设剩员制度来安置年老体弱之军人。建隆二年(961年)五月,宋太祖诏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其中“老弱怯懦者”^{[4]45}退居剩员。自此以后,退居剩员成为宋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重要方式。嘉祐年间,宋仁宗敕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巡历时,与当地行政长官拣选“本处本城牢城节级、兵士”,其中“老病久远,不堪征役者即减充剩员”^{[6]7935}。熙宁二年(1069年),枢密院命令诸州拣选“本城牢城节级、兵士”,其中“稍堪征役”的老病之人可“减充剩员”^{[6]7935}。南宋时期,退居剩员仍是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重要方式。绍熙四年(1193年),宋光宗诏令“诸路提刑司每遇巡历,就同守臣将拣中、不拣中禁兵并厢兵通选一次”,其中“年老禁兵愿充剩员者”^[7],同样以剩

员的方式安置老年禁军。

宋代老年军人退居剩员有一定的年龄要求。不同等级的老年军人,退居剩员的年龄标准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普通军人在60岁时即可被退居为剩员,而将校、军吏降充剩员的年龄标准则是65岁。嘉祐八年(1063年),右正言王陶建议在调发禁军之前进行拣选,其中普通士兵“年六十以上、将校年六十五以上衰老者”^[8]直接降充剩员。元丰年间(1078—1085年),将校减充剩员的年龄标准有所降低。宋神宗规定60岁以上的将校和军人,只要“稍堪部辖”或“稍堪征役”即可“减充剩员”^{[6]7935},将校和普通军人减充剩员的年龄标准相同,均为60岁。宋哲宗即位后,禁军军吏退充剩员的年龄标准由60岁升至65岁。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宋哲宗应枢密院之请,下诏规定禁军军吏“六十五岁并减充剩员”^{[4]10300}。由此以来,都一级副长官以下的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只要武艺不退,降充剩员的年龄就比原来延迟了5年。南宋时期,军吏拣退剩员的年龄仍晚于普通军人。淳熙年间,宋孝宗规定禁军军吏“年六十五者”、军兵“年六十”者均要“减充剩员”^{[6]7935}。

立有战功的老年军人,退居剩员的年龄标准可延长至70岁。按照宋制规定,禁军、厢军中自十将到押官“七十放停”,长行“六十五放停”。一旦达到放停年龄,将被削除军籍,不再享受俸禄。但如果他们“尝有战功”,即可“充看营不管事剩员”,不受年龄限制,依然可退居为剩员,终身享受“其衣粮等各得元来之半”^{[6]7935}的待遇。

2. 降充小分

降充小分,指对于那些不能征战的老年军人,宋政府让其从事军中杂役,领取一半俸禄。降充小分是宋代政府安置老年军人的另一措施。皇祐元年(1049年)十二月,宋仁宗下诏

“将山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如果这些老兵“无田园可归”,可“减为小分”^{[4]4023}。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奏请依照拣汰禁军的旧法,“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9],以安置在京被淘汰的禁军,反对将他们迁徙至淮南。由此可知,在宋神宗以前,降充小分已是政府安置年老禁军的惯用措施。熙宁年间,宋神宗依然将其作为安置老年军人的主要方式。据《玉海》记载,宋神宗在《熙宁颁河北校阅法》中规定,“老疾羸弱,即降充小分”^[10]。

降充小分不仅设立在禁军中,而且也存在于厢兵中。宋宁宗嘉定年间,镇江府厢兵崇节第十三指挥,“见管大、小分一百七十人”,其中“全粮一百六十五人,半粮五人”,第十四指挥“见管大、小分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全粮一百四十四人,半粮一人”^[11]。所谓的“半粮”即指小分,仅支一半俸禄^{[1]312}。由此可见,南宋时期,降充小分是政府优恤老年军人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3. 补授添差不厘务官

补授添差不厘务官,即让老年军人担任无实际职权的闲职,这是南宋时期政府优恤老年军人的又一项措施,其主要针对年老病残的立功将士和被三衙淘汰的老年军人。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政府已开始实行离军之人补授添差官的政策。该年四月,宋高宗诏令“诸军拣退不堪披带使臣,并许添差捕盗官司使臣一次,老病不堪任职者送忠锐将,支进勇副尉俸,终其身”^{[12]1701},允许被淘汰的老年军人改任空缺的闲职。

宋孝宗即位后,继续奉行补授添差不厘务官的优恤政策,并扩大了优恤范围、变通了优恤程序。乾道七年(1171年)六月,兵部侍郎周必大奏请特降指挥,允许“拣汰下班祇应年七十以上人,依大小使臣及副尉见行条法放行,注授合入添差差遣”^{[13]8930},宋孝宗批准此建议。这

样,70 岁以上的下班祇应也被纳入补授添差官的范围。乾道九年(1173 年)四月,宋孝宗下诏规定,离军武臣如果“年六十以上,精力已衰,有战功”,可依旧例,“与差宫观,余差岳庙”^{[13]4492},立有战功的老年离军使臣可担任宫观、岳庙等闲职。淳熙三年(1176 年),宋孝宗针对老疾军员“无力赴部注授”的情况特降指挥,允许“曾经战阵立功,年七十以上”的拣汰大小使臣、校副尉、下班祇应在承旨司审验属实后直接“依守阙进义副尉请给则例减半,均拨州军养老,以终其身”^{[13]3403}。

4. 归农与放停

归农,即解除军籍,回乡务农,不再承担征战任务。对于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的老年军人,宋政府多听任其归农。北宋前期,为了抵御西夏的进攻,宋政府在河北实行征兵制,“自户籍选置”军人,“其老疾者召人承补,然后归农”。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十月,宋真宗废除“召人承补”的陈规,诏令“自今不得更然”^{[4]1736},老疾军人可直接归农。次年,宋真宗再次下诏,规定“河北河东忠烈、宣勇、广锐军人,自今老病者即放归农,无勒召人承替”^{[4]1776},重申给予河东、河北老年军人自由归农的权利。天禧元年(1017 年)十月,宋真宗因“河北、河东忠烈、宣永军老疾半俸者,多召人承替,贫者苦之”,下诏规定“自今老疾者并即放停”^{[4]2082-2983},任其归农。宋仁宗时期,政府也多次遣返老年军人归农。天圣五年(1027 年)十月,宋仁宗诏令“河北忠烈、宣勇等指挥,年六十以上者,听自便”^{[4]2451}。皇祐元年(1049 年)十二月,宋仁宗诏令“山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4]4023}。

对于老疾配军或逃军,宋政府多实行放停*政策,即允许其停止服刑,免除其刑事处罚与军法惩罚。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宋真宗向广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江南、京西等七路诸州、府、军、监各派遣一名使臣,命令他们与转运使、副、知州、通判、钤辖、都监、监押一并拣选当地“见管杂犯配隶军人”,其中“年老病患,委实久远,不任医治充役者,放令逐便”^{[8]4642},免除刑事处罚。两宋时期,普通军人不堪盘剥、压榨,往往不顾军法,铤而走险。南宋后期,由于军政的腐败,军人逃亡的现象更加突出。宝祐五年(1257 年)十月,枢密院建议对老疾逃军给予优待,“今后有捕获及自首者”,“如老疾即与放停”^[14],直接释放,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的利弊

宋代优恤老年军人政策,体现了政府对老年军人养老问题的关注,对军人的晚年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按照规定,凡退居剩员或降充小分的老年军人,均可领取原有俸禄的一半。例如,宋光宗时期,老弱禁军退居剩员后,其俸禄为“月白米一石二斗,春冬衣各绢二疋,折布钱八百五十文”^[7],这足以满足其晚年生活的需要。虽然厢兵的待遇不如禁军优厚,但老弱厢军在退居剩员或降充小分后仍拥有一定数量的俸禄,不至于流离失所。而补授添差不厘务官的政策,使那些年老病残的立功将士、被三衙拣汰的老年军员、注授宫观、岳庙,享有一定数量的俸禄,其晚年生活拥有了较为稳定的经济保障。归农、放停的老年军人虽不能享受稳定的俸禄,但可免除兵役和刑罚,返回乡里与亲人团聚,这对其晚年生活来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 对于招募而来的士兵来说,归农、放停意味着不再享受军俸,这并不是政府抚恤老年军人的政策。但是,对于被征调而来的老年军人来说,归农意味着免除兵役;对于因犯罪而编入军队的老年配军与老年逃军来说,放停则意味着免除刑事处罚与军法惩罚,具有明显的抚恤色彩。文中所说的归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征调而来的老年军人,而放停则是针对老年配军或老年逃军而言的。

为抵御西夏的侵扰,宋代招募士兵,组成乡兵。乡兵名为招募,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应募,多数是征籍而来,成为当地民众沉重的负担。对于乡兵而言,返乡务农、脱离兵籍即是一种优待。例如,皇祐元年(1049年),宋廷在庞籍和文彦博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的裁兵,山西地区的乡兵——保捷兵中年50岁以上“不任役”的老兵也在裁减之列,被裁减后他们“欢呼反其家”^{[4]4023},足见其被允许返乡后的喜悦与兴奋。

退居剩员、降充小分、归农与放停等政策对老年军人的生活有积极影响,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也存在突出的弊端。

首先,无论是退居剩员还是降充小分,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游彪认为,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的剩员大多是由国家一直供养至老死,但宋真宗、宋仁宗时期,剩员放停已经很常见^[15]。对于一般士兵而言,70岁是放停的年龄界限。一旦达到放停的年龄,除立有战功的老年军人、域外少数民族无家可归的老兵外,其他剩员或小分均被削除军籍,无法享受俸禄。70岁才被放停的军人,其“乡园改易,骨肉沦谢”^{[4]2625},无所依靠,不免流离失所。

其次,宋政府对剩员的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宋政府自真宗、宋仁宗时期就已有限制剩员数量的呼声。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宋真宗就诏令据“见管人数额定充看营剩员”,既然有名额限制,“必不敢多拣充剩员”^{[8]4640},但此时政府并未明确各军营拣选剩员的具体比例。宋神宗即位后,对剩员制度进行了调整。熙宁十年(1077年),宋神宗正式颁布剩员定额制,诏令“诸路州军,以逐州就粮禁军、厢军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剩员立额自此始”^{[3]4550}。这虽然有效控制了剩员数量的泛滥,但也使多数老兵的晚年生活面临着重重困难。按照规定,只有10%的老兵能够被退居剩员,继续享受俸禄,而其余的老弱军人则直

接被削除兵籍自谋生路。例如,京师修内司兵士阚喜,“以年老解军籍”,“老而无子”^[16],因此以贩卖水果为生。谋生能力不足的老兵,则被迫以行乞为生。兴国居民熊二的母亲早逝,父亲脱离兵籍后无力营生,熊二就把父亲“视同路人”,“致使乞食”^{[13]732-733}。南宋绍兴年间,左武大夫伏深对老年军人被拣放后无所依靠的情况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奏言中直言“诸州军尽将年老或残疾之人并行拣放,无所仰食,往往至于乞丐”^{[12]3313}。直至宋宁宗时期,被裁汰的老年军人沦为乞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才引起了宋廷的关注。嘉泰三年(1203年)十一月,朝廷在南郊赦文中明确规定拣汰离军后“残笃废疾不能自存、在外乞丐之人”,由“本军随营分措置”^{[13]7432}。其后的郊祀礼、明堂礼赦文不断重申此规定,可见,被裁汰后,老年军人晚年生活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再次,由于吏治的腐败,不少年少体壮之人占据了剩员的名额,违背了政府优待老年军人的初衷。宋神宗时期的燕达,对于少壮之人占据剩员的状况有所关注。元丰四年(1081年),他向宋神宗反映,“神卫剩员中甚有年三十五以下少壮之人”,请求从中遴选“一千人分擘与将下,充樵汲诸般差使”^{[4]7609}。仅开封府一地禁军剩员中,35岁以下的少壮之人就高达1000人。如果将全国各地各种剩员累加起来,少壮之人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在剩员名额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大量少壮之人退为剩员,就意味着更多的老年军人将面临放停的命运,失去俸禄的他们,晚年生活之凄凉可想而知。

四、余论

宋朝建立之初,灾荒之年招募灾民、流民、饥民充任军人便形成一项基本政策,这在解决兵源问题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灾荒对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威胁。虽然招募政策具有一箭双雕

的效果,但也造成了冗兵、冗费的问题。应对此问题的最为直接的措施,即为裁军。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道:“夫兵之冗不难于汰,而难于处。籍其力于强壮之时,而欲去其籍于老弱之后,何以慰其心哉?”^[17]由此可见,宋人已清醒地认识到裁汰老兵的安置是一重大问题,其对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均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无论实行何种军事制度,都无法回避军人的养老问题。宋代重视老弱军人安置问题的意识与观念,创建不同优恤方式的举措,对于当下军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仍有借鉴价值。

同时,宋代老年军人优恤政策的弊病、不足,对完善当下军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有镜鉴作用。宋代老年军人沦为乞丐的现象之所以普遍,一方面源于剩员名额的有限,以及少壮之人对名额的侵占,另一方面也源于地方财政的匮乏。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大量的拣汰军官被以“养老使臣”的名义安置在地方州县。按照规定,其俸禄由地方政府负责。但在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在任官员和军人的俸禄尚无法完全保证,拣汰军人的俸禄就更是没有着落。因此,在构建军人养老保障制度时,既要着眼于军人的特殊性,又要高瞻远瞩,建立有效的防弊机制,防止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惠而不实。此外,还应建立合理、畅通的财政体制,保障财政收支平衡,这是军人养老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曾瑜. 宋朝军制初探[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310-318.

- [2] 郭文佳. 宋代社会保障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06-119.
- [3]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 游彪. 论宋代军队的剩员[J]. 中国史研究,1989(2):135.
- [6] 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7] 黄澔,齐硕. 嘉定赤城志[M]. 陈耆卿,纂. 北京:中华书局,1989:7421.
- [8]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835.
- [9] 杨士奇,黄淮. 历代名臣奏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899.
- [10] 王应麟. 玉海[M]. 扬州:广陵书社,2003:2680.
- [11] 史弥坚. 嘉定镇江志[M]. 卢宪,纂. 北京:中华书局,1989:2392.
- [12]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胡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3] 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14] 佚名. 宋史全文[M]. 汪圣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6:2863.
- [15] 游彪. 北宋军队拣选制度研究[C]//暨南史学:第7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81-482.
- [16] 洪迈. 夷坚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6:276.
- [17] 吕中. 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75.



引用格式:张芳芳. 北宋书画鉴定考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100 - 108.

中图分类号: K244; J2 - 2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1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2-0100-09

北宋书画鉴定考述

Study on identif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张芳芳

ZHANF Fangfang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关键词:

北宋;
书画鉴定;
商品性;
书画作伪;
气韵;
裱材;
史证

摘要:北宋书画市场繁荣,民间画工众多,文人也卷入了书画市场化的浪潮之中,书画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以牟利为目的的书画作伪现象也普遍出现,使书画消费者和创作者深受其害,书画鉴定群体和系统的鉴定方法由此应运而生。北宋的书画鉴定群体主要来源于书画家、书画史家、收藏家。北宋时期,由于缺乏专业的书画鉴定机构,也没有形成书画作伪的相关惩治政策,书画鉴定更多的是依赖于鉴定人个人的专业修养。北宋书画鉴定的方法主要有观气韵、察款印、辨裱材、重史证等,基本涵盖了传统书画鉴定的传统理论和技艺。

收稿日期: 2018 - 02 - 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SZ013)

作者简介: 张芳芳(1984—),女,河南省汝州市人,河南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北宋是我国书画市场全面繁荣的时期,不仅文人士大夫将书画作品视作陶情冶性的雅致消遣,而且日益壮大的市民群体也参与到书画消费的大军之中,为书画市场注入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1]但与此同时,以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伪现象也充斥着整个书画市场,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书画作伪高潮。^[2]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书画鉴定显得尤为重要。近代学界的讨论对北宋时期的书画鉴藏多有涉猎,但考察的重点往往在藏而不在鉴,多重视对书画收藏及其群体的研究,而在书画鉴定群体、鉴定理论与方法的演进等方面的探讨,尚有可拓展的空间。鉴于此,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北宋的书画鉴定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以供参考。

一、北宋书画商品属性的凸显与作伪的盛行

北宋时期文治昌盛,经济繁荣,上至皇室朕恭,下至寻常百姓,都对书画艺术消费空前热衷,书画作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

一方面,民间画工以写书卖画为生的情况相当普遍。例如,北宋画家燕文贵“吴兴人,隶军中,善画山水及人物。……货于天门之道”^[3]¹⁶;宣州人包氏“以画虎名家,而鼎最为妙,今子孙犹以画虎为业,而曾不得其仿佛也”^[4]。画工也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把握商机:“司马公薨……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四方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5]这些民间画工凭借其书画技艺而立身,“售己所长,专以为养”^[6],极大地促进了北宋书画的商品化趋势。

另一方面,文人书画在市场中愈加受到重视。士大夫作书绘画虽多为怡情之举,并不以出售为目的,然其书画作品一旦出手,便成为时人趋之若鹜的珍品佳作而能售得高价。例如,苏轼的书法在当时知名度很高,“人争以金钱

购其墨帖,每一帖值百金”^[7]²⁹⁹,所画的扇面也卖到了一扇一贯钱;黄庭坚的“草书尤奇伟……人争购之,一纸千金”^[7]³⁰⁰;蔡襄的作品则在北宋末期卖到了“二百千”的高价^[8]⁶⁷⁵。文人成为宋代书画市场上的一支极具活力与市场潜力的创作群体。与此同时,前代书画家的遗作更是备受追捧,五代名家荆浩的一卷山水画,被“宋内侍乐正宣用钱十万购之,后为黄伯鸾所见,加三十万得之,犹以为幸”^[9]³²。南唐著名画家徐熙的一幅《牡丹图》,在崇宁年间售卖,“求钱二十万”^[10]⁶⁸⁵。王献之的《送梨帖》更是在短时间内价格翻了二十倍:“刘季孙以一千置得。……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11]¹¹⁹现存史料记载,北宋时期书价最高者为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价值800贯,“大豪郭氏分,内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众乃许”^[11]¹²³。画价最高者为阎立本的《太宗步辇图》,价值“七百千”(即700贯)^[12]²⁸⁴。据统计,宋代普通居民每人每天的平均花销约在100文左右^[13],由此观之,这两幅书画堪称价值连城了。

书画市场的蓬勃发展,名家书画的不菲价格,激发了宋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整体画技的提升,但同时也导致了书画作伪行为的大量出现,这使得北宋时期的书画作伪现象远超前诸代。书画作伪现象,至迟从魏晋时期即已开始:“(王)羲之尝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笑之。羲之初不觉,更祥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14]³⁷张翼虽然作伪,但从“题后笑之”等语看来,这只是文人雅戏而已,并没有逐利目的。唐代作伪逐利的现象也不甚明显,如在唐代著名的两张书画作伪案件中,武则天的两个宠臣张易之、张宗昌借奉召修护内库书画藏品之机,大肆作伪,替换真迹:“长安初,张易之奉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换进,以假当真,还归内

府,真迹留已。”^[15]五代后梁时,藏家刘彦齐也使用类似的手法偷梁换柱:“本借贵人家图画,臧赂掌画人私出之,手自传模,其间用旧裱轴装治,还伪而留真者有之矣。”^[16]^[216]纵观宋代之前的书画作伪,可以发现,一是作伪者仍限于个别人,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作伪行为尚没有出现;二是作伪者的逐利色彩并不明显,更多的是出于对书画艺术的挚爱而导致的不当侵占行为,与后世因牟利而作伪有着根本区别。

北宋时期的情况大为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书画作伪现象已经超越了此前“点”状的作伪者和作伪行为,而向整个社会“面”的范围大规模蔓延,成为一种笼罩全社会的不良文化风气。当时著名书画鉴定名家米芾曾审定时传的签署“吴道子”的作品三百幅,竟然无一真品,可见此种行为之猖獗:“今人得佛,则命为吴,未见真者。”^[12]^[267]最为典型者,莫过于米芾“无李论”的提出。李成是五代北宋初期的山水大家,颇为时人推崇,每见一画,必倾囊而收。然随之而来的是假画的盛行。对李成的假画流传之广泛,米芾曾感慨道:“真见两本,伪见三百本”,反差之大,令人咋舌。米芾甚至抛出了“无李论”的惊世骇俗之言^[12]^[268]。

今世贵侯所收(李成)大图,犹如颜、柳书药牌,形貌似尔,无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张,松干枯瘦多节,小木如柴,无生意。成身为光禄丞,第进士;子祐为谏议大夫;孙宥为待制,赠成金紫光禄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为“无李论”。

鉴于李成伪作的泛滥,慈圣光献曹太后专请李成之孙女入宫,鉴定内府所藏李成画作,159幅之中竟只得4幅真迹。^[12]^[271]另据蔡绦《铁

围山丛谈》记载,宣和年间内府藏“二王法书三千八百余幅”^[17]^[78],而《宣和书谱》仅记录王羲之书法243幅、王献之书法89幅,前者是蔡绦亲眼所见的,后者是经过鉴定为真迹的。经画院诸家之鉴选过,较之民间流传,情况自是要好出许多。内府藏画尚且如此,民间伪作之流传可想而知。

二是这一时期书画作伪的目标,已经不再限于对文人的艺术成果的侵占,而更多地呈现出经济利益驱动的色彩。北宋白描大家李公麟“歿后,画益难得,至有厚以金帛购之者。由是夤缘摹仿,伪以取利,不深于画者,率受其欺”^[18]^[130]。作伪的直接目的已经是赤裸裸的不法牟利,远离了艺术创作的本义。赵大亨本是山水画家赵伯驹和赵伯驊兄弟的下人,耳濡目染之下,竟也习得几分风采,“仿二赵画能乱真”,以伪作冒名二赵画作售卖,被蒙骗者“以倍价收之”^[19],其由此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

伪作的盛行,不仅令凡夫俗子们深受其骗,就连当时颇享盛名的收藏大家,也留下笑柄^[12]^[294]。

嘉祐中,三人收画。杨褒、邵必、石扬休皆酷好,竭力收。后余阅三家画:石氏差优;杨以四世五公字印号之,无一轴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标位高,略似江南画,即题曰徐熙,蜀画星神,便题曰阎立本、王维、韩滉,皆可绝倒。其孙携韩滉《散牧图》至,乃双幅上驴二十余枚,不及崔白辈。绢素染深黄,丝文总紧,索价四百贯。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题曰:“韩晋公散牧图不疑家宝。”其上一印镇江军节度使印,是油单印者,其大四寸许,文粗。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细。诸人共笑其伪,久之无人信,遂以五十千质与江氏而去。因嗟之曰:“华堂之上,清晨一群驴子

撕咬,是何气象?”

一些书画家在无奈之下,不得不采取措施预防作伪的出现:“刘宗道,京师人,作《照盆孩儿》,以水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20]78}这也折射出北宋书画作伪现象的普遍性。

二、北宋书画鉴定群体的出现与类型

书画商品化浪潮的出现和作伪的盛行,使得书画鉴定者应运而生。但北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不曾出现专业的书画鉴定机构,也没有形成对书画作伪行为的相关惩治政策,书画鉴定更多的是依赖于个人的专业修养。绝大多数的鉴定名家是出自与书画作品经常接触的人。具体来说,北宋书画鉴定群体大致来源于以下三类。

一是书画家。由擅长书画进而精于鉴藏,是书画鉴定者的自然进路。例如,五代宋初画家高文进“工画佛道,曹吴兼备。笔力快健,施色鲜润”,后在开宝年间奉旨“访求民间图画”^{[16]126},为皇室进行书画鉴赏;黄居寀擅绘花竹禽鸟,“太宗尤加眷遇,仍委之搜访名画,论定品目,一时等辈莫不敛衽”^{[18]351};米友仁早年以书画知名,奉旨鉴定法书,但“往往有一时附会、迎合上意者”^{[21]73}。书画家一般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力,在学习书画创作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作品,对特定的书画风格、裱装等了如指掌,故而能够独具慧眼。

二是书画史家。此类鉴定者作书绘画未必见长,但深得画旨,对于书画的渊源流变、书画家的风格特质等皆熟悉,系统掌握了书画创作和流传的诸多细节,因此具备高超的鉴赏能力。例如,宋初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和画史评论家郭

若虚,著有《图画见闻志》,富含书画鉴定的理论与方法。其《论用笔得失》篇云:“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用笔之难,断可识矣”^{[16]34},诠释了用笔差异所产生的技法与风格的不同,鉴赏者可据之判断书画之真伪。在《论曹吴体法》篇中,郭若虚总结了北齐曹仲达、唐代吴道子的笔法:“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16]37}意为不同书画家的技法差异,可作为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

三是收藏家。这类人有志趣、有财力搜集古书画,真伪书画作品都耳濡目染,通过大量的实践和比较,具有了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例如,苏易简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赴金陵采访书法名画,受赐百余件。《图画见闻志》载:“敕借数十品于私第,未几就赐矣,至今苏氏法书名画最为盛矣。”^{[16]221-222}苏氏一家四代都喜好收藏,苏耆、苏舜钦、苏洵等后人在藏品鉴定上都有独到之处,“四世好事有精鉴,亦张彦远之比”^[22]。

以上三类鉴定家亦有兼通者,如米芾兼书画家、收藏家、美术史家为一身,具备不凡的书画评鉴能力,其所著《书史》《画史》等著作中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内容。《宋史》称其“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23]。四库馆臣评价其《画史》曰:“史称其妙于翰墨绘画,自名一家,尤精鉴裁。此书皆举其平生所见名画,品题真伪,或间及装褙收藏及考订伪缪。历代鉴赏之家,奉为圭臬。”^[24]米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分不开。

宋代崇尚文治,士大夫群体得以优游于文艺之间,书画是其重要的消遣手段之一,部分士大夫由此获得了相当高的书画鉴定功力。例如,北宋末李弥逊评价蔡襄《白莲帖》真伪云:“书家论承字法,迟涩峻疾,要使笔锋行字画

中。如人骨骼既立,虽丰瘠不同,各自成体。近时临书,方尽力点画间,圆锐斜直,唯恐失之,奚暇议笔行何如耶?持此为验,真伪不足辨矣。”^[25]他以行笔气韵的自然灵动与否作为判定书画真伪的依据,这应是他长期浸染其间的经验之谈。士大夫的此类言论常散见于文集笔记之中,对研究北宋书画具有珍贵的借鉴意义。

三、北宋书画鉴定的主要方法

北宋时期,书画鉴定名家辈出,谈书论画的专门著作也纷纷涌现,如米芾的《书史》《画史》、郭熙的《画记》《林泉高致》、郭若虚的《画论》《图画见闻志》、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以及由北宋官方主持编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30余种,为北宋书画理论和技艺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其中所提到的鉴定方法较为完备,构建了后世书画鉴定理论与方法的基本框架。综观其鉴定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1. 观气韵

气韵,即书画作品的意境或韵味。郭若虚鉴裁书画,就极为重视气韵:“若虚虽不加品第,而其论气韵生动,以为非师可传,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20]²⁶⁰《画史》总结了当世诸多名家的艺术风格:“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四面峻厚。”“巨然师董源,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11]²⁶⁹这类记载不仅是对画者风格的概括,同时也是鉴别书画真伪的重要方法。米芾曾将五代南唐的周文矩与唐代的周昉进行比较:“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周)昉,衣纹作战

笔,此盖布文也,惟以此为别,昉笔秀润匀细”^[12]²⁶⁰,两者的差别就在于气韵的不同。

书法作伪的重要手段是钩填,即将薄纸敷在真迹之上,勾画轮廓,然后以墨填充,所出与真迹形制几无差别。《书史》中一例可做说明:“智永《千文》,唐粉蜡纸拓,书内一幅麻纸是真迹,末后一幅,上有双钩摹字,与《归田赋》同意也。料是将真迹一卷,各以一幅真迹在中拓为数十轴,若末无钩填二字,固难辨也。”^[11]²³⁶如此高超的作伪技术,能识破的唯有气韵。真迹笔气贯通,浑然天成;钩填则笔气断裂,若对着光线来看,则墨色明显不均。画作亦大抵如是。所以,观察一幅书画作品的气韵是否贯通就成为鉴定其真伪的重要手段。黄庭坚就曾依此法发现了世传苏轼法书的奥秘:“此帖(《安陆张梦得简》)似是丹阳高述伪作,盖依傍《糟姜山芋帖》为之,然语意、笔法皆不升东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贗作东坡书。余初犹恐《梦得简》是真迹,及熟视之,终篇皆假托耳。少年辈不识好恶乃如此。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26]²⁶⁴高述善于伪作东坡书法,黄庭坚几乎也被蒙混,而终究从笔意中窥得破绽,关键就在于高述难以展现出东坡的“海上风涛之气”。形易得而意难求,以气韵辨别东坡书法的真伪堪为黄庭坚的不二法门:“东坡先生书,浙东西士大夫无不规摹,颇有用意精到,得其仿佛,至于老重下笔,沉着痛快,似颜鲁公、李北海处,遂无一笔可寻。丹阳高述、齐安潘岐其人皆文艺,故其风声气俗见于笔墨间,造作语言,想象其人,时作东坡简笔,或能乱真,遇至鉴则亦败矣。不深知东坡笔,用余言求之,思过半矣。东坡书,彭城以前尤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贗也。”^[26]³⁷³苏轼晚年经历了“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等一系列政治风波的磨砺,性格由之前的豪放转向深沉、内敛,书法风格随之改嬗,没有经历过如此

政治磨难的人是断难得其内在神韵的,故其晚年作品的真伪可据此一望而知。

对于鉴赏家来说,最难鉴别的就是气韵相近的伪作。《圣朝名画评》云:“翟院深……师乡人李成画山水。……后成孙宥为开封尹日,购其祖画,多误售院深之笔,以其风韵相近,不能辨尔。”^{[3]17-18}翟院深熟知李成山水之妙,潜心摹习之下,气韵日益接近真迹,竟能以假乱真,连李成之孙都难以辨别。对于此类水平极高的精心之伪作,还需要其他鉴定方法的辅助。

2. 察款印

款为题款,印为印章,是古代书画作品的身份标志。晋唐、五代、宋初,书画家多不盖印章,只在隐蔽处暗题名款,需要鉴定者以不同寻常的眼力去辨识。米芾就曾以不凡的眼力辨别出一幅假托徐熙的伪作:“李冠卿少卿,收双幅大折枝一、千叶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余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余花皆面,命为徐熙。余细阅,于一花头下金书:臣崇肆上进。公叹曰:平生所好,终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12]275}宋以前的题款多在暗处,不细心审视的话是很难发现的。在《画史》中,米芾另记一事,仍以画作上的落款判定了一幅范宽的真迹:“范宽师荆浩,浩自称洪谷子。王诜尝以二画见送,题勾龙爽画。因重背入水,于左边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笔,字在合绿色抹石之下,非后人作也,然全不似宽。后数年,丹徒僧房有一轴山水,与浩一同,而笔干不圆,于瀑水边题华原范宽,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较之,山顶好作密林,自此趋枯老,水际作突兀大石,自此趋劲硬,信荆之弟子也。于是以一画易之,收以示鉴者。”^{[12]272}黄居寀,后蜀翰林待诏,入宋之后,“(太宗)因收得名画数件,请居寀验之。其中秋山一图,是故主答淮南国信者,画绢缝之内,自有衔名。陶公云此是淮王所遗,看之果符其说”^[27]。

印章,则往往是作者与藏者并篆,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特点,后人多据此来判断画作的真伪和收藏的历史。明代史学家都穆在总结宋代收藏家的印章风格时,有下面一段言论^[28]。

宋思陵有御书之宝印,书后有御书瓢印。王晋卿家藏则有“宝绘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审定真迹”等印,或用团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则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陈简斋则有“无住道人印记”。苏武功家则有“许国后裔”、“苏耆国老”等印。东坡则用一寸长形印,文曰“赵郡苏轼图籍”。吴傅朋则曰“延州吴悦”,曰“吴悦私印”。

一些书画数量巨大的收藏家,往往会将藏品分出等次,通过不同的印章来加以区分。例如米芾不仅通过印章鉴定书画之真伪,亦通过印章去区分自家收藏书画的真伪优劣:“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篋印、宝晋书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芾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唯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12]280}在北宋与米芾此举相似的收藏家当不在少数,如“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画三等,上等书名用名印,中等书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12]285}。不同时代的印章也各有特色,可供鉴赏家用以鉴识,如“贞观、开元皆小印,便于印缝。弘文之印一寸半许。开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书缝,大者圈邗角,一寸已上,古篆”^{[11]260}。

在判定书画真伪之时,对印章的鉴别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可以从米芾对谢安《八月五日帖》的鉴定中略窥一斑:“内谢安帖有开元

印,缝两小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赏鉴之家。其间有太平公主胡书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宝藏。”^{[11]229}宋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印章,与印章不易仿制密切相关:“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唯印不可作伪,作者必异。王诜刻勾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11]259}书画皆有作伪的手段,但印章是不可造假的,因为不同的制作材质、文字图案符号、印文直径、边框与文字印面的高度甚至使用方法、人为刻制的暗记等,使印章呈现出独特的印面结构特点,所以对其制假的技术要求极其精细,稍不留意就会露出马脚。

3. 辨裱材

除画作本身所呈现的画风、印记之外,作画所用的纸、墨等也是鉴赏家辨别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不同的时代,由于制作工艺不同,纸张的构成和油墨的研制技法也大相径庭,这可以帮助鉴赏者辨别书画的年代。一些作伪者虽往往会着意将画纸做旧:“熏纸烟色,上深下浅;染纸湿色,纸纹栖尘;劳纸作茧纹,软。”^{[11]259}通过对纸张的层层熏染以营造历史感,但在了解内情的行家看来,这些手法多是雕虫小技,利用深厚的书画知识完全可以识别:“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吴生、周昉、韩幹。后来皆以热汤半熟,入粉,槌如银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笔。今人收唐画必以绢辨,见文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张僧画、阎令画,世所存者皆生绢。南唐画皆粗绢,徐熙绢或如布。”^{[12]283}另外,历史上的许多画家都有独特的用纸偏好,如《图绘宝鉴》云徐熙“所画多在澄心堂纸上”,后代画家也多爱用此纸作画,如李公麟“作画多不设色,独用澄心堂纸为之”^{[29]46}。

利用纸张来鉴别书画的真伪,北宋时人各

有心得。米芾曾云:“绢素百片必好画,文制各有辨。长幅横卷,裂文横也;横卷直卷,裂文直,各随轴势裂也。直断不当一缕,岁久卷自两头苏开,断不相合,不作毛,掬则苏也,不可伪作。其伪者,快刀直过,当缕两头,依旧生作毛起,掬又坚纫也。湿染,色栖缕间,干熏者烟臭,上深下浅,古纸素有一股古香也。”^{[12]284}这是米芾长期接触书画艺术品所熏陶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感知。

不同时代特定的书画工具,会产生特定的书画效果。由于不同时代书画家所用的砚台不同,其书画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特点。“古书画皆圆,盖有助于器。晋唐皆凤池研,中心如瓦凹,故称研瓦。如以一花头瓦安三足尔。墨称螺,制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砚也。一援笔,因凹势锋已圆,书画安得不圆?本朝砚如心,平如砥,一援笔则褊,故字亦褊。唐询字彦猷始作心凸研,云宜看墨色,每援笔即三角,字安得圆哉?余稍追复其样,士人间有用者,然稍平革背,未至于瓦,惟至交一两人顿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能发药也。”^{[12]279}可见,鉴别书画作品不仅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极度的细心与高超的眼力。

4. 重史证

史家常言:任何事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此言非虚,书画亦是如此。画面呈现出的一切都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独特信息,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当时世界的认知状况,这为书画鉴赏提供了另一条有效的路径——史证。较之前代,宋代的书画创作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大体仍不脱伎术者流,文化修养有限,故而在作伪时常常会出现历史常识性的错误。米芾曾以衣冠为例,讥刺世人:“今人绝不画故事,则为之人又不考古衣冠,皆使人发笑。”^{[12]272}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也将汉魏之前、晋宋之后、后周、隋朝、唐至宋初的衣冠制度一一陈

述罗列,作为书画鉴赏的依据。除物件外,前朝史事也可以成为鉴裁的明证,哲宗朝名士王之道就曾被人蒙蔽,购入了一幅此类伪作,结果被王彦范识破^[30]。

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图》,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彦猷畜画最多,开篋,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名花较之,俱所不及,题曰:锦江钓叟黄筌笔。彦猷偿其半,因暂留斋中少玩。其绢色晦淡,酷类古缣,彦猷讶其图角有巨印,徐润揭而窥之,乃和买绢印。彦范博知世故,大笑曰:“和买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颍州,岁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黄筌唐末人,此后人矫为也。”遂还之,不受其诬也。

黄筌是晚唐五代时西蜀画院的宫廷画家,而宋人的伪画中竟然出现了宋代以来才有的“和买”字样,令人啼笑皆非。

避讳,是古人出于对尊者的敬重,往往采用缺笔、改字、空字等方法,以避免直呼其名,带来不敬。这在文献学中是判定版本的重要手段,陈垣先生曾作《史讳举例》专释其义。这也是判定书画年代的利器。例如,“唐辩才弟子草书《千文》,黄麻纸书,在龙图阁直学士吴郡滕元发处。滕以为智永书,余阅其前空‘才’字,全不书,固以疑之;后复空‘永’字,遂定为辩才弟子所书,故特缺其祖师二名耳”^{[11]242}。滕元发认为所收草书为智永大师所作,但米芾根据画作中表现出来的避讳现象断定这并非智永亲作,而是弟子所为。米芾另记有一事,大体类此:“唐越国会钟绍京书《千文》,笔势圆劲,在垂相恭公侄陈开处,今为宗室令穰所购。诸贵人皆题作智永,余验出唐讳阙笔,及以遍寻寺碑对之,更无少异。大年(即赵令穰)于是尽剪去

诸人跋,余始跋之。”^{[11]236-37}

综上所述,判定书法作品的真伪,并非易事,鉴定人既需要对书画技巧、艺术风格有透彻的了解,又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鉴别书画真伪的方法相辅相成,很多时候需要综合运用。例如,米芾鉴定晋庚翼《稚恭》真伪时:“古黄麻纸,全幅无端末,笔势细弱,字相连属,古雅。论兵事,有数翼字,上有窦蒙审定印。后联张芝、王廙草帖,是唐人伪作。熏纸上深下淡,笔势甚俗,语言无伦,遂使至宝杂于瓦砾。可叹!”^{[11]234-35}面对纷繁复杂、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必须灵活整合一切相关知识,才能去伪存真,确保鉴定准确。

四、结语

北宋书画鉴定群体的出现与鉴定技艺的发展成熟,是伴随着书画市场的蓬勃繁荣而不断前进的,也是在与书画作伪现象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而趋于完备的。这一时期的书画鉴定家主要来源于经常接触书画作品并掌握一定书画技艺的书画家、书画史家、收藏家,一部分喜好书画的士人也在赏玩之余掌握了一定的书画鉴定常识,由此构架出传统的书画鉴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框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北宋书画鉴定技艺的发展并没能有效遏制书画的作伪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在缺乏面向社会的专业鉴定机构和惩治政策的情况下,书画鉴定只能够依靠自身的艺术修养,而鉴定能力的提升需要长时间的涵育培养,寻常人难以企及;二是在北宋崇文氛围之中,大量的好事之徒涌入书画市场,“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31]829}，“或有贖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12]278}，这些附庸风雅之士为伪书伪画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鉴定方法的发展和鉴定知识的普及远远达不到伪作的发展速度，难以抵消书画作伪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 [1] 李华瑞. 宋代画市场初探[J]. 美术史论, 1993(1):54.
- [2] 倪进. 中国书画作伪史考[J]. 艺术百家, 2007(4):78.
- [3] 刘道醇. 圣朝名画评[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
- [4] 欧阳修. 归田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23.
- [5] 丁传靖. 宋人轶事汇编[C]. 北京:中华书局, 2003:564.
- [6] 邓椿. 画继[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63.
- [7] 董更. 书录[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814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299.
- [8] 岳珂. 宝真斋法书赞[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813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675.
- [9] 唐志契. 绘事微言[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675.
- [10] 洪迈. 容斋随笔[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685.
- [11] 米芾. 书史[M]//全宋笔记第2编:第4册.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
- [12] 米芾. 画史[M]//全宋笔记第2编:第4册.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
- [13] 程民生. 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J]. 史学月刊, 2008(3):100.
- [14] 张彦远. 法书要录[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37.
- [15] 胡璩. 谭宾录[M]//续修四库全书:第97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49.
- [16] 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0.
- [17] 蔡條. 铁围山丛谈[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78.
- [18] 赵佶. 宣和画谱[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
- [19] 庄肃. 画继补遗[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5.
- [20] 邓椿. 画继[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0.
- [21] 汤垕. 画鉴[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73.
- [22] 米芾. 宝章待访录[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8:48.
- [23]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13123.
- [24]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957.
- [25] 李弥逊. 筠溪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7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147.
- [26] 黄庭坚. 山谷集[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2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 [27] 黄休. 益州名画录[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86.
- [28] 朱存理. 铁网珊瑚校证[M]. 韩进, 朱春峰, 校证. 扬州:广陵书社, 2012:697.
- [29] 夏彦远. 图绘宝鉴[M]. 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 1963.
- [30]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669.
- [31] 苏轼. 苏轼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829.